

人权新战术

实践者资源手册

中国权利在行动 翻译



人权新战术

实践者资源手册

中国权利在行动 翻译

人权新战术项目手册

酷刑受害者中心项目

我们的联系方式:

The New Tactics in Human Rights Project
A project of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717 East River Road
Minneapolis, MN 55455
+1 612 436 4800
www.cvt.org
www.newtactics.org

作者和编辑: 崔西亚·科内尔、凯特·凯尔茨、尼科尔·帕拉斯
设计: 马修·雷扎克 (MCAD 设计工作室)
字体设计: 罗卡特·奥尔森、布莱恩特·奥尔森、埃里克·奥尔森 (字体工作室)
摄影: 迪克·班克罗夫特
印刷: 福兰西斯

版权所有: 酷刑受害者中心; 中国权利在行动经酷刑受害者中心授权翻译中文版本

严禁出售本书。我们鼓励各个团体免费复印和散发本书或其中的部分内容, 这是对人权新战术项目和酷刑受害者中心的认可。如果你想翻译本书或其中部分内容, 请联系我们。

本书英文下载地址: www.newtactics.org。中文下载地址: www.chinarightsia.org

印刷: 加拿大
ISBN: 0-9759789-0-X

目录

序：

鸣谢

需要新战术

把本书作为一种资源

关键词

人权新战术项目

预防战术

人身保护

分享重要信息

减少侵犯人权的机会

干涉战术

抵抗战术

中断战术

说服战术

激励战术

恢复战术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巩固个人和社区

寻求救济

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

建设支持者群体

团结合作

能力建设

提高认识

工具和资源

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

使你的战术适合本地实际

分享战术：用案例说明战术

自我照顾：照顾你最有价值的资源

更多资料

分享一种战术

序

过去二十年，世界上已经开启了一个人权新时代，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法方面的新机制已经改变了我们思考和实现正义的方式。与此同时，个人和组织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也已经改变了我们思考实现人权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所能达到目标的方式。

在全世界各个层面上——无论是在小村庄还是在国民政府，或是在最高的国际正义层面上，人们都在创造和使用新战术使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人权新战术项目汇集这些战术创新，并将这些创新与其他致力于促进人权的人们分享。我邀请你一起从事这项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你已经掌握的这些宝贵资源。

在思考我所做的工作时，我看到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有了获得正义的机会。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舆论的全力支持下创立的第一个审判战争罪行法庭）的建立，为正义打开了新的大门。为特别法庭工作的国际团队成员来自几十个国家，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制定新法，创造先例，起诉、控告那些以往在任何国家都未曾控告过的罪行。共同创造一种新战术，就能为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战术——国际刑事法庭铺平道路。现在，无论反人类罪发生在哪里，犯罪者是谁，这个法庭都能提供一种实现正义的渠道。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中，我们使用了另一种新战术：把强奸定为一项可以单独起诉的战争罪行，而不是附属于其他罪行的次级罪行。特别法庭指控了八名波斯尼亚塞族军官有计划地强奸穆斯林妇女，它代表了世界在性别犯罪与人权思考方式上的根本改变。这一战术使今后更多案件有可能实现正义。

十年前，法律专家们可能会对起诉和引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之类权倾一时的前独裁者的可能性报以怀疑，这似乎不是一种可行的战术。一个国家元首级的罪犯，无论其罪行多么残暴，都会得到世界的原谅。皮诺切特被逮捕和引渡，改变了我们思考实现国际正义的方式。这给人权武器库中增加了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将来肯定会被反复使用。

我赞赏人权倡导者们的努力，他们利用国内国际法庭和其他公共论坛，呼吁人们关注反人道罪行，无论这些罪行发生在哪里，他们勇敢地为了正义大声疾呼。但这只是全世界的人们（他们的工作领域和地区就像人类的经验本身那么多样）为了提倡和保护人类的基本尊严而使用过的许多新型原创战术中的一小部分。

我很骄傲自己能够加入人权新战术项目，并且向大家介绍本书。虽然不能说它是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但它是这种新型原创思维的丰富宝库，我希望它能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

——理查德·戈德斯通

南非宪法法院退休法官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

科索沃问题国际调查团主席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工作组主席（该组织由国际律师协会建立）

鸣谢

没有全世界无数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建议和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感谢本书所提到的团体、组织和个人，感谢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感谢他们花费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讲述他们的工作，其中有些人还撰写或编辑了本书的部分内容。我们还要感谢那些为本书推荐采访对象的人们。

凯特·凯尔茨是人权新战术项目经理，她撰写并协调了本书的早期版本，编辑并监督了本版的撰写，她对质量和准确性的热情投入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崔西亚·科内尔撰写和编辑了部分文本。尼科尔·帕拉斯撰写了战术索引，研究了战术，协调了战术研究工作，还负责战术的选择和组织工作。南希·皮尔森开发了培训资料。瑞秋·齐达提供了指导和技术。苏珊·艾弗森编辑了文本。帕姆·阿诺德、马修·雷扎克和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设计项目的工作人员耐心、巧妙、热情地把本书从原材料变为成品。道格拉斯·约翰逊创造了新战术项目的初步设想和框架，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不可能完成。

许多慷慨的捐助者为本书的设想和内容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尔曼慈善基金、鲁本和伊丽莎白·劳辛信托基金、美国和平研究所和一些希望匿名的捐助者。还有一些捐助者通过支持酷刑受害者中心参与新战术项目的其他工作，为本书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它们包括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全国慈善信托基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该基金会在意大利的贝拉焦会议中心，以及美国国务院。酷刑受害者中心的项目伙伴也得到了许多组织的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参与本项目。

我们还要感谢新战术国际顾问委员会和人权工作组的成员（完整的成员名单见第20-21页），以及其他审读和评论本书的支持者们。他们在促进人权方面的实际斗争经验，以及他们对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真正需要哪些内容的了解，指导了本书的撰写，而且还将继续为新战术项目提供指导。

理查德·戈德斯通法官、穆拉特·贝尔盖、莫顿·凯依若姆、索菲亚·马赫、凯拉西·萨塔亚提都为本书做出了贡献，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人在审读各章时贡献了他们出色的编辑和分析能力，其中包括苏珊·阿特伍德、坦妮娅·克罗米、菲尔·迪尔林、巴兹尔·费尔南多、芭芭拉·弗雷、狄安娜·加拉赫、保罗·豪普特、卡琳·坎扎、萨尔曼·可汗、马克·里奇、利兹·谢甫琴科、布鲁斯·冯·沃利斯及其亚洲人权委员会的同事。保罗·达尔顿、克拉伦斯·迪亚斯、利亚姆·马奥尼、保罗·米尔恩、苏珊娜·米瑞克、鲍里斯·普廷塞夫、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埃德森·斯宾塞和拉杰什·坦登帮助我们形成了目前版本的思路。

目前的版本建立在之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之上。在五十多名帮助我们研究、撰写、编辑、审读这些书稿的志愿者当中，我们特别要感谢阿伦·克拉默、班尼特·弗里曼、芭芭拉·弗雷、爱德华·哈尔平、艾琳·考夫曼、莫顿·凯依若姆、约翰·扎尔茨贝格、罗伯特·舒梅克和戴维·魏斯布罗德。菲尔·迪尔林编辑了第二版，狄安娜·加拉赫、科内·萨托和温迪·韦伯撰写了各章。

我们感谢所有这些人和其他无数人的才能、时间、洞察力和慷慨。本书中的所有疏忽和错误都由我们自己负责。此外，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发现、结论、建议属于新战术项目，不一定代表我们的资助者的观点。

需要新战术

过去几十年中，现代人权运动在促进人权理想和建立特殊的人权保护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权运动导致了谴责酷刑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的制定，还在应该得到保护和支持合法政治活动的定义上形成了国际共识。保护政治犯免遭伤害，使其中许多人获得了自由。许多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制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以促进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坚守。这些成就之重要和取得这些成就之艰难，怎么说也不过分。

这些故事每一个都令人鼓舞，它们共同反映了人权领域所能实现的前景。

带来这些进展的主要有三大战术：1) 建立国际标准。制定了许多公约、条约和标准；2) 监督这些标准的遵守和执行情况；3) 在政府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背这些标准时，对其进行公开的谴责或揭露。近年来，这些手段所需要的基础架构和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战术带来了巨大的进展，应该继续支持和贯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这些战术所能实现的目标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战术本身不足以解决某些复杂的人权问题。

以酷刑问题为例。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国际公约和标准，有了更多的宪法保护和国内立法来反对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有了更多的酷刑监督机制，不仅有条约机构的基础架构，还有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全世界还创立了超过二百五十个酷刑幸存者治疗中心，每个中心都利用医疗资源来记录成千上万名受害者遭受的酷刑，记录酷刑方面的法医学能力也在提高。在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中，被记录和谴责最多的就是酷刑。

然而，大赦国际在2000年发动第三次国际反酷刑运动时指出，酷刑的发生与该组织在1974年发动第一次国际反酷刑运动时一样普遍。

单单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就目睹了大量的侵犯人权事件，其范围之广令人震惊——波斯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等超过一百五十个国家仍在实施或允许实施酷刑。我必须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些做法没有起到作用。

本书的论点是，促进人权运动需要开创更大的空间，需要让更多个人和社会阶层加入这一领域。还需要开发更加全面的战略战术，只有使用比现在广泛得多的战术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全世界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实践者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开发新战术，建立广泛的战略联盟，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学习新知识。人权新战术项目的目标是把这些创新者聚集到一起，鼓励其他人与他们合作。本书包含了超过七十五个战术创新的案例——学生、农民和政府官员等，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复杂技术和工具做出了这些创新。他们的议题多种多样，比如公平选举、清洁饮水和释放政治犯。

当前战略的局限性

酷刑的顽固存在，反映了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当以上三种最常见的人权运动战术未能显著减少酷刑的发生时，就是应该反思当前战略局限性的时候了。这种受局限的感觉有些会出现在我称为“战术制定”的过程中。

一个由十名酷刑问题专家组成的小组从施刑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画出了一个关系图表，其中包括使酷刑得以发生的基本情况。例如，施刑者通常是一个有着很强等级关系的团体的成员，可能是某个特殊的警察系统或军事组织的一部分。我们纵向跟踪这些关系，以便了解计划、组织和资助酷刑实施的指挥链条。我们也横向观察每一层级，以便了解还有哪些可能影响的关系存在。例如，警察系统里也有平民和医生，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也可能对他们产生某种程度的控制或影响。通过这一过程，最初的图表上有超过四百种关系，包含了从地方到国际社会的各个层级。

我们假定，关系图表上的每一种关系都能够进行干预，以打破或控制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关系图表的帮助下，我们给战术对象针对的各种关系配以不同的战术，然后，这些战术必

须对这些关系的逻辑链条产生影响，以打破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因此以“战术制定”命名）。

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1. 我们采用的战术往往距离核心问题很远，例如在国际层面上，这些战术要穿越许多关系层级才能间接影响到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削弱或分散行动的力量。
2. 使用酷刑的系统往往是高度复杂的，而且是不容易打破的，从使用酷刑中获益的不同机构会互相支持。如果系统中的一部分遭到攻击，其余部分（例如警察机构、检察系统、司法制度等等）就会保护攻击目标，让它能够自我修复。这意味着系统不会对个别战术让步。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同时施加影响，使系统失去平衡，防止它自我修复。这需要将战术作为一种更加全面的战略的一部分，协同一致地使用多种战术。
3. 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组织只会使用他们熟悉的有限的战术。这些组织往往集中使用少数几种战术，而且很少协调或配合使用这些战术。这不仅把对一个相互强化的复杂系统的影响力限制在了几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通常人们只做能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战术之间有更多的协调可能会更加有效。
4. 关系图表上有许多各种运动目前还没有影响或涉及到的关系。我们没有把这些关系的力量和关切转变成行动。我们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战术来吸引这些潜在的关系参与到运动中来。

“我不是说战术思维或战术培训能够代替战略思维，而是说战术开发能够丰富战略思维。”

我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的社会和人权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法和新的工作方法，以制定出有效的变革战略。目前的有些战略需要一个宏观框架，这一框架要能够更加有效地把许多组织的有限资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运动中。这可能需要有“战略召集人”——一个拥有道德信誉，能够让我们团结起来形成新的工作关系的机构或个人。不过，各个组织也可以发起其他行动，例如给复杂的系统施加压力，或者在社交网站上激励新人参加行动。本书是一个大型项目——人权新战术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人权领域发展对话，主题是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以及粗略地说明如何使用我们手中的某些工具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一个新兴的思想

酷刑受害者中心（CVT）成立于1985年，最初是美国的一个为酷刑幸存者提供综合治疗的机构。从一开始，酷刑受害者中心的领导层就设想，中心的工作要为人权领域开发一种新的战术使用方

法。在开始了解我们的工作可以产生哪些战术的同时，我们也鼓励为酷刑幸存者开发其他的治疗项目。这些新机构给人权运动创造了新的战略机会。例如恢复由于镇压而失去的领导能力，帮助社群从恐惧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动员医疗卫生界成为新的人权支持者群体。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收集主流社会关注之外的那些从事创新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的故事。

新战术项目构想于1995年。此后不久，酷刑受害者中心找到土耳其的咨询团体，和他们一起探讨召开“最佳实践研讨会”的想法，该研讨会将考察全世界用于解决普遍的侵犯人权问题的战术，或更加有效地与侵犯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战术。我们希望把焦点放在“解决”而不是“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侵犯人权问题之所以继续存在，至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公民社会和政府缺少成功的先例。虽然我们认为寻找问题的根源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主流的运动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在如何有效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人们更多关心“是什么”，很少关心“怎么做”。

这一想法得到了土耳其社会各界领导者的共鸣和关注。1997年，酷刑受害者中心与两个土耳其组织“赫尔辛基公民大会”和“土耳其与中东公共管理研究所人权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人权新战术项目。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下，创新战术的系统性研究于1999年正式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世界级领袖人物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目的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并给我们提供政治支持。我们还建立了一个人权工作组，由世界各地的二十一名人权领袖组成，目的是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战术，以及为项目的总体方针出谋划策。

2000年，人权工作组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顾问团的成员。加拿大前总理金·坎贝尔阁下代表国际顾问委员会主持了会议。有关组织参加了关于促进人权的创新战术的讨论，示范了交叉培训的方法，还为项目今后的工作制定了行动计划。

在人权领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们评论说，会上的思想和信息分享让他们在吸收新人的机会方面有了不同的想法，还让他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在这一初步设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的项目：我们提供工具（包括这本书和一个网站），还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一系列工作坊来给人权倡导者提供战术创新和战略思维方面的培训。

我们的思考框架

在酷刑受害者中心工作了十六年之后，我深知给酷刑受害者提供治疗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它使我认识到，防止酷刑和照料幸存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发现，照料幸存者能够恢复人权运动的领导能力，还能帮助社群克服恐惧带来的后遗症。我们还发现，康复的希望象征着创造一种更加安全的政治空间，让社群可以聚集起来一起学习如何承担风险。酷刑受害者中心之类的治疗中心把新的团体——例如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入人权工作。而且，我

们从治疗中心的立场出发，支持结束酷刑，支持能够改善酷刑受害者生活的政策和法律。在最初几年里，我们扩大了人权工作的定义，并且开始实施一些新的战术。

1970-1980年代我在国际婴儿食品运动中的角色，使我开始思考新战术的问题。1976年底，我领导了一个致力于解决饥饿问题的草根团体，我们一年只有五百美元的项目预算，还有我自己的最低工资。我们这个小团体开始在全国到处活动，还创立了一个婴儿食品行动联盟（INFACT）。就靠着这点可怜的资源，我们发动了一个抵制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公司的行动，迫使它改变了婴幼儿乳制品的经营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络，在全美国有三百多个分会。我们创建了一个由一百二十多个全国性支持组织组成的联合会，有超过四千万名会员。我们创建了第一个草根国际抵制行动，在十个国家开展活动。我们组建了第一个跨国问题联络网“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络网”（IBFAN），在六十七个国家开展活动。我们还成为最早一批以平等身份与国家公司一起被邀请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最后，我们还参加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联合国企业营销准则谈判。后来，在令雀巢公司的收入减少了五十亿美元之后，该公司与我们签署了联合协议，雀巢公司承诺，将根据国际规则改变营销方式——有关协议被誉为“国际消费者运动史上最重要的胜利”。

我为这场运动和将近十年的工作感到骄傲。不过，就像所有的新手一样，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许多错误都可以归结于我的战术知识有限。例如，最初我把战术和战略混为一谈。我以为战略思维其实就是如何充分利用你现有的资源，既然在我的脑海中只有一种战术，那我就只能使用这种战术了。与许多从草根组织产生的领导者一样，我试图纠正我的错误，我开始从某个行动的层面上思考战术问题，然后使用我有限的概念来理解如何制定战略。

在制定组织战略方面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也更加明白，我们对战术了解得越多，制定新的战略时的灵活性就越大。我不是说战术思维或战术培训能够代替战略思维，而是说战术开发能够丰富战略思维。

目标、战略和战术

虽然关注战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组织的第一要务。一个组织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目标（愿景），这个总体目标要反映其创建者、领导者和成员的价值和信念，还要融入其使命和意义。这些目标必须明确规划。组织还必须确定中期目标（行动），中期目标要更加详细地说明阶段性可实现的目标，还要将这些阶段目标纳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可行的总体目标之中。

虽然进行战略思维往往很困难，但战略并不神秘，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决定，而是许多决定的汇集：选择关键目标和合适的对象，了解需要的支持者群体和资源，决定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战术。20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孙子就曾经指出，战略就是了解对手（对手的目标、战略、优势、劣势）、

了解自己（我们的盟友、我们的优势和局限）、了解形势（战场在哪里）。对手的战术是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了解这些战术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我们所能实现的目标——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战术和我们能够成功实施的战术——会影响战略的构成。因此，战术思维是战略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

战术是战略框架内的具体行动，也是组织资源以影响世界变革的方法。战术可能是一个活动、一个系统，在某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机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是一种技术。战术的表现可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运动的规模、能力和组织资源。战术关系到如何带来变化，而战略则关系到决定使用哪些战术，哪些对象值得关注，哪些资源可以利用。我们的战术知识也能决定我们所选择的战略。

要想有效地争取人权，战术思维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论证过程。

1. 我们做事情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对于事情可行性的判断；战术有助于确定战略。

这里我不想过于绝对化。创新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只要有人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就发生了。然而，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不同的例子：一方面，一种已经无法取得成功的战术，但人们会反复使用，另一方面，人们不断用新战术取代旧战术。下面是军事史上的两个好例子：1) 希腊人通过发明方阵——一种新的作战系统——战胜了无组织但数量庞大的游牧民族骑兵。2) 亨利五世将长弓兵编入英军，战胜了法军的重装骑兵。战术创新为新的战略铺平了道路。

同样，如果我们只思考自己所能做的事，就会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在开展国际婴儿食品运动的时候，我拒绝了很多好建议，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实施那些建议——也没有钱支付给那些知道如何实施的人！

2. 不同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对付不同的对象。

不是所有的战术都能对所有的对象产生同样的影响。写信给民主政府肯定与写信给专制政府的结果不同。经济抵制需要抵制的对象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还需要参与抵制的人能够打击到抵制对象的弱点。

我们必须学习根据对象来调整战术，找到那些能够充分发挥影响力的战术。当战术不能影响对象时，我们就必须创造新的更有效的战术。

3. 不同的战术能吸引不同的支持者群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风格。好的老师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来帮助我们学习。要想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参加人权运动，在社会变革的战术方面也需要有同样的态度。

有些人觉得在实施酷刑者的家门前示威非常可怕，另一些人觉得写信离所要实现的变革太远。我们可以辩论谁是对的，也可以根据人们的因果观念、风险承受能力、拥有的时间和处理信息的方式，组织不同反应的人参加不同的战术。

如果人权领域的应对方式是只提供一两种战术吸引民众参加，那我们就只能吸引到范围很窄的认为这些战术有意义的支持者。例如，法律战术除了少数专业人士之外很少有人能参与。我们需要利用其他的战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参与者而不只是观察者。

在遭遇镇压的国家，人们会退出公共生活。我们要在这些国家吸引支持者，就需要提供各种战术，这些战术要能吸引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社会变革观点的人。

4. 战术灵活才能出奇制胜。

如果我们反复使用同样的战术，对手就会学会如何反击和控制这些战术的影响。

我们发起抵制雀巢公司的运动时，该公司反应过度，犯了许多错误，最后反而增强了我们抵制的力量。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雀巢公司也发展出了平息舆论批评的能力，并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因此，我们不断改变自己的战术，让雀巢公司的反击失效。

人权仍在遭到侵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某些对手聪明、强大，有着大量的资源。大赦国际发动的第一场写信运动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该战术出奇制胜。但是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都已经学会了如何官僚化地应对这一战术和保护自己不受这一战术的影响。

出奇制胜会让对手失去平衡，会让他们犯错误，削弱他们的地位，也会让他们有新的应对方法，或者开始明白他们需要积极的变化。僵化会让我们思维重复，也会让对手思维重复。灵活性能促进双方的学习能力。

5. 战术能够告诉全世界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如何行动。

国际婴儿食品运动（1975-1985）创造了一种开展全球政治行动的新方法。这是一个挑战，因为运动在各个阶段都面临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此后，人们用同样的方法又发动了其他的国际运动，例如，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短短十八个月时间，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婴儿食品运动却花了将近十年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现象有些类似音乐家练习乐曲，在肌肉学会了如何动作之后，大脑才有机会去规划微妙的差异和改进。我们越练习，事情就变得越容易。

另一个案例来自乌拉圭。乌拉圭宪法制定七十年以来，其中一个允许公民投票推翻国会立法的条款从未被使用过。乌拉圭人权界启用了这一条款，并且收集了25%的合格选民的请愿书，要求废除那些为在独裁统治期间迫害和杀害公民的人颁发的赦免令。虽然最后公民投票以微弱劣势失败，

但乌拉圭民众学到了一种开展政治行动的新方法。后来的十二年中，乌拉圭人举行了八次公民投票。

6. 战术是吸引参加者和盟友参与组织工作的培训系统。

有些战术是短期的（比如游行），有些战术是长期的（比如抵制）。但是作为有系统的行动，所有战术都需要规划、协调和指导。这给许多公民创造了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学习，以及更多地投入组织或运动中来。战术层面上的参与对新加入的年轻员工和志愿者都是很好的培训机会。

当酷刑受害者中心最初计划将《酷刑受害者救济法案》（已成为美国立法，该法律的目标是发展一个针对酷刑的全面战略，为全世界酷刑受害者的康复提供支持。——译者注）作为美国国会的提案时（立法战术），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吸引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潜在的盟友参与进来。这些组织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之后，更加了解了酷刑治疗项目的工作和酷刑幸存者的经历，开始把我们对酷刑的理解纳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

要想在全世界成功地贯彻人权原则，战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拓展了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思维之后，人权领域的工作就可能变得更加有效。总结如下：

1. 战术范围狭窄，支持者的范围也会狭窄；战术范围广泛，则能吸引更多广泛的支持者参与。
2. 过度依赖某种单一战术不仅有可能将战术用于错误的形势，还有可能使我们坐失扩大战略目标的机会。灵活的战术思维能创造改进战略目标的机会。
3. 过度使用一种战术会鼓励对手将应对手段系统化，使对手更容易巩固自己的地位。战术灵活会让对手出乎意料，也会让他们学到新东西。

我们不想让本书成为一本制定战略或推广任何具体战术的“菜谱”。战术选择必须由一个团体的组织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对对手或不利处境的分析能力和使用战术的背景来决定。

我们介绍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从事的创新工作，是希望鼓励人权实践者进行战略思考，丰富自己的战术词汇。我们也向自己提出挑战，我们将投资开发与政府和人权组织更加有效合作的新战略。

战术与战术思维

过去二十五年中，进行战略规划已经成为非政府组织的标准做法。但奇怪的是，战术观念却没有随着战略规划一起发展。对很多人来说，战术仍然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常说什么事情或什么人“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意思是说它或他受制于有限的短期思维而不是长期的核心思维。“战术”是指为了短期的目标或短期的收获而使用的策略，甚至是不道德的手段。因为“战术”这个词在人权领域不常使用，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不是一个军事术语吗？”，“这个词让人糊

涂！”，“战术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的人不用这个词。”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使用手段、方法、技术这类词，而要使用“战术”这个词？

在人权新战术项目中，我们使用“战术”一词，是因为它与“战略”概念的一体关系。战略决定哪些事情重要，战术则具体说明如何去做这些事。“做什么”和“如何做”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和澄清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十分重要。战术——可能是活动、系统、技术或机构——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战术这个词容易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以为战略属于一个部门，而战术属于另一个部门。例如，政府要实施一个战略——建立一个保护人权的机构。而建立保护人权机构这一战略中的战术之一是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的战略和用于实施战略的战术。

制定成功的战略，取决于战术的灵活性和可使用战术的广泛性。如同我在“需要新战术”（第7页）中所解释的那样，过于依赖少数几种战术的个人、组织和运动，可能会把战术用在错误的情形中，还可能会失去使用其他更合适的战术的机会。他们无法像使用多样战术的个人、组织和运动那样，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而且，反复使用同样的战术，也会让战术所针对的对手或系统做出调整和改变，使战术的有效性下降。

国际人权领域正在使用的战术范围十分广泛，本书就是一个证明——虽然它不是详尽无遗的。本书既证明了人权实践者们的创造性，也证明了战术和战略思维的力量。

——道格拉斯·约翰逊
酷刑受害者中心执行主任

把本书作为一种资源

无论你在促进人类基本尊严的斗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你是社区组织者、政府官员还是跨国公司总管，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改变你对自己工作的可能性的思考。我们希望你从下面的案例中了解到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新机会、新伙伴关系和新战术方法。

我们还想请你对自己提出挑战，让你从战术和战略方面来审视自己的工作。重要的工作是如此之多，资源又是如此之少，因此，人权倡导者可能会把这种自我审视当成一件奢侈的事。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用战术和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就能更快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第130页）或许能够帮助你理顺目标，找到突破口，制定战略，选择实施战略的战术。“需要新战术”（第7页）解释了战术思维在整个人权运动中的位置。

我们希望这本书成为你思考的起点，或者成为你们组织或其他任何致力于改善人权的团体讨论的起点。开个会，从后面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或者头脑风暴一下，想出自己的方案。本书中的问题能帮你更仔细地审视工作中可能用到的各种战术以及战术的各个方面。

在你阅读本书时，一开始注意到的，可能是那些用于你所在的地区或与你的工作领域类似的战术，但那不一定是对你最有用的战术。我们没有按照地理或是人权领域来编辑本书，而是把战术分为四大类：

1. 旨在预防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战术（见“预防战术”，第21页）。
2. 进行干涉以制止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战术（见“干涉战术”，第39页）。
3. 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后，帮助个人和社会重建、恢复的战术（见“恢复战术”，第66页）。
4. 在理解和尊重人权的地方，通过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来促进人权的战术（见“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一章，第94页）。

你可能会思考你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例如干涉或预防，并开始阅读有关章节。同时，你可能很快会发现，这些战术常常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针对不止一个目标。无论你打算怎么做，我们都建议你在阅读本书时要有一个开放的思维，要思考你从每个战术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或者可以如何调整这些战术。有些战术可能直接适用于你的情况，另一些战术可能需要做出更多的分析和调整。“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一节有一个调整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单（第131页）。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检索在线数据库：www.newtactics.org。

无论是本书还是新战术项目，都不打算推销任何一种具体的战术，或告诉你哪些战术适合你的情况。你所处的环境——总体战略、奖金资源、人力资源、政治开放程度、文化因素——需要使用哪些战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总体战略

资金资源

人力资源

政治开放

文化因素

我们希望你会发现，本书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源，能够激励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看到新的促进人权的可能性。本书不是一个详尽无遗的战术目录，而是一个正在不断更新的战术目录。新战术项目还将继续寻找全世界正在使用的创新战术，并且通过我们开发的其他工具来促进这些战术——包括可检索的在线数据库（www.newtactics.org）、培训工作坊、战术案例研究（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等等。我们欢迎你的评论、补充和建议。请使用书后的表格，或通过newtactics@cvt.org与我们联系。

关键词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一些重要的术语。这些术语在其他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定义。下面是它们在本书中的定义。

目标——我们的努力所指向的目的或愿景。

战略——实现目标的关键步骤和手段。

战术——实施战略的具体行动。战术是执行战略的工具或手段。战略决定哪些事重要，值得做，战术是实现变革的手段。战术是关于“如何做”，战略则是关于“做什么”。

对象——战术旨在影响的人群、地方或事物。

积极盟友——公开积极支持并参与你们的工作的个人、组织或团体。

消极盟友——支持你们的目标，但尚未参与推进你们的工作的个人、组织或团体。

研究过程——本书、新战术网站（www.newtactics.org）数据库和新战术研讨会提到的战术来自一系列广泛的工作。有些战术是人权工作者使用过的，另一些战术则是在企业、政府，执法、冲突解决，环境、劳工、妇女权利和其他争取社会变革和正义的运动中的人们使用过的。所有这些都致力于促进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类的基本尊严。

以下文件合称为国际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1948）、《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及其任择议定书，以及其他二十几项人权公约——这些公约都是对批准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本书只包含了非暴力战术，因为我们相信，非暴力战术是最合适的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手段。由于社会的不公而倍感挫折的人们如果使用暴力，往往会助长镇压性的社会措施，这反而会使人权受到更严重的侵犯。我们承认追求人权会涉及斗争。我们希望人们从世界各地学习到这些战术之后，能够找到有效的非暴力的方法来争取人权。

1999年11月，酷刑受害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始研究用于促进人权的战术。我们尤其注意寻找那些能够激励其他人的创造性思维和有效行动的战术。我们的网撒得很大，调查了公民社会组织、国际机构、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了解人们为了建立宪政、争取变革和促进人权都做了哪些事。志愿者们——包括学生、教授、医护人员、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商业顾问、记者、计算机专家等——为此贡献了无数的时间。新战术人权工作组和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研究者联系了人权工作的资助者，出席了会议，检索了书面资料和互联网资料，还进行了无数的电话访谈和面对面的访谈。我们付出了一切合理的努力来联系有关组织以核实书中的信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新战术团队就要决定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可以使用，是否已经公开。如果一个组织不愿意把自己的战术总结或联系信息包括在内，我们就会将有关信息删除。

《人权新战术》第一版印刷于2000年9月，第二版印刷于2001年。第三版建立在前两版所做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之上。

如同所有工作一样，本书也带有作者的倾向，包括我们思路的来源，我们研究技术的局限性。受时间及可用的信息和资源所限，有些章节和案例要比另一些章节和案例完整。读者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指出偏颇和事实有误之处，给我们提供更多可以纳入本书的战术和资料，以此帮助我们改进今后的版本。我们欢迎你在这些方面或为本书其他部分做出贡献。

人权新战术项目

人权新战术项目的领导机构由许多国际组织和人权实践者组成，酷刑受害者中心（CVT）负责协调。本项目旨在促进国际人权领域的战术创新和战略思维。本项目致力于开发工具和网络，用来分享创造性的思想，并促进战术创新，以提高全世界的人权实践者和人权组织的工作效益。

本书是新战术项目开发的若干工具之一，例举了人权工作中各种可能的战术。

新战术网站www.newtactics.org上有一个可检索的战术数据库，还有供人们建立联系和交流思想的论坛。

我们网站上的“战术案例研究”中有一系列第一人称的深度案例研究，让人们能够仔细观察一种战术如何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培训工作坊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举行，我们的工作坊让使用过创新战术的人如聚集在一起，互相进行战术培训，让他们掌握一系列可用的新战术，增强对自己培训能力的信心，建立跨越各个人权领域的网络。

关于酷刑受害者中心

酷刑受害者中心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制止酷刑，治愈酷刑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创伤。

酷刑受害者中心成立于1985年，是美国第一个，全世界第三个酷刑治疗中心。今天，酷刑受害者中心采用整体治疗模式，为酷刑幸存者提供咨询、医疗护理和社会服务；为可能要与酷刑或战争创伤受害者打交道的教育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提供培训；对酷刑造成的影响和有效治疗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地方、全国和国际上进行停止酷刑问题的倡导。

酷刑受害者中心自己就是新战术的创造者，也是一个从独特的角度——治疗和恢复领导能力——来倡导人权保护的治疗中心，新战术项目就是从这些经验中产生的。

更多信息见我们的网站：www.cvt.org。

我们的联系方式：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717 East River Road

Minneapolis, MN 55455

+ 1612 436 4800

cvt@cvt.org

www.cvt.org

合作组织

美国：酷刑受害者中心

尼日利亚：“实现正义”组织

丹麦：丹麦人权研究所

土耳其：赫尔辛基公民大会

土耳其与中东公共管理研究所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ICAR）

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

国际顾问委员会

前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前任美国驻土耳其和泰国大使：莫顿·埃布拉莫维茨阁下

前任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人、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布莱恩·阿特伍德

前任加拿大总理、前任加拿大驻洛杉矶总领事：金·坎贝尔阁下

前任南非宪法法院法官、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理查德·戈德斯通法官阁下

土耳其人权问题最高协调理事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安娜·库苏拉迪

前任美国副总统、前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沃尔特·蒙代尔阁下

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

前任法国总理、欧洲议会就业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罗卡尔阁下

前任霍尼韦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前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埃德森·斯宾塞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

人权工作组

前任墨西哥政府人权和民主事务部副部长：玛丽克莱尔·阿科斯塔

巴西文化行动研究所主任：米格尔·达西·德·奥利维拉

美国国际发展法中心主任、“人权网络”董事长：克拉伦斯·迪亚斯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主任卡：梅利亚·多鲁

亚洲人权委员会中国区域执行主任：巴斯尔·费尔南多

瑞士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员：克劳丁·海尼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主任：巴赫·艾尔·丁·哈桑

前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主席和现任委员、孟加拉国国际女性协会董事：萨尔曼·可汗

丹麦人权研究所主任：莫顿·凯依若姆

加拿大盖博尔基金会执行主任：诺林·麦克唐纳

前任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前任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执行主任：索菲亚·马赫

美国国际和平营董事、普林斯顿大学人权讲师：利亚姆·马奥尼

洛克菲勒基金会非洲地区办公室副主任：帕特·纳多

尼日利亚“实现正义”主任：约瑟夫·奥泰

俄罗斯“公民守望”主席：鲍里斯·普廷塞夫

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马克·里奇

前任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调查员、联合国人员委员会成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

印度南亚童奴问题联盟主席：凯拉西·萨塔亚提

印度亚洲参与研究会执行主任：拉杰什·坦登

阿根廷“公开的记忆”执行主任：帕特丽夏·瓦尔迪兹

前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格伦达·维尔德斯屈特

德国“以食为先”信息及行动网络国际协会执行主任：迈克尔·温德福尔

预防战术

仅仅十多年前，人权组织的焦点主要还集中在公开谴责过去或者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人权“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是大棒，人权工作者所依赖的手段是“点名揭露”有侵犯人权纪录的国家。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现在人权工作的许多新的参与者已经将这一“工具箱”里的工具增加了许多。

过去的十年中，人权环境有了惊人的改变。人权议题已经从创建国际法律框架转向认真讨论实际执行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权工作也从国际转向地方，而地方团体的目标常常包括干涉和预防。例如，一个地方的NGO可能需要就某一具体的酷刑案件与警方打交道，并讨论今后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这些团体使用的战术是传统的人权组织无法使用的。他们不仅批评政府，也和政府部门形成伙伴关系来促进改革和立法；他们为警察部门提供培训课程；他们在关键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存在。

我们仍在继续发展、促进和改善保护人权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的工作。本章所涉及的战术或许会使今后的十年变得更好。

——莫顿·凯依若姆
丹麦人权研究所主任

为了预防侵犯人权事件，当人们遭遇人身危险时，当迁徙自由、工作权利和获得适当住所的权利受剥夺时，当一个团体在社会中有失去自己声音的危险时，或一个社区有陷入贫困的危险时，或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面临消失时，我们必须能够分辨出这些属于侵犯人权的事件。

本章中的战术，旨在预防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行为。有时，最有效的方法只是有人出现在那里。他人（无论是一位来自某个大国的志愿者，还是一群围观的群众）的现身就能阻止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

有时，侵犯人权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没有预防侵犯人权事件所需要的信息。让信息传达到合适的人（因为侵犯人权事件而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能够动员起来反对侵犯人权事件的人），就能制止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有时，保护人权的最佳方法就是消除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了解侵犯人权的模式，就有可能改变这一情境，大大减少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三节：

1. 通过他人在场来防止伤害的人身保护战术。
2. 让重要信息传达到合适的人，以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战术。
3. 预测侵犯人权事件，制造障碍来制止它发生的战术。

人身保护

当他人遇到危险时（或遇到危险之后），如果我们出现在现场表达支持，能够充分展示我们的团结。本战术不仅是一种象征，也是利用志愿者出现在现场来保护他人的安全。这个想法相对简单，却很有力量，因为安全来自支持者的数量。想伤害他人的人可能害怕目击者，害怕媒体的负面报道，或是害怕伤害了某个背后有强势团体或政府支持的人产生的后果。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有用的方法：告诉对方你在高层有朋友。

人权护卫者： [国际志愿者到现场去保护和鼓励遇到危险的人权活动家。](#)

国际和平营（PBI）派遣国际观察员陪伴受到政府或准军事组织威胁的人权活动家。如果目击到侵犯人权事件，观察员就会警告该国政府、自己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的活动家。侵犯人权者预期会有国际反应之后，就有可能停止计划中的侵害行动。与此同时，他们的陪伴和支持也使活动家获得了力量，可以继续并发展自己的人权工作。国际和平营是第一批将陪伴的想法制度化的组织之一。陪伴行动始于1980年代初的危地马拉。目前国际和平营有超过八十名志愿者，在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从事实地工作。

虽然这一战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志愿者，但该战术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全世界许多人的参与。在攻击或威胁发生之后，志愿者要能立即吸引国际关注。为此，国际和平营的志愿者在本国建立了活动家网络。志愿者还动员家人和朋友也加入到自己工作的网络中来，这种方法增加了活动家的经验，扩大了他们的关系网。

对人权活动家和志愿者来说，国际陪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常常会遇到危险和压力，个人生活也会受到限制。国际和平营强调为草根活动家赋权和鼓舞士气，只有在活动家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会提供陪伴，并且绝对不干涉被陪伴者的内部事务。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或参考利亚姆·马奥尼、路易斯·恩里克·艾古仑《非武装保卫：为保护人权而进行国际陪伴》一书（1997年出版）

这一战术建立在我们都会受到道德压力和政治压力的普遍现实之上。国家领导人不希望有负面报道，刽子手不希望有目击者看到他们干脏活。所有人犯罪时都希望匿名，不想被人看到。国际目击者出现在犯罪者面前，同时给领导人施加外界压力，就可能制止侵害行动。与此同时，也向受到威胁的活动家证明，国际团结已经扩大到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让他们更有勇气和力量去从事自己的工作。

陪伴战术也被用于以下类似的环境中：人们有人身危险，而侵犯人权的犯罪者有可能因为国际舆论而有所收敛。其他使用了这一战术的团体包括斯里兰卡的非暴力和平力量、约旦河西岸的基督

教和平工作团、“全国与危地马拉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普世陪伴项目、哥伦比亚的和解团体、墨西哥的弗赖·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中心等。

这一战术也可以用于其他环境中。例如，在充满紧张和暴力的环境中，教会人员、记者的象征力量常常会起到保护人们或使人们冷静下来的作用，因为犯罪者不希望他们的行径被暴露。在海地，“健康伙伴”组织雇用了社区卫生工作者作为现场陪伴，这些陪伴者每天去看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肺结核病人，这样做除了给他们提供医疗和情感支持之外，还让社区成员知道，不必害怕与病人偶然接触。第三方出现在现场的实际工作和象征意义，具有能够改变他人行为的社会和道德力量。

怎样让国际社会关注你们的斗争？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人身保护	美洲 亚洲 多个地区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国家 国际	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B计划：在拘留示威者的警察局外抗议，以保护被捕的示威者。

在米洛舍维奇政权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一群年轻的活动家基于安全来自人员数量的观念，使用二次示威的手段，保护在示威期间被捕的成员，并且以此来告诉当局，逮捕的威胁是无效的。他们还用幽默和戏剧表演来减轻人们对政府镇压的恐惧。

“欧特珀”（意为“抵抗！”的塞尔维亚学生组织）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有成员在抗议活动中遭到逮捕，立即在警察局外进行二次示威——B计划。警方知道外面有大量的民众和记者在等候时，就不太可能殴打或者继续拘留活动家，另一方面，活动家知道自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之后，也不会感到太害怕。

一旦有成员被逮捕，“欧特珀”就动员其巨大的联系网络来执行B计划：

附近一位带着手机的观察员观察到逮捕事件，并确定被捕的活动家关在哪个警察局。

律师立即前往警察局协商释放活动家的事宜。

其他“欧特珀”活动家在一个小时之内会聚集到警察局外面。他们唱歌，做游戏，让人群保持欢快、平静和投入。活动家们会一直待在警察局外面，直到被捕者获释。

媒体中的联系人前往警察局报道抗议活动，在活动家获释后发表他们的声明。

反对党谴责逮捕事件，派其成员前往警察局。

当地NGO通知国际组织，要求他们谴责逮捕事件。

“欧特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组建一个强大、团结，能够迅速动员起来的网络。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来说明逮捕发生之后谁通知谁，每个人要做些什么，让二次示威能够在逮捕发生之后立即进行。联络网中的联系信息都储存在每个成员的手机里，这样警方就无法抢走或销毁这些信息。

“欧特珀”的B计划是一个迷人的战术范例，正好符合本章所讲述的目标。人们使用这一战术来防止警察局内发生迫在眉睫的针对活动家的酷刑。他们的干涉行动削弱了警方的权力，制止了米洛舍维奇政权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帮助被捕的抗议者恢复信心，帮助志愿者克服对被捕的恐惧。示威的曝光也使公众更加认识到：米洛舍维奇政权侵犯人权，民主抵抗运动日益壮大。

“欧特珀”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关键因素。虽然该国受专制政权统治，但“欧特珀”的律师仍能会见活动家，并能对警方造成某些影响。而且该国警方和政权害怕国际舆论和大批民众聚集。但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中，要做到上述两点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你的B计划？

“被捕的活动家都成了英雄，因为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警察局外等待他们。有了这些支持，活动家再也不害怕了。活动家们开始竞争谁是‘头号通缉犯’，谁被捕的次数更多。我们当面嘲笑这个政权，我们出了什么事的话，全世界都会知道。”

——塞尔维亚“欧特珀”成员佐拉那·斯米亚尼克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人身保护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酷刑

保护性现身：在可能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地点出现，监督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在整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检查站观察”组织的成员出现在现场，保护通过以色列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到尊重。

“检查站观察”组织每天早上监督若干个以色列检查站，下午交通高峰期则会在检查站保护必须通过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进行抗议活动。“检查站观察”的志愿者都是以色列妇女。2001年1月，该组织由三位女性创办，后来发展到有三百名志愿者。

监督者认为，检查站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迁徙自由，也限制了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工作的权利，是对人权的侵害。

监督者在检查站主要履行三大职能：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记录所目击到的侵犯人权事件；表明自己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

监督者和巴勒斯坦人都说，以色列妇女的出现阻止了一些士兵对通过检查站的人实施虐待的行为。当士兵企图不让巴勒斯坦人通过检查站，或是没收他们的身份证时，监督者会平静但坚定地进行干涉。当目击到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时，监督者会向高级军官投诉，并且鼓励巴勒斯坦人也这么做。

目击到侵犯人权事件的监督者会制作详细的报告，并发表在她们的网站上。她们还会邀请记者、政治家和她们的同伴一起前往检查站。她们佩戴标志，上面写着阿拉伯语“不要检查站！”的字样。这种支持鼓舞了许多本来对以色列抱有敌视态度的巴勒斯坦人。

“检查站观察”的工作面临许多挑战，比如检查站太多，没有足够的监督者可以监督每一个检查站。志愿者承认，军方不认为有义务向监督者报告工作，也不认为有必要承认她们的存在。以色列士兵的轮岗相当频繁，因此，监督者无法与士兵建立个人关系。每轮新兵到来之后，有些工作就要重新开始，这使情况更加恶化。迄今为止，“检查站观察”组织未能成功实现其结束占领和撤销检查站的目标。但它让以色列民众和全世界人民注意到了发生在检查站的侵犯人权行为。

有些人背后有强大的联络网，能够迅速把信息传递给大量的人，或者传递给身居要职的人，这样的人出现在现场往往更加有效。“检查站观察”利用互联网广泛分享其监督经验，提高了以色列人和国际社会的认识。

如何动员社区中德高望重的人，帮助可能受到人权侵害的受害者？

“我们到达时，检查站另一边有男人、女人、孩子，出租车、载着货物的货车、一辆救护车和一长队小汽车。人们一看到我们，就向我们冲过来，好像我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打了许多电话，最后，一辆吉普车载着一位高级军官过来了。一开始他拒绝和我们对话，他说我们来检查站只是为了出风头和给士兵找麻烦……一位医生和他太太刚刚把女儿送去拉马拉的医院，然后准备通过检查站回希伯伦的家。边境警察让医生通过，但不让他太太通过，因为她的助产士证明文件过期了。我们一直在求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军官的态度突然缓和了下来，他开始发布命令，允许人们通过。五分钟之内，检查站就空了，路上也没有了检查，但是医生的太太还在那里哭泣，因为士兵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我们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拿回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和她丈夫团聚了。离开时，我们听到检查站另一边传来了喊声，还看到医生和其他人跳上跳下地向我们挥手，他们在喊‘谢谢！谢谢！’。”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人身保护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迁徙自由

分享重要信息

让合适的信息到达合适的人手中，对促进人权和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很有帮助。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时代，这件事也会给我们带来挑战。本节所收录的战术，展示了与能够帮助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人、遭受虐待危险的人、公开发言谴责侵犯人权行为人分享重要信息的新战术。其中有些战术需要依靠新技术，另一些战术需要依靠人与人的交往。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个古老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

反暴力手机联络网： [建立一个手机通讯联络网，在暴力升级之前制止暴力。](#)

在复杂难解的北爱冲突中，天主教和新教的政治派别之间找到共识基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双方都有人希望防止暴力的发生。这一战术包括找到各个社区希望预防暴力的领袖人物，给他们提供需要的信息。

贝尔法斯特互动项目（其前身是斯普林菲尔德跨社区发展项目）建立了一个手机通讯联络网，以防贝尔法斯特敏感街区之间爆发暴力事件。该项目给天主教和新教社区的志愿者提供手机，一旦有暴力倾向的人群开始聚集，或者有关暴力的传言开始扩散，他们就会与边界另一边的志愿者沟通。

“边界”是指天主教（民族主义/共和党）和新教（统一党/保皇党）街区相邻的地方，通常由坚固的墙壁隔开，边界两边往往是北爱尔兰经济上最贫困的街区。怀疑墙那边在发生什么事，常常会导致或者加剧暴力事件。

双方的志愿者每周会面一次，他们的手机一直开机。如果有可能导致暴力的活动举行，如体育比赛或新教徒游行穿越天主教街区时，联络网就会事先规划对重点地区进行监视。志愿者们坦言，他们的干涉对“娱乐性暴力”（年轻人寻求刺激或对传言做出反应）最有效，但是对有组织的暴力或准军事组织的暴力却无能为力。

当志愿者看到或听到边界两侧有人群聚集，或听到关于另一边要发生暴力事件的传言时，就会给边界另一边的志愿者打电话。志愿者们会在事件转向暴力之前让自己这边的人群冷静下来。

项目开始之后，手机通讯联络网既预防暴力事件，也在暴力发生时给边界两边的社区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志愿者每周的会面，也创造了一个定期参加跨社区对话的核心人群。这种关系发展成熟之后，手机通讯联络网也开始处理双方社区共同面临的其他问题，包括地区经济的长期振兴问题。

手机技术的普遍使用，使现在比以往更容易对迫在眉睫或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在北爱尔兰，手机使沟通成为可能，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双方并没有期望能建立很强的关系，只是都希望结束暴力。

“当边界这边的孩子们聚集时，经常会有传言说他们打算要干些什么，然后边界另一边的孩子也会聚集过来……但是如果你能给另一边的人打电话，核实是否真有什么事快要发生，你就能在自己这边的群众中平息传言。

在我们建立联络网之前，边界这边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们那边正在做这个’、‘他们那边正在做那个’，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现在，我们有了对付这些传言的手段。”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互动项目手机通讯联络网成员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和平

手机让选举受到监督：用手机传播计票结果，防止篡改选票。

在另一些情况下，手机通讯联络网也很有用。例如，在选举投票期间和投票之后，控制投票箱和计票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在肯尼亚，手机通讯联络网被用于选票可能被篡改之前公布计票结果，以保证选举公正透明——藉此来保护人民参政的权利。

2002年，肯尼亚总统选举期间，独立监督团体利用手机保证选举过程公正，使用的方法是即时报告各个投票点的计票结果。

在此前的选举中，选票在计票结果公布之前会被运到计票中心。虽然这一过程有观察员监督，但拖延给舞弊——至少是舞弊嫌疑打开了方便之门。手机所提供的即时通讯（肯尼亚许多投票站没有固定电话线路），使改变选举结果变得难上加难。

负责监督选举的两个团体民主教育研究所（IED）和肯尼亚国内观察员项目（K-DOP）持有选举委员会颁发的证明，有权观察计票工作。民主教育研究所的志愿者进驻到肯尼亚二百一十个选区中的一百七十八个。志愿者使用自己的手机，会得到二千肯尼亚先令（约二十六美元）的津贴。计票工作一完成，他们马上打电话向民主教育研究所总部报告，计票数据立即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志愿者们也会打电话报告暴力和舞弊行为。民主教育研究所公布的计票结果甚至比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还要早，因为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公布计票结果的程序比民主教育研究所更复杂。

肯尼亚国内观察员项目也使用志愿者联络网，不过他们没有手机补偿津贴。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在没有固定电话线路的情况下，也会使用政府提供的卫星电话或自己的手机报告计票结果。

这些团体独立而迅速地报告计票结果，使选举变得公开透明，这有助于防止选举失利的一方因怀疑对方舞弊而导致的暴力。迅速报告计票结果迫使两位主要候选人及其支持者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手机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确保选举公正，保护人民在自由和真实的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基本人权。然而，即使快速的沟通，也不能加快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一位肯尼亚观察员注意到，官员们使用手机报告例如某些选民没有注册选民资格这样的问题，事实是，因为注册选民资格的程序太复杂，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不愿意注册。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最近的选举中也使用了手机。2000年，秘鲁大选期间，秘鲁的“透明度”组织派遣无党派监督员，到随机抽取的投票站调查投票人数，对投票和计票过程的质量评估，以及该选区的选举结果进行监督，然后用手机向他们自己的数据分析中心报告。有些报告来自偏远的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透明度”的数据分析给当时的秘鲁总统藤森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迫使他接受了败选结果。

你们可以怎样使用手机或者其他技术手段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帮助促进人权？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民主

幸存者知道问哪些问题：**让侵犯人权事件的幸存者参与鉴定和营救可能的受害者。**

侵犯人权事件的幸存者对侵犯人权行为可能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有独特的知识和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防止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尼泊尔母亲之家招募曾被拐卖过的妇女来帮助解救其他妇女和女孩。

尼泊尔母亲之家的工作是阻止跨越尼泊尔和印度边界贩卖妇女和女孩的活动，她们采取的方法是看上去可能被拐卖的女性谈话。由于尼泊尔母亲之家的谈话者中有许多是被拐卖的幸存者，所以她们更容易发现其他陷入危险境地的妇女。

印度的妓院和市场对性工作者的需求增加，导致尼泊尔拐卖妇女的活动也有所增加。对付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防止拐卖者越过边界。但边境警察常常认不出哪些是可能的受害者，或者认出来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尼泊尔母亲之家在尼泊尔边界的十一个过境点与边境警卫密切合作，与可疑的旅客谈话。他们截停每辆汽车和人力车。如果有妇女或女孩与男人同行，边境警卫负责询问男人，尼泊尔母亲之家的工作人员则负责询问妇女。她们的问题包括：“你为什么去印度？”，“你认识这个男人多久了？”并且观察妇女的肢体语言、衣着和妆容。谈话期间，他们也会告诉妇女印度性交易的情况。

如果男人和妇女回答的不一致，男人就会被当作拐卖妇女的嫌犯拘押，妇女和女孩会被送往尼泊尔母亲之家在边界附近修建的过渡庇难所。妇女们在这里能够得到食物和咨询。如果这些妇女愿意的话，还能得到医疗检查和返回家乡的交通工具。如果亲属们不想把这些妇女领回家，或者发现这些妇女的亲属参与了贩卖活动，尼泊尔母亲之家会为这此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工作培训。

这一战术的结果是，有成百上千可能的受害者被解救，拐卖妇女的嫌犯被起诉。这一战术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者。

在涉及拐卖妇女、家庭暴力、儿童性骚扰、强迫卖淫的案件中，外人可能不像幸存者那么容易发现侵犯人权的行为。潜在的受害者可能也更愿意与那些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谈话。因此，在实施这一战术时，侵犯人权事件幸存者的参与至关重要。如果受害者愿意帮助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她们对于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何进行的独特知识，对致力于结束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组织是无价之宝。在实施这一战术时，同样至关重要是尼泊尔母亲之家与边境警卫的成功合作，并且该组织不会将被解救下来的女性送回到她们卖给人贩子的家庭。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信息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贩卖人口

保护有时限的人权：在权利保护有时限时，告知潜在的受害者他们的权利。

有时候，法律给人们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利强加了短暂而任意的规定。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住房平等权利中心（CERA）使用快速反应战术来告知人们的权利和采取行动的截止日期。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住房平等权利中心（CERA）与可能被驱逐的房客联系，给他们提供避免被驱逐所需要的信息。加拿大法律规定，房客对驱逐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时限为五天，许多人没有信息或资源做出免于被驱逐的快速反应。

1998年，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允许房东在出租屋空置的情况下，根据市场价提高租金，这造成很多房东驱逐房客，尤其是在房屋空置率较低的社区。安大略省每年约有六万房客面临驱逐。

住房平等权利中心向安大略房屋出租法庭请愿，要求获得面临驱逐的房客名单。该组织得到了名单，条件是要保护房客的隐私。住房平等权利中心通过邮件给每个已经被房东申请了驱逐令的房客发送信息包。然后志愿者进行电话跟踪，告诉这些房客，他们的房东已经申请了驱逐令，在五天的时效过期之前他们有哪些权利。志愿者与房客讨论可能的选择，介绍他们去有关机构。志愿者也会询问房客被驱逐的原因，以便给住房安全事业提供重要信息。住房平等权利中心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出现。

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每年联系约二万五千人。那些通过电话联系上的房客的被驱逐率下降了超过20%。但是，2003年3月，由于隐私委员会裁决禁止发布驱逐数据，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无法再继续其驱逐预防项目。目前，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正在就这一裁决进行上诉。

虽然安大略省的住房法给予房客就自己被驱逐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客都了解这些信息，也就不能在允许的时限内保护自己的权利。住房平等权利中心的战术帮助这些房客及时获得了这些信息，也就能够利用这些信息。住房平等权利中心确实需要获得面临驱逐者的名单，其他案例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名单，或者拿不到这样的名单。另外，不是所有的房客都能通过电话联系上，也不是所有的房客都愿意或者能够投入精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你们的斗争需要一个快速反应网络吗？如果需要的话，哪种类型的网络有用？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居住权

高危人群技能培训：利用非正式教育技术给高危人群提供所需要的技能，使他们能够在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功。

1990年代，蒙古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开始了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许多妇女（和她们孩子）有可能被经济改革抛弃，陷入贫困、饥饿和虐待的危险之中。戈壁妇女项目试图给蒙古偏远农村地区的妇女带去所需要的信息，让她们能够在新兴的经济体制中取得成功。

蒙古国政府利用广播、印刷品和家访教师等非正式的教育工具，向弱势和边缘化的戈壁妇女伸出援手，教给她们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所需要的新技能。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也结束了中央集权的国有经济。在集体农场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们，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牲口，生产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许多人没有技能和资源来做这些事。戈壁沙漠（该地区气候极端严酷，交通和通讯系统很差）中的游牧妇女尤其弱势。由于缺乏商贸技能，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面临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境地，还可能面临暴力和虐待的风险。

政府成立了戈壁妇女项目，邀请所有生活在戈壁沙漠中的妇女参加社区规划论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戈壁妇女项目认为，有三个及三个以上孩子的单亲母亲是他们优先关注的群体，广播节目和其他非正式教育是影响她们的最佳方法。（非正式教育指的是在校外进行的非强制性的学习。）

广播节目提供的信息包括贸易技能（比如生产羊毛，加工骆驼毛，制作毛毡、马鞍和传统服装）、商业技能（比如规划和价格谈判）、医疗保健问题（比如计划生育、卫生、营养、急救）。广播节目每周两次，通常在晚间播放——这是多数妇女都愿意收听的时间。不能收听节目的妇女可以到当地的学习中心去拿录音带。政府还制作了和广播节目一起使用的配套教材，家访教师会检查妇女们的学习进展，并提供补充材料。

非正式教育手段成功地动员了妇女们把握自己的经济未来。妇女们组织了本地市场，启动了跨社区合作项目，还支持政府扩大该项目，以便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包括在内。

本案例中的技能建设战术是用于确保经济权利的战术，不过，类似的非正式教育手段也可以用于受其他问题影响的偏远人群。戈壁妇女项目的工作人员在设计项目和选择传播媒介时，考虑到了他们想要影响的妇女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在你们的社区中使用非正式教育项目来促进人权？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亚洲	政府	社会	全国	发展

提供主张权利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赋权，让人们能够利用法律制度行使自己的权利。**

某些得到宪法保护的權利，在法律和实际执行中往往并未得到保护。俄罗斯“圣彼得堡士兵之母”组织为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让他们能够主张不服兵役和遭到虐待时不归队的宪法权利。

“圣彼得堡士兵母亲”向应征入伍者、新兵和军属告知他们的合法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

在俄罗斯，所有青年男子都要服兵役。虽然1993年的法律免除了健康状况不佳或处境困难者（如父母退休、生病，或者本人仍在上学）的兵役义务，但征兵委员会经常违反这条法律。“圣彼得堡士兵之母”记录了许多案例，例如患有身体或心理疾病，本应免服兵役的青年男子被迫服兵役。征兵委员会与警方合作，在街道上，在学校和宿舍里，甚至挨家挨户搜查年轻人而臭名昭著。一旦参军，年轻人就要面临可怕的处境，包括羞辱和低于标准的生活条件，殴打和精神折磨。

“圣彼得堡士兵母亲”为应征入伍者、新兵和军属开设了名为“保护我们的儿子”的人权学校，教给学生们如何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学校鼓励学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克服恐惧，相信法律能够保护他们。

人权学校的培训课程每周举行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给政府写申请，就法律与人权问题进行讨论和角色扮演。学校还每年出版一本指导手册。

多数人现在可以看到自己的医疗档案，并可以提交给军医。“圣彼得堡士兵母亲”有十名工作人员，还有许多俄罗斯和国外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问卷跟踪每位人权学校的参与者，给每个人和每个地区建立了档案。申请免服兵役取得成功的参与者会来介绍经验。在超过十二年的时间里，有大约十二万人参加了培训课程，有九万人保护了自己不服兵役的合法权利，大约五千在军中遭受酷刑者申请不归队取得了成功。

从理论上说，俄罗斯宪法中确实有条款保护那些害怕在军中遭到虐待或者已经遭到虐待的年轻人，但缺乏信息和不敢使用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常常不被使用），让许多人们无法利用这些权利。“圣彼得堡士兵母亲”提供了有关这些权利的信息，还向政府写信反应有关情况，指导士兵通过司法系统维护他们的权利。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军队与警察问题

通过公开透明反对腐败：[在线追踪政府官员的工作来反对腐败。](#)

在韩国，首尔市政府使其官员行为更加诚实的方法是在互联网上公开重要信息。

韩国的首都首尔市政府创建了一个在线数据库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OPEN）让该市居民能够监督民事申请的详细情况。该数据库包括住房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城市规划等七十项被认为最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政府工作。

开发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之前，申请政府许可的人看不到自己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有关过程是不透明的，这就给了政府官员索贿的机会。

现在，官员们收到或者更新申请时，要填写一个标准化的数据表格。各部门都用这个表格来更新在线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申请者能看到自己的申请在谁那里，申请程序预计将于何时完成，推迟的理由和拒绝的理由——如果申请被推迟或拒绝的话——都是什么。

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是和其他反腐败计划一起建立的。这些计划包括：对索取和收受贿赂的官员施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寄给市长的腐败举报卡；让市民可以打电话给市长办公室的电话专线，就腐败案件提出举报；让官员在各部门之间轮岗，以防止任人唯亲。

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每天有二千五百次点击量。首尔市政府所做的一项互联网调查显示，78.7%接受调查的居民认为，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的腐败。最近，政府还公开了大约三十五个市政府委员会的信息。这意味着居民们也能通过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系统来监督各委员会的管理。

虽然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的作用是预防个人申请政府服务时遇到的腐败问题，但它也介入了更多的领域，试图结束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问题。这一系统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市长办公室的积极参与和持续支持。没有这种拥有公共合法性的高层人士的支持，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这样的系统很难实施。该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有助于这种反腐败战术取得成功。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分享重要信息	亚洲	政府	社会	地方	腐败

减少侵犯人权的**机会**

侵犯人权行为通常有一个模式——发生的地点和环境都是可以预测的。发现并破坏这一模式，是保护人权的关键。如果监狱存在酷刑问题，那么人们就要尽量远离监狱以免遭遇酷刑。如果政府可以通过掌握个人信息来侵犯隐私，那么人们从一开始就不要留下隐私记录。本节中的战术可以用于防止出现人权问题和侵犯人权事件，方法是使这些问题和事件不可能发生——即消除所有侵犯人权的机会。

工人拯救工厂和自己的工作机会：**利用征用法确保经济权利得到保障。**

在企业关门，工人失去工作之时，个人、家庭和社区都有陷入贫困的危险。最近，阿根廷由于经济低迷，许多企业关门或破产。

企业关门或破产之后，阿根廷的工人通过拒绝停工来防止失业。工人们利用鲜为人知的征用法阻止债主搬走设备，接管破产的工厂，这一方法保住了将近二百家企业的工作岗位。这些企业从冰激凌厂、金属制品厂到四星级酒店、造船厂。

在1990年代末，曾被誉为“经济奇迹”的阿根廷经济开始衰退，许多阿根廷人陷入贫困，工厂占领运动应运而生。这一战术遵循一个整体模式：

首先，企业破产或被关闭，工人接管企业并合作经营，他们阻止债主搬走机器，申请法庭令，要求给予他们继续经营企业的权利，使他们被拖欠的工资得到赔偿。法庭令所依据的法律，最初制定的目的是允许地方政府为了公共工程项目征用财产。工人们在根据这一法律申请法庭令时，必须同意，要在规定的期限内付给企业所有者其资产的公平价值，而且只有盈利才能拿到自己的工资。

这一战术拯救了超过一万个工作岗位，几家被接管企业的工人已经逐渐拥有了他们接管企业的资产。

利用征用法来证明接管工厂的合法性是出于绝望，但这种做法的潜力不仅让企业能够继续开工，它还是迈向提高生活水平，防止贫困在弱势群体中蔓延的一步。这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达的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减少人权侵害的机会	美洲	公民社会	企业	本地	经济权

社区调解：创造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防止可能侵犯人权的警察介入。

本战术的思想是让人们远离警察局——也就远离了遭受酷刑的危险。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在法院系统之外进行争端调解。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CVICT）建立了一个社区调解程序来代替刑事司法体系。这一程序能够防止某些人遭到不必要的逮捕，或被带往警察局——有60%被抓进警察局的人因为酷刑折磨而被迫招供。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对发生争端的类型进行了研究，然后开发了一套针对社区领袖——包括妇女和贱民（不可接触的种姓）——的培训课程，内容是用以人权为基础的社区调解程序解决争端。

该程序是用于解决暴力犯罪以外的争端，无论年龄、性别、阶级或社会等级，人人都能使用。为了招募培训师，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在各个社区召开群众大会征求培训师的提名。获得提名的人要接受人权、地方法律和处理争端的方法等方面的培训。接受过培训的人可以参与争端调解工作，然后参与过争端调解工作的人再去培训其他人。

这些人会在当地建立争端调解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中至少要有30%的妇女，还要有至少一名该社区少数族裔的代表。调解程序的步骤和规则非常清楚，首先要有调解申请，还要有双方的代表参加。

在调解会议上，五到九名接受过培训的调解员位于争端双方中间，争端双方还可以带来各自的支持者。调解委员会要解释调解程序的安排，各方及其支持者陈述各自的理由。然后，调解员让各方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通常，解决方案就是这样从冲突双方和社区中产生的。不过，调解员也有权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或者代表一方提起法律诉讼，这使得富人也愿意参与调解程序。

在实施了这一程序的三个地区，调解系统都提高了实现正义的可能性，改善了权力结构，大大减少了逮捕的数量；第一年中就有三分之二的案件通过调解得到解决，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诉诸警察和法院。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社区调解项目已经解决了大量的地方争端，该项目提升了人权意识，减少了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的冲突。尼泊尔的酷刑受害者中心正在将该项目扩大到十二个地区，将惠及该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由于尼泊尔的警察常使用刑讯逼供，因此，调解就成为一种让人们远离警察局来防止酷刑的有效方法。这一战术也有其他明显的益处：它让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或投诉无门的无权者有了更多实现正义的机会，还培训了当地人在社区担任领导工作或扩大领导作用的能力。

“我来自一个村庄。我的许多同事都在村里工作。人们总是抱怨解决争端要花费太多时间。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争断了，这有助于避免酷刑，还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发展活动。”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博根德拉·夏尔马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减少人权侵害的机会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本地	酷刑

处理记录：销毁政府可能利用的记录，保护思想自由和公民隐私权。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组织正在加强防止隐私权和知识自由遭到侵害的工作，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少地保存记录。

美国的图书传统上是通过尽快销毁不必要的图书馆记录来防止知识自由受到限制。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协会，有超过六万四千名会员——正在利用其影响力，与其会员一起反对联邦修改减少对图书馆记录保护的律。

美国有四十八个州的法律要求图书馆要对读者的记录保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职业道德和保密政策也要求保护读者的隐私。然而，2001年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却特别批准联邦执法机构搜查图书馆的记录和公共计算机终端，以便查看读者正在读什么书，访问什么网站，将其作为预防恐怖主义的手段。

为了应对《爱国者法案》，各图书馆检讨了自己的记录保存政策，以确保尽快销毁不必要的记录。美国图书馆协会制作了指南，包括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读者记录，只要记录没用了就立即销毁。全国的图书管理员们在销毁读者记录的时候——这完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性组织支持他们。

这个强大的全国性组织——美国图书馆协会正在使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抵抗行动，这个行动如果在全国开展起来，对图书管理员个人来说也相对安全。但在更加专制的环境中，这种抵抗行动即使完全合法，也可能招致报复。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减少人权侵害的机会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思想自由

在线发布原住民的文化：通过记录传统的生态知识来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经济权利。

许多原住民发现，私营公司获取了他们传统知识的专利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全国性的科学组织正在致力于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科学与人权项目建立了一个可检索的传统生态知识在线数据库，以防私营公司获取这些知识的专利。“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T.E.K.*P.A.D.）的网址是 ip.aaas.org/tekpadd。

全世界的原住民都有系统的栽种植物的传统，和开发利用这些植物的方法，以便给自己的社区带来收益。有时，发达国家的私营公司未经社区的许可就获取了相关知识的专利。专利法允许专利

持有人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专利对象的使用和出售，而不用对社区承担任何义务，也不用与社区分享利益。有时，专利持有人还可以阻止有关社区使用自己的知识或从中获利。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帮助结束了这种情况，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让原住民的知识进入公有领域，使其被定义为“已有技术”。一项发明只有是新的、有用的，而且不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才能获取专利。如果发明或者知识已经被发表在某一个地方——这是成为所谓的“已有技术”的一种方式——那它就不再是新的知识了。对于私营公司获取专利的行为，传统知识往往十分脆弱，因为这些知识很少被发表在什么地方，即使发表也常常被忽视。

有关信息进入数据库之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和其他专利局在搜索已有技术时就更容易找到它。美国科学促进会积极寻找属于公有领域的未受保护的传统文化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的信息录入数据库，以便进一步加以保护。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也允许人们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人必须证明自己事先得到了社区的同意。美国科学促进会鼓励有关社区在将自己的知识加入数据库之前，先讨论有关问题处理的各种方法，比如是否要将这些知识申请专利。美国科学促进会开发了一个手册，帮助社区评估这些方法，该手册参见shr.aaas.org/tek/。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目前已经保护了三万种由原住民社区栽种和管理的植物免遭专利的剥削。

如果允许私营公司持有有可能成为某些社区的生活基础的传统知识专利，这些社区就有可能失去其文化和经济权利。如果他们被禁止继续使用这些知识，或者被迫支付专利使用费，他们的生计和传统就有可能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使用记录和发表的战术，能够帮助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用这一战术来保护原住民从（在某些案例中）已有千百年历史的知识中获益的权利，是一个有益的做法。在线数据库也能用于提高对侵犯人权事件（如普遍的腐败和贫困地区污染严重的问题）的认识，还能用于推动政策的改革。

人权新战术	预防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减少人权侵害的机会	多地区	公民社会	社会	国际	原住民权利

干涉战术

我曾幸运地代表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参加过几次干涉行动，也观察过世界上其他许多成功的运动。1980年代末，我帮助发动了“地毯标志认证”行动，这是第一个通过自愿标志认证的方法防止地毯制造业使用童工的行动。我所在的组织“拯救童年运动”成立的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是一个由七百五十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反对使用童工的网络——译者注）解救了六万五千名受奴役的儿童，帮助他们恢复了健康。我们还通过1998年的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使这一问题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全世界其他的消费者运动——包括地毯消费者运动、清洁服装运动、脏球运动——也利用了消费者的力量来帮助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与此同时，像拉丁美洲的清洁环境运动和争取劳工权利运动，非洲的争取妇女权利运动等民众动员运动，证明了人们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削弱了侵犯人权者继续侵犯人权行径的能力。

上述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草根团体发起的。虽然法律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但是人们在人权方面的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不断恶化。事实是，我们不能仅仅把人权当成法律问题。当人权受到侵犯或有人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时，人们需要实地进行干涉。

在本章中，你会读到一些个人和组织的故事，他们致力于通过这些运动和其他创新战术来制止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受到这些故事的鼓舞，继续与侵犯人权行为做斗争。

——凯拉西·萨塔亚提

印度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和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全球教育运动（GCE）主席

本章中的战术，都可以用于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否认人权问题存在的情境进行干涉。因此，这些战术是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令人鼓舞的。本章中的人权实践者在危险的情境中开展工作，与根深蒂固的权力做斗争，努力改变现状。他们挑战人们长期形成的期待和信念，质疑当地的传统。他们反抗已经被社会接受，并成为了文化规范的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他们常常从权力结构的底层开始工作，并且动员了大量的资源：性工作者们联合起来，拯救年轻女孩，防止她们被迫从事这一职业；童工们组成工会，保护自己的权利；无地农民耕种闲置的土地；地方政府公开反对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政策。

在本章中，你还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和赞美的案例：位于权力结构顶端的企业也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对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情境进行干涉。

在许多战术中，人们用当权者的武器来反对当权者滥用权力。他们研究预算和法律，公开要求政府恪守承诺。他们利用传统文化和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的力量，要求用更高的标准来保护人权。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四节：

1. 抵抗战术：展现人们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对。
2. 中断战术：利用直接行动影响侵犯人权者，使其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
3. 说服战术：利用德高望重的领袖和非对抗性的制度机制协商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4. 激励战术：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替代手段。

抵抗战术

抵抗战术能够用来展现人们对于侵犯人权行为和否认人权问题存在行为的反对。抵抗战术有两个重要功能：让当地、全国或者国际上受影响的人、可能改变现状的人、准备犯罪的人能够看到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战术也为那些能够进一步影响变革的战术创造了条件。

这些战术看起来很简单：土耳其的一个战术只需按动一个开关——最终却按动了数百万个开关！——爱沙尼亚的另一个战术则始于一场歌唱节。但这些战术也可能涉及精妙地使用诸如预算和法律之类的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复杂机制。

按动开关：通过任何人在家里就能没有风险地完成的一个简单行动，创造大规模的抗争。

在土耳其，大量民众参加运动不仅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而且还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有数百万之多——参与到运动中。

“黑暗带来光明”运动动员了三千万土耳其人，他们将开关电灯作为公开示威，反对政府腐败的手段。在土耳其，腐败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民众对结束腐败或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由于许多民众不敢参加政治行动，因此，需要一种风险较低的战术来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带来的孤立感。“黑暗带来光明”运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无风险、人人都能做的行动——每晚在同一时间关灯，以此表达人们对缺乏步调一致的反腐行动的不满。

构思这个运动最初是为了回应一个丑闻：政府官员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活动前一个月，组织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行动。他们与各个草根组织和工会结成联盟，要求这些组织向其成员传真有关抗议活动的请愿书和信息，然后收到请愿书和信息的人再给自己的朋友和联系人发传真。他们也征集了一些专栏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和电视播音员来发布这些信息。

组织者最初建议，人们每晚关灯一分钟。然后，人们开始迅速开关电灯。到了第二周，各个社区开始即兴创作，发起了各种不同的街头行动，包括敲击锅碗瓢盆。到组织者叫停时，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虽然某些涉及丑闻的官员仍然留在议会中，但运动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政治和法律变革，其中包括若干名商人、警察、军人和黑手党头目受到审判，议会中也开展了反腐运动，许多未能处理好政府腐败问题的政客被撤职。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要求人们采取的行动非常简单。它不需要准备工作，也不需要多少投入，人们能够广泛参与。因此，这一战术很容易进行复制到其他行动中。事实上，类似的战术已经被用于全世界许多行动中。赞比亚民众每周五同一时间敲响汽车喇叭，抗议总统修改宪法以便继续连任。智利民众通过敲响汽车喇叭、敲击锅碗瓢盆来抗议皮诺切特政权。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是让那些生活在恐惧中，感到孤立、孤独和挫败的民众了解，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同样的事情。

这种战术的长处，是能让不可见的事情变得可见。衡量这种战术是否成功的方法，是看它在民众中动员的能力，扩大运动的政治空间，让更多的民众在扩大的政治空间中共同行动的能力。

这种战术虽然在概念上十分简单，但要取得成功并不容易。仅仅一个月之后，“黑暗带来光明”运动的组织者就无法再次将这一战术恢复到同等规模，尽管存在的问题和机制许多都是相同的。这一战术的目的一旦达到，就需要改变战术，使运动继续向前推进。

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使用这种战术？

你们的国家存在众所周知，但由于恐惧或冷漠而不敢公开反对的侵犯人权行为吗？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亚洲	公民社会	国家 国际	国家	腐败

唱歌革命：共同维护文化认同，以此表达对专制政权的反对。

1980年代，爱沙尼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们走出家门，公开歌唱他们的传统歌曲。

1988年6月，数十万爱沙尼亚人（估计多达三十万人，占爱沙尼亚人口的三分之一）连续五个晚上聚集在首都塔林，歌唱被禁唱或者有政治风险的民歌。在这个夏天，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也举行了同样的歌唱节。这场著名的“唱歌革命”，是1991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一步。

苏联体制企图摧毁人民与其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这种民族认同中，某些被政权认为无害的元素（如某些民歌）得以保留下来，另一些元素则被掩盖起来（比如，必须把爱沙尼亚称为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得庆祝爱沙尼亚被苏联占领前的国家节日），但仍然有些人记得它们。那些保留下传统记忆的人们使用这些传统来提醒自己的同胞，他们是爱沙尼亚人，而不是苏联人，并且提供一种安全的方法在公开场合表达民族认同。

歌唱节使用强有力的民族文化象征，激励和宣传了新生的抵抗运动。许多参加者身传统服装来到体育场，歌唱爱沙尼亚歌曲。在一个把文化同质化当作压制手段的统治之下，歌唱节给爱沙尼亚人提供了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是爱沙尼亚人而不是苏联人的机会。三十万同胞的出现，也降低了抵抗的风险。

歌唱节由爱沙尼亚传统协会组织，爱沙尼亚传统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利用当时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公开庆祝爱沙尼亚的国家纪念日，恢复被苏联占领之前的国家象征，例如国歌和蓝黑白三色爱沙尼亚国旗。在波罗的海三国几乎没有流血的独立斗争中，这些象征是最有力量的武器之一。

“歌唱革命”利用了波罗的海国家深厚的文化传统，包括歌唱节——其历史正式的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非正式的则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之前。其他文化中可能也有类似的强大传统，如歌唱、舞蹈、戏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或者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例如智利失踪者的亲属曾经利用所有智利人都学过的需要成双成对跳的传统民间舞蹈。当一位妻子或丈夫独自一人跳起这种需要成双成对跳的传统舞蹈时，人们就知道他或她的伴侣被失踪了。

当你想要动员大量民众的时候，困难常常在于如何让人们感到公开说话是安全的，如何向他们保证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歌唱节的组织者相信安全来自人的数量：当数十万计的歌手出现时，参与者就有了一定的安全感，虽然没有什么方法能保证他们是真正安全的。

在严厉压制的统治下，哪些文化传统可以让你们社区的人民团结起来？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文化权利

对比官方记录和现实：举行公开听证会，让公民们能够就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向官员提出质疑。举行公开听证会

印度一个团体通过组织有关公共开支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向政府问责。组织者认为，即使像财政分配这样的技术议题也能吸引民众的关注。

印度“工农赋权”组织举行公开听证会，曝光挪用发展项目资金之类的腐败行为，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官方的记录与出席听证会的村民报告做对比。

印度和许多国家一样，腐败官员和乡村土豪劣绅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操纵发展计划，使穷人无法从项目中获益，使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长期存在。

“工农赋权”的活动家和当地居民对村里或该地区的腐败举报进行调查，举报通常是当地居民提出的，居民们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要求村务委员会或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提供官方记录文件。尽管这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常常是一场斗争，有许多的障碍。拿到官方记录文件之后，“工农赋权”的活动家和当地居民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村民对官方记录文件进行核实。

然后，“工农赋权会”举行有成百上千名村民出席的公开听证会。组织者邀请媒体、政府官员和被怀疑有腐败行为的人出席。“工农赋权”的活动家——多数来自该地区——宣读并解释官方文件，例如，官方文件声称在村里建了一个卫生所，或者某个建筑项目的工人得到了某个数额的报酬。然后，他们将 these 文件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活动家们宣布自己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村民们也会提供证词。听证会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组织者一个接一个地审核发展项目或腐败案例。最近，他们围绕当地的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工作情况，以及食品安全计划和公共分配系统的运转情况组织了公开听证会。

虽然这一战术在透明度和问责的问题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但在后续的官方行动上产生的影响则是复杂的——有几名官员被捕，政府的调查开始推进。在有些村子里，出席听证会的腐败官员同意配合调查，甚至退回了贪污的资金。但是，“工农赋权”的活动家们必须通过持续的动员和压力来对听证会的结果进行跟进，才能确保官方采取行动。

“工农赋权”的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是获得政府的记录，包括公共开支记录。“工农赋权”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宣传，动员若干地区的村民举行静坐，使用了一系列战术促使拉贾斯坦邦政府通过了一

项法律，要求官员必须根据人们的申请，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来提供所有涉及政府活动（包括发展项目、公共资源和开支）的文件。这带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信息公开运动，其他几个邦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最终印度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

可以用哪些战术来确保地方政府的开支有助于维护当地人民的权利？

“我们把要求获得信息作为维护人民知情权的民主手段。印度各地的人民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以控制腐败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不仅是要求获得信息，也是要求分享管理权。”

——印度“工农赋权”活动家夏克提·桑戈索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腐败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利用教育手段和各种资源，鼓励地方政府、组织和个人起来反对危及人权的联邦立法。

本部分内容证明，地方组织和地方政府可以合作抵抗联邦法律。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BORDC）提供了各种工具和资源，帮助地方上的《人权法案》支持者告诉地方政府和社区成员，联邦反恐立法和政策是如何侵犯人权的。许多地方团体与其所在的市、镇、县的政府合作，通过了支持《人权法案》的决议或法令，以正式表达他们反对侵犯公民自由的立场。这些法令要求地方执法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雇员不要配合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要求。

2001年底，《爱国者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它规定了一个新罪名——“国内恐怖主义”——还给予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窃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调查医疗、财政、图书馆和学生记录，没有事先通知就进入住宅和办公室。该法律和其他立法允许不经司法上诉就驱逐和拘留非美国公民。《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认为，这些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条款。

认识到该法律和其他反恐政策和立法授权的工作，很多都要由地方政府执行之后，一群《人权法案》支持者（他们最后成立了《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举行了一个全社区的讨论会。他们散发请愿书，要求市议会通过决议，反对该立法中的所有条款，并要求地方执法机构拒绝执行侵犯社区公民自由的命令。他们还邀请企业、个人和组织参加公共讨论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许多人加入活动家的行列，提供资金，散发请愿书，在市议会的

会议上为有关决议征集支持，他们通过展现该决议得到的广泛支持和普遍欢迎，增加了决议的可信度。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说服市议会主席担任决议的提案人。然后，《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开始在邻近的城镇和全国各地开展类似的工作。该组织工作的核心是在他们的网站上详细解释教育公民和争取公众支持市议会通过决议需要采取的步骤。内容包括决议范本、请愿书、新闻发布会、传单、常见问题解答和新闻报道，还说明了如何组织公共讨论会，并且提供了其他的运动手段。

（到本书付印时）已经有二百六十七个市、镇、县及三个州通过了该决议——这些市、镇、县被称为公民自由安全区——废除可能影响人权的立法条款的势头与日俱增。公民自由安全区的人口加起来已有四千七百万。《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的网站上提供信息，帮助学生、教师、宗教团体、工会和专业团体组织起来。

《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一开始是在自己的社区动员改革，然后决定将其工作扩大到全国，与其他社区分享自己的经验。他们帮助城市和社区认识到，人民可以站出来反对人权恶化，这给联邦政府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种抵抗方式在权力边界清晰的分权政体下特别有效。这一战术也可以经过改造，以适应垂直政治结构的体制。不过垂直政治结构体制下的地方当局所要承担的风险可能会高很多。

这种做法在你们国家会起到什么作用？

“市政当局的责任是确保居民感到安全，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免遭不公正的待遇，不在没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被侵犯隐私，不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秘密拘留。多数民选地方官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在该市维护州和联邦的宪法，包括《人权法案》。”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网站www.bordc.org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公民权利

请愿：组织大规模请愿，迫使政府改革。

阿根廷人利用宪法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条款教育民众、动员改革，说服议会通过立法。

2002年，“公民力量”组织根据宪法中的一个条款，为一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迫使阿根廷议会对其进行审议。该宪法条款要求，社区成员或组织提交的立法提案，在全国二十四个地区中的至少六个地区得到1.5%的阿根廷公民的签名，议会就要对其进行审议。

“公民力量”是一些关心保护人权的阿根廷活动家在1989年创建的。阿根廷经济崩溃之后，该组织连续数年发动倡议，关注饥饿和政府官员退休金过高等社会问题。关注饥饿问题的倡议书建议，政府给所有贫困的孕妇和五岁以下的儿童提供食物。阿根廷经济崩溃之后，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儿童是最大的贫困人口，但很少有解决儿童饥饿问题的社会项目。“公民力量”发动倡议的目的不仅要迫使议会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还要求他们拿出解决方案。

“公民力量”发布倡议书之后，在全国征募了二百五十志愿者，大多数志愿者是通过该组织的网站和项目协调人征募来的。“公民力量”还制定了一个指导手册——说明哪些人有资格在倡议书上签名，签名人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向哪里发送倡议书等等——用于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志愿者聚集在自己社区的市场、书店、药房、报摊、公用电话亭等公共场所收集签名。“公民力量”与其他组织和媒体合作，其中包括一位著名广播电台主持人，他在广播节目中告诉人们在什么地方收集签名，还有一家主要报纸告诉读者每天收集了多少签名。该倡议书最终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签名。

关注饥饿问题的倡议书得到了阿根廷公民的欢迎，“公民力量”最后将倡议书提交给了议会。2002年底，议会通过了修正后的提案，提案的内容被议会规定为国家义务。目前，关注饥饿的项目正处于实施的初期，第一个食物中心刚刚开业。

“公民力量”把民众普遍的冷漠转变成变革的力量，把不相信政府会作出回应的人们变成了能够看到自己的声音对立法产生直接影响的公民。“公民力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志愿者网络，与组织和媒体结成同盟来传播倡议书的信息，还收集到了大量民众的签名。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食物权

“桶队”：在社区独立收集空气质量数据，为变革施加压力。

社区可以自己收集信息，以此证明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本案例中是环境违法行为。

全美国有许多社区都开始或者加入了“桶队”项目，该项目教给居住在工业污染源附近的人们如何搭建和使用简单的空气监测设备“桶”——该设备已经得到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批准。在缺少强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或执法机构的情况下，“桶”给社区提供了独立监测空气质量的手段，还为变革施加压力提供了证据。

“桶”本身是一个简单、廉价的空气取样设备，由一个装在五加仑塑料桶里的泰德拉采样袋和一个用来把空气抽入袋中的真空泵或轮胎泵组成。“桶队”的志愿者有三种：嗅探员、采样员和社区“桶队”协调人（CBC）。嗅探员负责向采样员报警，告诉他们哪里发生了污染事件。采样员把空气取样设备放在自己家里，一旦怀疑有污染事件发生就进行取样。采样员要记录取样的时间、地点和理由，然后打电话给社区“桶队”协调人。社区“桶队”协调人取走采样袋，将它们交给分析实验室。化验结果要记录在数据库中，并通过地方媒体、社区会议和其他方式告诉社区成员。社区成员根据数据自行决定是否要求社区团体、政府机构和卫生机构对污染进行进一步调查。“桶队”还向居民提供情况说明书，告诉他们不同的污染级别对健康的影响。

美国低收入的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欢迎“桶队”的创意，这一战术得到了普遍接受。媒体的关注也为许多社区带来了变革。加州的康特拉科斯塔县通过了“环境正义政策”，该政策强化了工业污染管理，增加了职业病医疗设施，还让居民参与附近工业建设的决策。在路易斯安那州，空气取样证明，戴蒙德街区——该街区正逐渐被壳牌化工厂包围——已经不再安全。最后壳牌公司同意帮助整个社区搬迁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手段在政府或者企业没有提供有关污染的信息，或者民众担心官方信息不真实的情况下很有效。建立“桶队”是一个有力的公开声明：化工厂和政府机构无权控制与污染有关的数据，社区可以自行收集证据并将其公之于众，给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公司作出回应。这一方法非常简单，很快在社区之间迅速扩散，还传播到了美国以外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起到的作用非常的了不起：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而不是外人）在事件发生之时将其记录下来。这一战术已被用于南非、印度和菲律宾。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企业	本地	环境

培训受害者担任人权监督员：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监督和保护人权。

墨西哥一个团体培训原住民社区监督侵犯人权事件。有了新学到的记录技术的武装和法律的 protection，这些社区成员就能把自己的不满让最高层知道。

在恰帕斯，驻扎着大量军队，萨帕塔主义者（是以墨西哥反殖民主义革命家萨帕塔的名字命名的武装组织，成立于1994年，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其口号是反抗帝国主义，维护印地安人权利——译者注）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军事性质，这带来了普遍的侵犯人权问题，包括非法拘禁，军队骚扰平民（尤其是在检查站），军队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杀戮、拘禁，对妇女进行性虐待等等。

1999年，恰帕斯社区卫士网培训了十四名“社区卫士”，他们是恰帕斯七个地区和社区的代表。2001年，恰帕斯社区卫士网又进行了第二次社区卫士培训。社区卫士由其所在的社区任命，他们的职责是动员社区成员参加他们的活动。

恰帕斯社区卫士网每月都会对社区卫士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人权工作的理论和概念，记录、报告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所需要的实际技术。通过这一培训，社区卫士学到了哪些行为构成对人权的侵害，以及如何使用摄像、摄影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还学到了各种应对方法。

社区卫士向政府投诉，给媒体和人权监督小组提供信息，让遭到非法拘禁者获得释放或得到辩护。他们有能力找到被非法拘禁者所在的位置，在其人权受到侵犯时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法官裁定拘禁是否合法的权利）。他们知道在遭遇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事件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在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由谁承担责任。在案件到达法院或需要长期的法律援助时，律师顾问会与社区卫士一起合作。

社区卫士根据社区需要开展各种工作。当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他们收集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收集录像和照片证据，决定适当的干涉方法。他们还培训社区中的其他成员参与这一工作。

这一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高了原住民社区的自主性，减少了对外部行动者——如NGO——的依赖。

恰帕斯社区卫士网的模式，将社区和地方领袖置于争取人权斗争的中心位置，外部行动者只充当顾问，培训由当地人组成的网络，让当地人在自己的社区独立捍卫人权。任何试图在某个地区加强人权倡导工作的组织都可以使用这一战术。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监督和保护人权的战术，既可以提高人权觉悟，保护原住民社区，也可以提高这些社区自主行动的能力。

“社区卫士从事法律‘紧急援助’。我们培训社区卫士工作在社区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知道什么是侵犯人权行为，了解记录侵犯人权事件需要哪些手段，也知道如何去做。这一战术的结果，是一个原住民社区代表群体能够承担社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然后他们再去培训其他人。”

——墨西哥恰帕斯社区卫士网米格尔·安赫尔·德洛斯·桑托斯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本地	原住民权利

搜寻与查抄

“萨拉米行动”用“公民搜寻与查抄”给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公布一份秘密条约草案，该团体成员认为有关草案可能侵犯人权。“萨拉米行动”动员民众谴责政府用国家机密做借口，使有关条约不受民众的监督。“萨拉米行动”的组织者和培训师菲利普·杜阿美尔描述了这一行动。

“几个月来，政府一直拒绝公开美洲自由贸易协议（FTAA）的草案文件，目前美洲三十四个国家正在就这个贸易自由化条约进行谈判。我们要求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在2001年4月1日公布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文件。首先，我们要在渥太华举行合法示威，要求：或者我们拿到他们递过来的文件，或者他们将这个文件公之于众。如果他们不公布该文件，我们就要使用非暴力封锁关闭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大楼，还要尝试进行‘搜寻与查抄’行动，这个行动将使用严格的非暴力干涉方法进行公民突袭，以获得该文件。

当政府不回应的时候，有一群公民宣布说：‘警官们，我们要求你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我们拿到我们有权获得的文件。你们不要成为政府保密和操纵行为的帮凶。如果你们拒绝代表我们拿到文件，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自己去得到这些文件。’这些公民随后一个一个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请让我过去。’然后，公民们每两人一组爬过障碍物。这次行动有将近一百人被捕，被拘留过夜。但没有对他们提出起诉。全国人民都在问：‘为什么政府拒绝给我们这些文件，反而要逮捕自己的公民？’

全国几乎每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行动，以及围绕这一行动开展的运动。公民‘搜寻与查抄’行动开展一周之后，加拿大政府在与几个谈判伙伴商议之后，最终公开了这些文件。”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信息权

中断战术

有些侵犯人权行为需要人权倡导者亲自进行干涉，使侵犯人权行为无法继续下去。你可以游说，可以发起运动，可以抗议。不过有时候，你需要亲自改变现状：给人们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或生存所需要的药物，从妓院中解救少女，从工厂中解救童工。使用这种战术的勇士们会面临人身危险。

有些本来似乎不太可能参加人权工作的人——如组织起来的孟加拉国性工作者——结果却成为了人权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力量。

抵抗不公平的财产法：让失去土地的人居住到未开垦的土地上，迫使政府进行土地改革。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通过和平占领农地的方式，迫使政府颁布改革措施，并给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支持。

自1984年创立以来，巴西无地农工运动处理土地改革问题的方法，是组织大批无地农民居住到富有地主闲置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巴西无地农工运动就会利用巴西宪法中关于可以使用荒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条款，通过请愿和立法，合法获得土地。

虽然巴西政府承诺进行土地改革已有二十年了，但通过政府项目得到再分配的土地其实很少。巴西目前有一半的土地归1%的人所有，将近五百万农业工人没有土地。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会派遣组织者进入一个新地区，联系无地家庭，招募他们进行占领行动。组织者会咨询当地社区，选择肥沃但未被耕种，而且所有权存在争议的土地。组织者通常会在社区停留六个月以上，让当地人做好占领的准备。占领准备工作由当地社区安排，这样社区就能掌控整个占领行动。到了行动的那天，无地家庭就会前往要占领的土地，和平穿越障碍占领它。如果遭到驱赶，他们就平静地离开，不过驱逐令一结束他们又会再回来。

活动家们通常通过征用土地的方式施加压力，要求使占领合法化。这些地方的占领行动引起了负责土地改革问题的国家机构的注意。为了施加压力，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组织游行，占领政府大楼，公开谴责政府未能遵守宪法。占领土地合法化过程持续了五年。新的定居点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建设学校和保健诊所，将土地用于可持续农业，让定居者能够享有获得食物的权利。虽然偶尔也会面临暴力，但这一战术非常成功，巴西无地农工运动让居住在超过一千六百个定居点的将近二十五万个家庭获得了土地。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的故事非常值得关注，和平占领确实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现在，这些家庭可以通过农业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占领本身是有争议的，也是危险的，但是与迫使政府颁布所承诺的土地改革措施相结合，占领行动就成为一场成功的运动的一部分。巴西无地农工运动能够安全使用这一战术，是因为它能确保有足够的人参加。如果土地所有者或地方当局对和平占领者使用暴力，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的活动家就会通过媒体制造压力。

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地占领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或者导致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这占领战术要冒很大的风险，必须仔细加以规划和实施，以确保采用非暴力的方式。

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使用非法的战术来确保人权得以实现，并且迫使政府进行改革？

“《土地改革法》规定，所有的地产都应该有社会功能，或者应该用于生产性目的，能够带来工作或食物。法律是我们斗争的同盟军。不过，如果我们光等政府来做，土地改革就不会发生，因为大地主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很有权势。”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瓦努萨·桑托斯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经济权利

挑战国际专利法：挑战法律，为改革法律施加压力。

南非“治疗运动”通过挑战法律，开展公民不服从行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法律，以确保艾滋病感染者和携带者能够得到治疗。

2000年6月，“治疗运动”（TAC）开始挑战法律，进口仿制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给药品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药品价格，迫使南非政府允许进口专利药物的仿制版。这一战术的目标，是让所有南非人都有机会获得便宜的艾滋病处方药。南非有超过四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但专利药物价格高昂，令多数人无法获得治疗。

氟康唑是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物。与其他许多艾滋病药物一样，氟康唑是由跨国公司制造的，受到专利保护，以高昂的价格进口到南非。仿制版的药物要便宜很多。然而，辉瑞的药物专利禁止南非政府进口仿制版药物。虽然南非的《专利法》允许政府有进口或制造专利药物仿制版的权力，但是政府从没有使用过这一权力。

在进口药物之前，“治疗行动”先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证实了这些药物是安全有效的，然后他们安排了购买和进口这些药物的方法。例如，“治疗运动”组织旅行团前往泰国买药，那里的氟康唑仿制版叫保幽乐，民众都能买到，每片不到二十八美分。

保幽乐运到边境时，南非药品控制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药物，同时，该委员会的成员讨论了给予这些药物豁免的问题。2000年3月，辉瑞制药公司承诺向病人发放药物。2000年11月，在“治疗运动”和他们国内外支持者的压力下，南非药品控制委员会批准“治疗运动”的一个合作伙伴向病人发放仿制药品。在发放药品的行动实施之后，政府将审核是否给这些药物豁免的问题——政府对这一问题有自由裁量权。

这一公民不服从行动通过引起人们对低成本替代药物的注意，让人们知道艾滋病携带者和感染者急需获得些类药物。为了拯救生命，活动家们准备好了承担违法的后果，这给影响国内政策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虽然“治疗运动”进口仿制药的做法挑战了南非的法律和国际专利协议，但是在由三十九家制药企业组成的团体——名为制药企业联合会（PMA）——起诉南非政府的案件中，“治疗运动”支持了南非政府。制药企业联合会指控南非的《药品法》——其中包含如果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更低，允许政府从其他国家进口专利药物的条款——违反了《专利法》。但最终制药企业联合会撤回了起诉。

由于数百万艾滋病人无法获得有效的药物，南非仍然处在巨大的人权危机的阴影之下。不过，2003年8月，在“治疗运动”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承诺，要让所有有需求的南非人都能免费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南非政府还在同年11月公开的医疗计划中证实了这一承诺。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企业	全国 国际	艾滋病

从妓院中解救少女：让有直接经验和知识的人解救侵犯人权的受害者。

在孟加拉国，一个地方联合会干涉了某个私人部门的侵犯人权活动。

孟加拉国的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由年长的性工作者组成监督小组，解救那些违背本人意愿被卖进妓院中的女孩。

资深性工作者在性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大多是鸨母，或者出租房屋给妓院中的性工作者。与年轻性工作者相比，她们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对这一产业的了解也更深。在妓院中的经济实力，使这些资深性工作者能够决定谁可以进入妓院。她们出租住房给年轻性工作者时，会说明不允许未成年少女卖淫。

然而，年轻性工作者有时还是会把女孩带到妓院里来。一旦发生这种事，资深性工作者就会设法找到女孩，通过小窗和洞口和她们谈话。她们会了解这些女孩是不是自愿来的，来自哪个村庄，年龄多大，亲属是谁。然后她们会通知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该组织会派可信的人前往女孩家，告诉她的父母或亲戚女孩在哪里。在许多案例中，家人能够到妓院去解救女孩。但是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家人把女孩卖到妓院的，他们不愿或不能解救她。

从妓院解救女孩时，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会联系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来帮助那些女孩。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帮助无法返回家中的女孩进行康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努力从妓院中解救未成年少女，但是性工作者从当地社区得到的支持很少，社区把性工作者视为对社会的威胁。此外，从妓院中解救少女，也对那些从性交易中获益的人构成了威胁。这令资深性工作者和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女性依靠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来影响地方政府官员，以增加对性工作者的保护，让未成年性工作者离开妓院。

这一战术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参加此项工作的年长性工作者在监督和发现问题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她们建立了稳定的联络网，通过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安全地聚会和传递信息。这一战术是在侵犯人权的最后阶段——女孩们已经被关进妓院里——进行干涉。这一战术帮助女孩们脱离侵犯人权的处境。

其他遭受剥削的团体——如家庭虐待、强迫劳动、强迫迁徙的幸存者——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其他人免遭同样的命运。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长性工作者就像孟加拉国其他妇女一样，本身也有可能遭遇人身危险。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非法性交易

打开工厂大门：突袭工厂，解救童工。

总部设在印度的南亚童奴问题联盟（SACCS）用突袭行动解救童工。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是一个由南亚地区超过四百家人权团体组成的联盟，致力于消除包身工和童工现象。

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印度有超过六千万名包身童工。他们失去了作为儿童的基本权利，比如接受教育，获得公平的报酬，得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拥有一定生活条件等。他们每天被迫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大多数人像奴隶一样被关在工厂里，经常遭到殴打，普遍患有疾病。

自1989年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成立以来，就使用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处理童工问题：既采取直接行动，也采取间接行动。根据计划，突袭使用童工的工厂的行动由南亚童奴问题联盟直接行动解救作战部门负责。他们收到举报某工厂使用童工的消息，或者收到受奴役儿童父母的请求之后，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就会组织自己的团队、童工的亲属、当地的支持者和几名手里只有警棍的警察强行解救儿童。他们会在夜间打开工厂的大门，在厂主发现之前带走孩子。为了获得警察的保护，他们会事先通知地方当局即将进行突袭，但不会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当局和工厂串通一气。

儿童被解救之后，必须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官方释放证书。因为当局往往向着工厂，所以获得释放证书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回家（如果有可能的话）之前，儿童们会被介绍参加南亚童奴问题联盟的康复项目，该项目提供免费教育。过去二十年中，南亚童奴问题联盟通过直接突袭行动，已经把超过六万五千名童工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地——把儿童像奴隶一样关押起来的工厂——进行直接干涉。他们的行动不仅解救了成千上万名儿童，在有关被解救的儿童和他们被关押条件的消息传开之后，也帮助社区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也让政府无法继续在童工问题上和工厂串通一气。一旦知道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将要采取的行动，政府就无法再保护这些工厂不被公开揭露。

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战术，可能会对儿童和社区造成影响。使用童工的工厂有可能把问题隐藏得更深，或把童工转移到其他地区。南亚童奴问题联盟自己的团队成员也有可能遭遇人身危险，因此，在行动前必须计划好多种可能性。不过，在问题极端严重——如出现奴役儿童、贩卖人口、非法拘禁等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勇于承担这一风险。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亚洲	公民社会	企业	全国	童工

改变战术

知道何时改变战术，就像一开始就要知道应该使用哪些战术一样重要。自由缅甸联盟最近决定，结束为期十年之久的抵制百事可乐、苹果电脑、喜力啤酒、德士古石油和其他与缅甸做生意的跨国公司的运动——不是因为运动没有作用，也不是因为联盟已经实现了其所有目标，而是因为到了改变战术的时候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缅甸联盟创始人之一萨尔·尼解释说：

“抵制能够带来很多好的结果。它就像是军事行动中的重炮，能够起到消耗敌人的作用。不过，真正的工作是由国内那些在现场工作的人们来完成的。一旦你重创了敌人，就要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攻击。

抵制行动提高了人们对缅甸现状的认识，迫使几家跨国公司退出了缅甸，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2003年，我们正式结束了抵制。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使用一系列新的战术，要开始重新界定问题，让我们的运动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认识到，除非我们改变人们讲述缅甸的故事的方法，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胜利。把抵制作为运动的核心，重点永远是放在政权上面，而不是放在缅甸人民上面。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和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现在，我们正在探索怎样与国际人权运动的其他参加者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重新界定问题，将新战术纳入我们的运动，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战略途径和新的战术选择。”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说服战术

使用说服战术，可以在不发生正面冲突，不妖魔化侵犯人权者和助纣为虐者的情况下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要使侵犯人权者不再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有时候只需要给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

虽然干涉战术常常使用抗议和抵抗，但是谈判和说服在结束侵犯人权问题方面也取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功。人权倡导者以时而低调、时而高调的方式施加压力，与政府和企业建立非对抗性的关系，甚至对他们施以援手，帮助他们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战术需要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出现在谈判和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在合作的氛围中开展工作。

评估可以使用哪些战术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需要考虑的必要条件。谁和你想要影响的对象关系密切？谁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谁能影响你想要影响的对象？

媒体的力量： 利用媒体向能够结束侵犯人权行为的人传播有针对性的信息。

记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提高人们对侵犯人权问题的认识，甚至可以影响当权者做出改变。布隆迪的记者利用广播节目说服重要的领导人，以结束发生在医院里的侵犯人权行为。

布隆迪的医院违背病人的意愿，将那些付不起帐单的病人关押起来。非洲公共电台（APR）利用媒体的力量影响那些能够帮助改变布隆迪医院现状的个人和团体。最后，非洲公共电台与当地的NGO合作，成功地迫使政府下令释放了被关押的病人。

在饱受战乱的布隆迪，许多人支付不起医疗保健服务的费用。1990年代，在发生了一次全面的经济崩溃之后，更降低了国家支持卫生系统的能力，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一些医院因为面临预算危机和日益增长的债务，开始关押付不起帐单的病人。这些医院不认为这是侵犯人权的问题，而是感到自己被欠债的人欺负了。

非洲公共电台的记者与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系，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秘密采访了他们，并且播出了他们的证词。广播节目还包括了针对有力量改变现状的特殊团体和个人的信息。第一次

广播节目播出之后，非洲公共电台与国内外的NGO联合起来，与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就医疗保健问题举办了“咖啡新闻社”——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媒体会议。会议最后讨论了关押病人的问题，要求政府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2002年4月，布隆迪部长会议宣布，医院不得关押病人，并且下令释放所有已被关押的病人。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医疗保健和全国卫生政策改革等重大问题。

这一战术的关键，是找到广播节目要针对的对象：哪个人或哪些群体有力量改变医院的现状，同时也愿意接受这些信息？在本案例中，这样的人是政府官员，有关事件被公之于众之后，政府官员在道德上就有了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这一战术也证明了故事的力量。受害者的故事经过专业媒体人士的讲述，就有可能改变国家政策。

不过，也有些人担心，如果医院拒绝为出现在广播节目中的病人继续提供医疗，这一战术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被关押的病人患的是会给他们带来耻辱的疾病，这一战术也可能让病人感到难堪。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术要想取得成功，要有媒体记者愿意参与促进人权的工作。

如何利用媒体来告诉人们你所关心的人权问题，并且为政府改革施加压力？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公民权利

征募地方领袖的支持结束陋习：与地方领袖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结束侵犯人权的现象。

一场运动在为结束侵犯人权的现象寻找同盟军时，社区领袖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社区领袖可能是部落长老、宗教领袖、地方政治家，或者只是有影响力和有魅力的个人。

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得到了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酋长和前酋长夫人——的支持，以解决仪式奴役的问题。仪式奴役制度是指一些家族在违背家族中女性成员意愿的情况下，把她们献给神社，为家庭成员赎罪，以结束或扭转家族的厄运。

依照法律，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有权禁止仪式奴役制度，但他们没有使用这种权力，而是采用了征募地方领袖来结束这一陋习的战术。因为他们认识到，传统是建立在人们深信不疑的信念上的，如果改变不是自愿的，传统可能会转入地下。在战术准备阶段，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研究了仪式奴役背后的信念，然后与“加纳国际需要”——一个为仪式奴役受害者提供咨询和康复项目的NGO组织——建立了同盟。他们一道主持了有受害者和祭司参加的会议，会议鼓励每个人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地方领袖表示，要废除仪式奴役制度，并且利用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说服祭司同意释放被关押在神社中的妇女。释放妇女仪式把整个社区聚集到一起，公开祭司的决定，这也有助于满足社区的精神需要。媒体也报道了释放仪式，这也向广大公众说明了，地方领袖支持结束仪式奴役的做法。这一战术使大约三千名女性获得了自由。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呼吁结束一种传统习俗，如果不同时处理使这一传统习俗得以存在的信念和结构，也不提供改变这些信念和结构的替代方案，只会让类似的传统习俗隐藏起来，而不是结束它。这一战术取决于社区成员对自己社区领袖的尊重，以及社区领袖为社区做出榜样的意愿。要结束仪式奴役的做法，关键是要说服社区成员，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家族成员献给祭司来赎罪。释放妇女仪式和社区领袖的保证，可以减轻人们对来自神的报复的恐惧，并且在社区中建立信任关系。

这一战术在帮助改变或消灭其他根深蒂固的侵犯人权的传统陋习——比如女性生殖器切割或家庭暴力——方面十分有用。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非洲	政府	社会	本地	奴隶制

通过预算分析追踪资金的使用：通过调查预算来揭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并且说服政府纠正这些不平等。

有时候，个别领袖就能从道德和政治上改变政府的做法，有时候，数字和数据本身就能说话。预算分析能够揭露实现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不平等，能够成为说服政府纠正这些不平等的工具，还能帮助人们向政府问责。

南非民主研究所（IDASA）的儿童预算部门（CBU）利用全国和各省的预算，揭示政府是否履行了对保护儿童权利的承诺，并就如何纠正错误提供证据和建议。南非宪法规定，每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基本的营养、住所、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但是南非仍有数百万名儿童在挨饿，上不了学，没有医疗保健，无法过上健康和安全的的生活。

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首先根据宪法和国际条约来确定政府的义务，然后衡量儿童的贫困程度。接下来对预算的分配和开支，以及向儿童提供的重要服务进行全面分析，了解政府财政分配的重点。对预算事实的分析和整理，让儿童预算部门能够清楚地说明，哪里的政府（全国、省或地方政府）未能履行义务，还为提出建议和施加强大的改革压力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和数据。

南非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自己都没有这些数据，因此，他们非常欢迎南非民主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将其作为改进自己工作的方法。

这一战术带来了新的立法，还改善了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些政府机构直接向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索取信息。这一战术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全球，亚洲的部分地区、南美洲和整个非洲大陆都建立了类似的监督团体。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为了监督政府的项目，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收集了政府无法获得，或是不愿获得的信息。这一战术把两个过去彼此不相干的领域——预算分析领域和人权领域——结合到一起，以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改进问责和治理实践。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没有成为政府的对头，而是说服政府接受、使用，甚至索取他们的分析数据来改善社区儿童的生活。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还履行监督职责，确保所收集到的信息可靠，能够供南非的人权促进者使用。为此，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需要能够看到预算，这在某些开放程度较低的社会，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使用这一战术的第一步，就是确保当地的法律允许公众获得预算信息，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就要为制定这样的法律向政府施加压力。

这一战术可以用于监督全国和地方政府、捐款人是否履行了他们之前做出的承诺，监督外国援助的使用和对国家的减贫战略政策，还可以用于监督政府是否遵守了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获得某些捐赠资金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一战术还能证明一国在各种人权问题上（包括残疾人权利和获得教育、住房、医疗保健的权利）取得了哪些进步。

“预算是政府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的计划。它决定政府征收了哪些税，政府如何花这些钱，这些钱用来提供什么服务。预算是政府所有政策的综合。预算是我们与国家的契约。”

——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努埃尔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儿童权利

让官僚体制更文明：**与政府官员建立合作关系，从体制内促进变革。**

俄罗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证明，说服战术可以从内部促进改革。换句话说，用蜂蜜抓到的苍蝇比用醋抓到的多。

俄罗斯“公民守望”组织找到支持人权和改革的民主派官员，给他们提供机会以巩固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苏联的统治和极权主义的遗产，让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在民主国家，回应民众呼声是政府官员的基本做法，但俄罗斯政府官员缺乏这样的经验。

“公民守望”仔细观察政府——包括内务部、司法部和警察部门——主要官员的行为，找到那些对民主改革有兴趣，而且支持人权的官员，然后调整自己与官员打交道的方式，用尊重和支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守望”的战术包括翻译支持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或翻译对官员的工作有帮助的国际文件。在另一些情况下，“公民守望”会邀请外国官员参加研讨会，或者帮助俄罗斯官员去其他国家访问。在苏联统治期间，官员很少有机会出国旅行和学习外国同仁的民主工作方式。“公民守望”利用旅行和交换的机会，既培训了政府官员，也吸引他们对改革持积极态度。

“公民守望”希望，获得这些国际文件和接触外国同仁能够有助于证明，政府和公民团体合作支持人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公民守望”还向政府官员提供关于如何在自己国家改善人权和政府工作的具体信息和案例。

“公民守望”的努力成果是与政府机构和官员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关系。他们在各个领域与政府官员进行接触，支持他们改革自己部门的努力。这些做法不仅巩固了公民社会，还在政府机构和社会之间创造了一种更加民主的互动关系。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公民守望试图提醒政府官员：你们首先是公民，也有需要尊重的宪法权利，其次才是政府公务员。这一战术让我们了解到，即使在没有与公众打交道或者没有在民主体制下工作习惯和传统的官僚系统中，也存在改革的突破口。其他希望利用自己国家的这种突破口的组织需要记住，这种战术的使用需要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外交技巧和资源可以给那些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来促进人权的人提供持续的支持。

你可以使用哪些战术把对手（或潜在对手）变成盟友？

“沉重的专制主义传统不会轻易消亡，有时还会占据上风，迫使我们后退几步。例如，2004年3月，‘公民守望’和俄罗斯若干地区的治安法官一起，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法院发展问题。我们邀请了几名在这一过程中最为积极的最高法院法官，还有圣彼得堡和该地区其他人口中心的行政长官。

会议召开前两周，我们忽然得到通知，最高法院的高层禁止法官们参加我们的会议，也禁止他们参加任何由NGO组织的活动。不过，这些法官证明了他们不愧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官：有大批法官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圣彼得堡市法院举行，该法院也是信息公开倡议的支持者。出席会议的法官们勇敢地公开谴责了他们的上级——这证明我们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的。”

——俄罗斯“公民守望”鲍里斯·普廷塞夫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腐败

股东的力量：提交股东决议，迫使公司采取对社会更加负责的商业行为，包括要有全面的人权政策和实践。

人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股东和投资者也是潜在的行动者，他们能够改善企业的人权保护状况。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ICCR）是北美二百七十五家宗教投资机构的联合体，该中心提倡通过股东决议来改变有不公正的公司政策和行为。截至2003年，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组织的组合投资总额约为一千一百亿美元。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会调查所投资的公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他们不会卖掉那些损害社会和环境的公司股票，而是会利用自己的金融控股作为工具，迫使公司改变做法。

作为公司股东，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会在中心年会上提交关于社会问题的提议，供成员投票表决。其中一个案例是，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九个下属机构与美国联合银行和若干其他机构一道，向他们担任股东的优尼科石油公司提出了一项股东提议，敦促优尼科石油公司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制定新的公司政策。2002年，该提议被提交给优尼科石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们论证说，由于在缅甸输油管项目中的商业行为存在问题，使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形象受损，影响了优尼科石油公司的股价。该提议在支持人权和劳工权利的股东提案中获得了创纪录的最高票，引起了董事会和高层经理的注意。2003年，优尼科石油公司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制定了新政策。2004年，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向“西方石油公司”提交了提议之后，“西方石油公司”同意采用全面的人权政策。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每年出版一本《代理决议手册》，内容包括在这一年里提交的股东提议，以便经理们做出与代理投票有关的知情决定，也让投资者能看到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倾向。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每年都会就社会和环境问题提交超过一百个股东提议。在许多案例中，这些提议都为宗教投资者与公司高管之间的谈判打开了大门。

虽然股东提议对公司没有约束力，但股东提议在得到大量股东的支持时，确实能够促使公司采取行动。从1971年起，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一直在重要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战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改变投资方式来参与促进人权的事业。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多地区	公民社会	企业	国际	普遍人权

模拟法庭：组织模拟法庭，提高对侵犯人权问题的认识，影响公共政策。

我们不用等到某种特定形式的侵犯人权现象结束，就可以开始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进行治疗、康复和舆论动员。尼日利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采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模拟法庭，关注妇女权利问题。

“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与民间资源发展和文件中心一道，组建了一个全国暴力对待妇女问题特别法庭。2002年3月，该法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第一次开庭，法庭是非官方的，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有三十三名妇女出庭作证，分享了她们自己的经验，帮助民众了解妇女在家庭、社区和政府遭受的虐待，包括性骚扰、家庭暴力、强奸和女性割礼。

特别法庭法官的选择标准是有声望和关心妇女权利的尼日利亚人。其中包括两位地方法院法官、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前任大使、一位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一位前任司法部长。法庭向民众开放，组织者特别邀请记者、警察、政府特派员、议员和国际观察员参加。特别法庭分组审理了不同类型的侵犯人权行为。法官小组听取证词并提出问题，然后私下讨论。最后，法官们不是宣布判决，而是提出公共政策建议。

特别法庭和有关媒体报道使民众认识到，虐待妇女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特别法庭的审理促进通过了各种对妇女有影响的国家立法，还推动了一项关于暴力对待妇女问题的国家法案。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只有让民众知道存在的人权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认识。“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的成功取决于良好的媒体策略，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对政治需要的敏锐评估。例如，“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没有邀请国际专家担任法官，使尼日利亚政府没有机会将法庭审理的结果斥为“受到外国势力干预”。其他想要实施这一战术的人也需要仔细考虑法庭的组成和范围，以便对目标受众产生最大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区都有建立此类特别法庭，建立的目多种多样，例如提高民众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等等。

“找人作证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寻找、协商、动员的过程都是如此。有些人的宗教和文化信念阻止她们讲出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身份泄露。最常见的担忧是，公开作证之后，她们所在的社区会怎么看待她们，她们害怕被自己的社区排斥。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在她们作证时给她们化装。”

——尼日利亚“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玛夫丽亚特兰·费加比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妇女权利

激励战术

本节中的战术通过激励手段，使人们——比如父母、企业主、消费者——更容易做出正确选择。

当父母感到自己的孩子要去工作才能维持生存时，如果财政支持给他们提供激励，他们就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当企业由于成本较低而雇佣童工时，如果银行的贷款政策与企业用工行为有关，或者企业打开了利润丰厚的人道产品市场，让他们不再雇佣童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如果消费者明确地表达自己支持人权的观念，一个想要建立自己品牌的企业或许就会有强烈的动机服从消费者的立场。

本节的战术都与经济激励有关，不过其他价值也能成为有力的激励——例如他人的认同、信誉，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席之地，都能给政府和个人提供激励。

从街头到学校：给父母提供资金，让他们能够送孩子去上学，而不是去工作。

贫困是造成童工的根源之一。许多家庭愿意送孩子去上学，但是支付不起上学的成本，而且他们需要孩子也能赚钱帮助养家。因此，巴西政府创立了一个项目：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孩子能够接受教育。

巴西的学校助学金计划每月给贫困家庭提供津贴，让孩子能够去上学，而不是去工作。该项目始于巴西利亚市，创立该项目的目的是政府认识到，今天的童工就是明天的穷人。2001年，学校助学金计划扩大为联邦计划。

学校助学金计划由教育部管理。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和一张电子银行卡，让这些家庭能够直接领取津贴。参与该项目的家庭必须符合如下标准：孩子的年龄在六至十五岁之间，每月缺课不能超过两天；家中每位失业的成人必须在国家就业系统（SINE）登记，积极寻找工作；必须在巴西居住至少五年。每个家庭领取津贴的时间最少为两年，最多为八年。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的出勤率不达标，该月的津贴就会被取消。

除了减少贫困和鼓励儿童完成学业之外，这一战术也能显著减少童工人数和辍学人数。迄今为止，学校助学金计划已经帮助了八百二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名儿童。联邦计划创立之后，学校助学金计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项目。

家庭常常与童工问题有关——是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选择——这一战术给这些家庭提供了另外的选择。该项目提供给贫困家庭的银行卡和别的可以在提款机上使用的电子银行卡一样，这使那些领取津贴的家庭避免了因为贫困和接受政府援助造成的耻辱感。这一战术需要有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管理工作，还需要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哪些激励手段能够促使你的对手或者潜在的盟友改变做法？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激励	美洲	政府	社会	全国	童工

把贷款和人权联系起来：以不能使用童工为条件，给小企业主提供优惠贷款。

孟加拉国的一个组织给承诺不雇佣童工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用这种方式让社区找到代替童工的方法。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BRAC）管理着一个微型企业贷款和援助项目（MELA），该项目给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条件是不得使用童工。

微型企业贷款和援助项目给做出承诺的纺织、食品加工、服务和交通四个领域的小企业提供信贷。这些小企业非常需要贷款，贷款金额从三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不等，还要收15%的服务费。平均贷款规模约为一千美元，还款期限为一至两年。贷款者之所以同意这些条件，是因为正规的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即使愿意贷款给这些小企业的银行，也要求还款一次付清，而不是按月分期还款。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会监督贷款者的行为，确保他们遵守贷款条件，外勤工作人员时刻准备就所发现的任何侵犯人权问题采取直接行动，行动不限于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的贷款者。

自1996年该项目开始以来，已经给孟加拉国四万五千个小企业提供了贷款，这些企业都不使用童工。该项目通过给地方企业注入新的资本，产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提高了人们对童工问题的认识，减少了使用童工的行为。

本案例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发现了人们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一需要，同时提出了尊重人权的要求。这一战术也能用于其他与人权之间存在联系的经济活动之中，例如防止歧视，保障公平工资或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要想提供激励，贷款本身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者比普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息更低，或者还款条件更优惠。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激励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童工

用贴标签的方法结束童工现象：创造支持公平产品的市场。

有时，消费者、贷款者和股东等等与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使用童工、不公平用工和破坏环境等行为——相距甚远的人，也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动机。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或者缺乏做出公正人道的选择所需要的信息。一家基金会给与所购买的产品产地相距遥远的消费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和替代方案，让人们能够做出支持人权的选项。

地毯标志——地毯上有一个笑脸——已经成为承诺和提倡不使用童工的手工编织地毯计划的商标。地毯标志基金会给同意不使用童工，并且自愿接受监督的地毯出口制造商发放商标认证，监督包括突击检查和交叉核对出口记录和织机。一旦发现童工，地毯标志基金会就会把他们送去上学并接受康复治疗。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监督过程分为三步：

1. 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发放出口商标认证。调查员由地毯标志基金会雇佣和培训，地毯标志基金会还会采取措施，确保调查按正确的程序进行。调查员可以批准给地毯制造商发放出口认证商标，如果他们发现地毯制造商使用童工的证据，就会要求制造商限期结束这种行为。
2. 随机突击检查，然后才给这段时间制造的地毯发放出口认证商标。
3. 地毯跟踪，每张有标志的地毯都能跟踪到其产地、制造商和出口商。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工作面临几项挑战。由于印度的织机非常分散，产业结构也不一致，定期检查十分困难。虽然有些出口商与织机关系甚密，但是许多出口商都会雇佣中间人，让验证过程跟踪

很难进行。尽管如此，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还是有四千多名儿童通过地毯标志基金会的项目获得康复。通过地毯标志基金会的宣传，还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得以避免在织机前编织地毯。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成功关键是他们了解市场对无童工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地毯标志基金会只与地毯进口商打交道，而不是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因此，它必须说服进口无童工地毯有市场。除了地毯的成本之外，地毯标志基金会的进口商还要支付年度进口总额的1.75%作为权利金，其中一部分权利金将投入为儿童提供的教育和康复项目。作为回报，地毯标志基金会会为那些出售他们商标认证地毯的零售商进行宣传。地毯标志基金会将在自己的宣传材料和参加的活动——如世界无童工日——中提到这些零售商。零售商还会得到解释购买有商标认证地毯的重要性的宣传资料。地毯标志基金会告诉进口商和零售商，有商标认证的地毯不仅能帮他们赢得只愿意购买无童工地毯的顾客，还能提升他们商号的公众形象。

在过去十年里，地毯标志就像其他许多标志系统一样，给消费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让消费者拒绝支持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提高了人们对与某种特定的产品有关问题的认识，创造了用人道的手段生产和运输产品的需求。由于制造商渴望分享这一市场份额，因此他们也有了参与这一过程的动机。

这种项目如果没有严格而适当的监督程序——这可能十分复杂，而且需要大量资源——就有降低这一品牌信誉的风险。这一战术可能还需要配合使用其他提高认识的战术，以便给消费者和制造商提供信息，给他们充分的理由关心生产过程中的改革问题。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激励	亚洲	公民社会	企业	国际	童工

企业带头：把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集中在厂房里，使监督和消灭使用童工的问题更加容易。

在运动产品中，锐步是最著名的品牌之一，该公司保护品牌的手段之一是用监督来保护人权。

1996年，锐步国际公司启动了工厂监督、产品标识和教育项目，防止他们在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商使用童工。

在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的足球制造厂中，大约有20%的工人是童工。根据当地的法律，锐步的人权标准要求，其工厂中的工人至少要满十五周岁。

锐步进入足球市场之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防止使用童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包括缝纫在内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放进锡亚尔科特一家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制造厂中，所有工作都在厂内进行。监督人

员定期检查工厂的生产过程，与工人谈话，监督检查员。检查员则负责监督进出工厂的装货人员。锐步公司还与当地社区保持联系，访问周围的村庄，确认锐步生产的足球没有一个是工厂外面加工的。这些足球会被贴上“保证无童工制造”的标签。这就在足球如何制造方面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让人们在足球产业中使用童工的问题有了认识。

把生产集中到无童工的工厂中，让锐步在不使用童工的情况下制造了数以万计的足球。

1997年，锐步从足球销售额中拿出一百万美元，创建了一个锐步巴基斯坦教育援助项目（R.E.A.P.），支持地方教育事业。锐步与锡亚尔科特教育促进社一道建立了沙南协会，该协会与当地家庭合作，让儿童去学校上学，避免成为廉价劳动力。

锐步公司认识到，无童工产品是有市场的，他们决定满足市场的需要。几年中，他们使公众建立起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为一家有着很大市场份额的跨国公司，锐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能够影响其产品有关的生产和销售的整个产业链。这一战术的关键在于，在全球经济中，从原材料到消费者之间的环节越来越多，监督侵犯人权行为变得更为困难。锐步认识到，要合并这些环节，才能确保产品制造过程中不使用童工。

标识战术也可以用于满足市场对其他“公平劳动”商品的需求：种植者得到公平价格的农场生产的产品，工人得到公平工资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以保护环境的方式制造或种植的产品等等。

你期待哪些企业能够成为斗争中的盟友？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激励	亚洲	企业	企业 社会	国际	童工

恢复战术

1980-2000年之间，秘鲁有超过七万人失踪或者被谋杀。多数受害者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基本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秘鲁人权界让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终，秘鲁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很荣幸能够为这个组织服务。

2003年8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表了最终报告，让政府无法继续忽视来自失踪者家庭的正义呼声。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胜利，但那只是迈出了让所有秘鲁人都重新拥有权利和正义的漫漫征途的第一步。

本章中，你会读到另外一些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的组织和个人的故事，他们都参与了在可怕的侵犯人权事件之后恢复正义和重建社会的过程。有些组织或个人把侵犯人权事件记录下来，让国家和社会无法忽视这些事件。有些组织或个人帮助受到伤害的家庭和社区恢复正常生活。有些组织或个人为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寻求正义。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中，正义意味着惩罚加害者，让受害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获得赔偿，使此类罪行不再发生。赔偿是秘鲁人权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既是因为秘鲁政府没能保护受害者，欠他们一个公道，也是因为赔偿能够帮助所有社会成员重拾对秘鲁解决人权问题的信心。

还有一些团体使用了其他的战术来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寻求正义。我希望能找到那些对你的工作有用的战术。

——索菲亚·马赫

秘鲁前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
前任国家人权协调会执行主任

即使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战争已经结束，旧政权已经被推翻，受害者已经逃走或被释放，或者仅仅因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对创造性的人权工作的需要也没有结束。侵犯人权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直接的痛苦，它还破坏了社区的领导能力，导致经济下滑，损害了公民社会。

如果社会沉默的话，受害者、家庭和社区就无法重建其领导能力和社会结构。加害者得不到惩罚，社会就无法和解并继续前进。本章中所描述的战术，都可以用于重建领导能力，为受害者和社区寻求康复、正义与和解，以推进创造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社会的理想。

恢复性正义和偿还性正义之间存在差异。恢复性正义强调治愈受害者、加害者和社区的创伤，而偿还性正义则强调惩罚加害者，赔偿受害者。对于重建和修复遭受破坏的社会来说，这两种手段都是有用而且必不可少的，但本章主要介绍偿还性正义。

虽然这些战术往往把重点放在过去，但它们也在预防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战术可以用于巩固遭受破坏的社区；打破保护侵犯人权者不受惩罚的围墙；惩罚侵犯人权者，并让人们知道，今后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会得到宽恕；记住侵犯人权事件，让受害者和他们家庭的痛苦得到承认和证明；记录下侵犯人权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保持警惕，这些记录就能帮助我们了解和制止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三节：

1.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曝光侵犯人权的性质和程度，找到加害者和受害者。
2. 巩固个人和社区：利用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康复措施等，使个人和社区恢复正常生活。
3. 寻求救济：通过诉讼、制裁和赔偿等手段寻求正义。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忘记我们听到、看到和经历过的侵犯人权事件，大概是最容易的，但这会使我们留下没有处理过的创伤，还会为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敞开大门。本节中的战术，为侵犯人权事件和侵犯人权模式留下了永久性的公共记录。没有这种公共记录，记忆就会消散，因为现有的记录可能会分散到各处，或者被隐藏在官方机构的档案中。侵犯人权事件的文件如果得不到保护，也往往会“失踪”。在没有记录的地方，我们需要做出特殊的努力去挖掘它、保护它，并将它公之于众。如果最好或者唯一的记录已经与无名墓葬或万人坑中的尸体掩埋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些战术，需要使用专门的法医技术。在有些案例中，侵犯人权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事件可能发生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仍然有可能被人们遗忘。这些战术不仅能使记忆保持鲜活，还能使其变得有意义。下文中还有几个案例，都发生在侵犯人权现象十分普遍，人人皆知国家，人们组成一些委员会和特别法庭给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庭，甚至包括加害者，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

向公众公开包含侵犯人权事件——尤其是死亡、酷刑和失踪——的信息的文件和记录，可以达到几个不同的目的：给受害者家庭带来“解脱”感，使他们不再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而是重新开始生活；使受害者家庭能够举行其文化中的传统悼念仪式；帮助受害者家庭收集信息，建立可靠的记录，以便起诉侵犯人权者；公共记录还提供了公共讨论的议题，令无声者发出声音。

对受害者家庭的回答：**记住侵犯人权事件，促进康复和正义。**

柬埔寨的一个团体记录了红色高棉大屠杀中的侵犯人权事件，让公众可以查询相关的记录。他们既保存了受大屠杀影响者的记忆，也保存了犯下这些侵犯人权罪行者的记忆。

柬埔寨文献中心（DC-Cam）正在收集柬埔寨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档案，让失踪者的家人和朋友知道失踪者的确切命运。柬埔寨文献中心还收集能在法庭上用于指控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法律证据。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家庭追踪文件系统”通过搜索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保存的详细记录，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家人了解他们亲人的命运。柬埔寨文献中心有四个数据库，分类记载了数十万页有关文件、照片和采访。它的测绘项目使用GPS技术，在柬埔寨一百七十个地区找出了一万

九千四百六十六个集体坟墓、一百六十八座监狱、七十七个大屠杀遗址，几乎遍布这个国家的所有省份。

虽然亲属往往知道他们的家人已经被红色高棉处决了，但如果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会让他们感到解脱和安心，社区也能从大屠杀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档案有时还能显示失踪者的遗骸在什么地方，让亲属能够举行适当的哀悼仪式，以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到柬埔寨文献中心来查询自己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亲属，约有80%得到了答案。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屠杀的记忆永存，帮助柬埔寨人民寻求正义，建设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让这种暴行永远不再发生。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战术在人民长期遭受严重虐待的柬埔寨非常有效。其他仍在发生侵犯人权现象的国家也能从该组织的经验中获益。要想创建一个中央信息库，有关团体必须找到加害者留下的所有记录或证据，以及留下记录或证据的方式，可能还需要进行遗骸发掘或者法医工作（第71页）。柬埔寨大屠杀的对象主要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因此，整个司法系统都被摧毁了，这意味着，这些信息只有在重建司法系统之后才能得到利用。

怎样才能记录你所在的社会中侵犯人权的历史？怎样才能利用这些历史来促进康复和正义？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人权侵害事件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国家	人权侵害

开放恐怖档案：利用查询受害者的档案这一合法权利促进正义。

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CDyA）利用前囚犯有权查询保护资料的法律——即有权看到与自己的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件——创建了“恐怖档案”。

经过三十五年的军人独裁统治之后，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向公众公开了警方的文件。

巴拉圭和另外五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获得保护资料的权利：前囚犯有权看到当局收集的与他们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的控告资料。1992年，在请愿要求获得自己的控告资料之后，前政治犯马丁·阿尔马达在一名地方法官的陪同下，在兰巴雷的一家警察局里找到了数千份拘禁文件。

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犯人被拘禁时的经历——包括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事件。这些文件已被用于证实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独裁统治期间被拘禁者的故事，用于确认公民的失踪。还被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用来作为起诉独裁统治时间的警方和军方人员的证据。

巴拉圭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最终下令，这些文件要对公众开放。现在，这些档案由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管理，对研究者、调查者、人权活动家和公众开放。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根据这些文件提起法律诉讼，组织特别法庭起诉由国家支持的酷刑和非法拘禁的主要犯罪人；为巴拉圭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信息。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成功地起诉了二十名官员。1998年，这些档案还被用于收集案例，以便将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从英国引渡到西班牙。

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已经把90%的档案资料转成微缩胶片，并将其数字化。该中心还试图将这些档案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能够获得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详细信息，对受害者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有重要意义。在巴拉圭，马丁·阿尔马达的努力证实了许多受害者的经历，让这些受害者能够诉诸法律。

虽然巴拉圭的档案是偶然发现的，但是若干国家的政府已经使用了有目的地开放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文件的战术。例如在德国和一些东欧国家，政府已经开放了秘密警察的文件。在德国，这些文件保存在一个被称为“高克”的独立机构里，它们对受害者开放，但不对外开放。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文件是选择性开放的，受害者无法获得，但仍然有些文件出于政治目的被泄露出来。

这些战术手段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不过人们也从中获得了许多经验。例如蒂娜·罗森伯格（美国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译者注）在哈佛法学院谈到真相委员会时说：“事实上，德国开放档案，使受害者可以用来证实被指控告密的人是否做了所指控的事。这是一个自检机制——捷克的做法中没有这种机制——这些档案只对受害者开放，受害者可以决定是否要公开告密者的名字。”

你的国家有哪些法律有助于人们获取能够证实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并确认加害者的文件？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美洲	政府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保存记忆：几个组织协调行动，保存档案信息，创建查询系统。

“永远不再发生！”是侵犯人权事件曝光之后经常听到的一句誓言。但是，除非有关侵犯人权行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与侵犯人权作斗争者的记忆永远得到保存，否则，这一誓言无法实现。不幸的是，许多人权组织的文件中储存的有力证据往往不被外界所知，今后或许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确

保历史不再重演的人们也无法获取这些信息。“公开的记忆”是由阿根廷的八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他们把各自的工作汇集起来，创建了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数据库。他们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够为表达恒久的集体记忆做贡献。

“公开的记忆”创建了一个系统，让人们可以访问所有公共档案文件、照片和录像，这些公共档案文件、照片和录像为阿根廷的国家暴力带来的恐怖，为受害者和站出来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人提供了证明。任何能上网的人都能搜索文件的在线目录，但是真正的档案资料保存在每个成员组织或“公开的记忆”的办公室里。数据库为了便于用户搜索，给每份资料提供了唯一的索引。数据库还告诉访问者原始文件、照片和录像的存放地点，使感兴趣的研究者能够联系有关组织查看这些档案资料。“公开的记忆”还以开源的方式开发了一个特殊的软件，帮助其他组织创建类似的数据库。

“公开的记忆”数据库档案包括五个部分：1) 文献遗产项目，大约有两万两千份有关国家恐怖主义的文献；2) 记忆地形项目，有关国家恐怖主义历史遗迹的地图、文件和证言——全国有三百四十个前政权的酷刑中心，它们隐藏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普通的建筑物内；3) 照相档案项目，包括来自人权组织、私人收藏和媒体的数码影像；4) 口述档案项目，对三百二十个人的采访——他们的生活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国家恐怖主义时间经历的影响；5) “公开的记忆”自己的文件。

“公开的记忆”由五月广场母亲、人权常设大会、好记性协会、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由于政治原因被失踪和拘留者亲属会、阿根廷历史和社会记忆基金会、五月广场母亲——创始人派、和平正义服务处等八个组织组成。该联盟的组建，是为了开发和支持有关项目，鼓励社区和个人记住军人独裁政权时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公开的记忆”还发起了一个倡议，促进建立纪念馆和公共反思地点的讨论。这些档案未来将会成为纪念馆的主要收藏。

多个组织在档案方面协调合作的战术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只要这些国家有不止一个组织在收集与人权有关的数据资料。这一战术可以成为“记忆”项目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于有多个人权组织都在追踪长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并且需要多种信息来源的国家。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美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全国	严重侵犯人权

法医人类学：利用法医学寻找受害者的遗骸，并确认死因。

在书面文件不足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法医工作能够为诉讼提供证据，还能给受害者的亲属提供信息，让他们的心灵获得抚慰。法医工作是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客观方法。由于法医证据是

科学的，因此，在证明侵犯人权事件时，它甚至比证词和书面文件更有力量。遗体发掘还能让亲属为死者举行传统的哀悼仪式，从痛苦中获得解脱，并继续自己的生活。

过去二十多年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EAAF）已经找到了一些国家暴力受害者的遗骸。在军人独裁政权时期（1976-1983），阿根廷有一万到三万人被政府杀害或者“失踪”。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目标有三个：1) 把受害者遗骸归还给亲属，为他们的心理康复过程提供帮助；2) 为针对国家暴力制造者的法律诉讼提供证据；3) 培训和支持其他遭受此类暴力的国家组建法医小组，调查过去的侵犯人权事件。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是一个长期寻找失踪者信息的调查小组。他们在开始一个案例时，通常先进行初步调查：采访亲属、朋友，以前的囚犯、狱友，以前的政治活动家，询问受害者的身体特征，可能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以查明受害者可能埋在什么地方。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还对警方和其他官方机构的记录——包括受害者的身体外貌、指纹和尸检记录——进行研究。他们必须获得法庭令才能查阅警方档案。在找到十份书面或者口述文件之后，这一过程就会向前推进。

一旦找到受害者可能的埋藏地点，法医人类学小组就会接触受害者的亲属。只有在得到亲属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调查。一旦亲属同意，并且得到检察官或者当局的批准，法医人类学小组就开始发掘遗体。其中某些步骤欢迎亲属参与。法医人类学小组采用标准的考古学技术寻找遗骸，然后工作就会转到实验室进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科学家会将遗骸与所收集到的信息相匹配，以确定死亡的方式和原因。

通过这一过程，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找到了成百上千具受害者的遗骸，给亲属的心灵带来了安慰，还给国内和特别的特别法庭、普通法庭和真相委员会提供了证据。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还就如何使用该技术为全世界许多团体提供了培训。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成员说，这是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过程。

“带着有关他们亲人可能在什么地方的信息去接触亲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寻找亲人的工作可能就此告终，因为亲属并不总是做好了准备。我们与这些家庭建立联系，和他们谈话，直到他们准备好为止。我们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会看到什么，他们能期待什么，还鼓励他们随便提问或者参与这一过程。”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负责人路易斯·方德布里德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开始调查死亡事件时，就把控制这一过程的权力交给受害者亲属和社区。这对那些在暴政时期被边缘化，而且还被排斥在和解过程之外的社区特别重要。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使用的手段，需要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政治自由。但是，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将这一战术输出到三十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明，这一战术并不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

危地马拉的另一个团体也在发掘遗骸的过程中与社区合作，不过，其重点是心理社会服务。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ECAP）与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合作，在对受害者的遗骸进行发掘之前、之中和之后，为亲属和社区提供支持。

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组建了一些支持小组，帮助亲属们安全地分享与丧失亲人有关的情感。在支持小组中，受害者亲属可以思考，可以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故事，还可以学习如何面对暴力的后果和理解现状，这样他们就能为将来做出规划。亲属们在按照自己的传统合法埋葬亲人方面也能得到帮助，这种帮助能够让他们保持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联系。

给亲属们提供了发掘前咨询之后，咨询者就会陪伴他们前往发掘地点，给受害者亲属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接受亲人已经死亡这一现实。在受到普遍的政治暴力影响的社区——危地马拉的乡村地区十分普遍——咨询者会评估暴力的影响程度，组建支持小组，促进关于如何让整个社区获得康复的讨论。为了促进康复，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还帮助社区建立纪念碑、纪念堂，或者可以用其他方式来纪念过去所受创伤的地方。这些项目通过鼓励人们分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分享在重获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和遇到的挑战，提升共同体意识。

你可以怎样利用法医学或者其他专业技术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说出真相： 建立正式的真相委员会来调查和确认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

过去二十年，几个曾经出现过长期侵犯人权现象的国家都为受害者——有时也为加害者——创建了讲述自己故事的论坛。说出真相的过程可以让受害者走出孤独。暴政往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这使得受害者往往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也在遭受同样的迫害。在理想的情况下，说出真相的战术能够吸引全体民众参加，至少能吸引大部分民众参加。因此，这一战术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康复而不是分裂。

真相委员会是政府为了开启和解过程而使用的一种战术。真相委员会的授权——概述了委员会的目的和权力——通常由一国的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确定。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做出了一个战略决定：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程序，而不是仅仅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进行起诉和审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南非议会的授权下建立，其目的是为在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之间，冲突双方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性质、原因和程度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调查。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在1995年通过国家立法建立的。其职责是收集种族隔离时期由政府机构和反对派武装组织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信息。其目标是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人们期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能够就实施政策改革，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提供建议。除了人权和特赦听证会之外，有一些特别听证会专门关注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虐待，还有一些听证会专门关注宗教团体、医疗机构、法律部门、商界和其他消极或者积极地助长了侵犯人权行为的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听证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广播媒体播放剪辑版和现场直播。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两万名受害者为听证会提供了证词。为了让受害者在作证过程中尽可能地畅所欲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还采用了代理人制度（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战术），代理人都是从照顾他人的行业中挑选出来的——比如牧师、社会工作者、护士等等——在听证会之前、之中和之后，他们会给受害者提供支持。代理人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程序和结构接受过广泛的培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中有一个独特的部分，即有权对愿意公开揭露行动详情的侵犯人权犯罪者进行有条件的特赦。特赦的标准包括充分揭露罪行，以及能够确定其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以前的真相委员会都没有尝试过有条件特赦这种政策，这一政策使得许多犯罪者愿意公开承认种族隔离时代许多臭名昭著的犯罪事件的详情，其中包括1977年谋杀活动家史蒂夫·比科的罪行。提供证词者不能保证得到特赦，不过，起诉未获得特赦者或未出面作证者的工作目前尚未开始。

1998-2002年之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了七卷报告。虽然其长期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但是报告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为如何预防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已经对新政府产生了影响。报告还收集了大量种族隔离时代侵犯人权行为的确凿证据。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未实现其全部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拒绝作证的犯罪者遭到起诉，南非还在继续为争取受害者的赔偿进行斗争。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很多国家在很多种情况下都建立过真相委员会，其职责和结果各有不同。有些有传讯权，有些则没有重要的法律工具可以使用。有些是公开进行的，甚至举行电视听证会，有些则几乎完全是闭门工作。有些委员会建议，为了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应该对幸存的受害者做出经济赔偿或其他赔偿。许多委员会被要求提出实质性建议，以便对政治、军事、警察、司法制度，对社会和教育领域进行改革。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任委员格伦达·维尔德斯屈特坦承，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一些限制，例如：

委员会只调查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强迫迁徙、剥夺土地以及跨族婚姻法和其他许多立法的受害者无法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救济。

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赦委员会有权直接特赦，但是赔偿委员会的职责只是给议会提出政策建议。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跨越三十四年——从1960年到1994年——但其工作时间只有三年。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很少有资源为受害者提供情感或心理的支持。

这一战术仍然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真相委员会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无力感，因为它曝光了侵犯人权事件，而犯罪者却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些人认为，真相委员会可能会代替法律诉讼。另一些人则争论说，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强求法律起诉只会增强犯罪者抵抗民主变革的决心和力量。不过，真相委员会可以作为一个更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战略既包括说出真相的部分，也包括惩罚侵犯人权者的部分，或者像阿根廷所做的那样，真相委员会也能帮助创造起诉犯罪者所需要的政治氛围。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非洲	政府	社会	全国	严重侵犯人权

国际战争罪法庭： 建立国际特别法庭，加强对战争中性犯罪的认识，并为此寻求赔偿。

亚洲的一个联络网组建立了一个国际战争罪法庭，以保存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的记忆，并且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日本战时暴力对待妇女联络网（VAWW-NET）建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证明战争中性犯罪受害者的存在，并为她们寻求正义。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府通过“慰安所”（由军方控制的妓院）网络，建立了一个性奴隶系统。估计约有四十万名妇女和女孩被迫进入这一系统。将近五十年之后，这一暴行仍然隐藏在沉默的面纱后面。

1998年，日本战时暴力对待妇女联络网提议，建立针对女性受害者的国际战争罪法庭，并且组建了国际组委会（IOC），国际组委会中包括受害者的祖国、日本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国际组委会为战争罪法庭制定了程序和规则，并于2000年12月在东京开庭。法庭上，由十个国家的检察官组成的小组提交了起诉书，其中一份起诉书由朝鲜和韩国联合提交。由四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代表了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主持了审判。法庭听取了幸存者——被称为“慰安

妇”——和两名当年士兵的现场证词和录像证词。专家们还就日本军队的结构作了证。法官们审阅了官方文件、回忆录、日记和案情摘要。整个审讯过程中，法庭大厅挤满了人，观察员和国际媒体记者达一千人。三天之后，法庭宣布了有关事实和法律的初审判决，并且提出了赔偿建议。

国际战争罪法庭是一个创新，它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战争中的性犯罪的认识。1995年，日本政府和日本公民组织共同建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AWF），以表达歉意和悔恨，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虽然该基金会为受害者筹集了四亿八千三百万日元（约合四百万美元），但是，许多幸存者及其支持者认为，亚洲妇女基金会是日本政府避免直接赔偿的手段。有些受害者拒绝了这一民间基金会的赔偿。

国际战争罪法庭打破了数十年来围绕战争中的性犯罪问题的沉默，这个问题在日本属于禁忌，国际社会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战争罪法庭让国际社会注意到“慰安妇”遭受的痛苦，鼓励给受害者提供私人捐助的做法。但它没有能够让日本政府承担直接赔偿的责任。

类似的特别法庭本身可以打破围绕其他问题——无论大小——的沉默，也可以为其他的国际行动造声势——例如为受害者建立基金会或者组织一场强有力的国际运动。

类似的模拟审判也可以用在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国家之外。例如，在美国，“明尼苏达人权维护者”组织了一个模拟法庭审判红色高棉。在法庭上，当地的柬埔寨社区成员为柬埔寨大屠杀作证。这给柬埔寨人提供了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也给明尼苏达州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们社区的柬埔寨新移民从什么样的灾难中死里逃生的机会。这一项目还制作了一个口述历史录像，现在已成为明尼苏达历史中心的永久收藏。

你们可以怎样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盟友，让人们注意到你们的斗争？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亚洲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国际 地方	战争罪行 严重侵犯人权

巩固个人和社区

传统的人权手段可以打破暴力的循环，但是首先必须处理压迫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否则无法恢复和平的环境。本节中的战术目标是让个人和社会恢复正常，并且开始一项复杂的工作——创造能够为将来的社会进步铺平道路的良性循环。

对个人造成伤害的侵犯人权事件也会破坏家庭和社区。侵犯人权事件会摧毁人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会破坏让我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制度和人际关系。长期普遍的侵犯人权模式——无论是在暴政之下还是在战争期间——可能会产生大批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也会给表面上依然保持完整的社区带来心理上的破坏。

以下战术包括一些创新方法——用来重建社区和支持受侵犯人权事件影响的个人——例如，现代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和康复技术（心理治疗的细节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关键要注意的是，这些战术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借助了社区的支持。但那些被冲突或暴政破坏严重的社区可能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借助。然而，发现和借助现有的内部资源——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人们渴望加以利用的技术和潜能——对重建社区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三种战术（指从难民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欢迎儿童士兵回家，和平圈——译者注）的关键在于使被内战、酷刑和流离失所撕裂的社区恢复正常。有时候——尤其是在部落战争之后——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不得不在同一个社区一起重建自己的生活。虽然，最自然而然的做法似乎是关注受害者的需求，惩罚侵犯人权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与侵犯人权者一同工作，有助于满足某些重要的社会需求。

从难民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通过强化培训的方法，提高当地心理创伤健康服务的能力。](#)

酷刑受害者中心（CVT）（该组织负责协调人权新战术项目，还出版了本书）正在帮助重建有大量人口遭受过酷刑或者战争创伤、被迫背井离乡的社区。

酷刑受害者中心把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难民培训成心理咨询健康辅助人员。这些为其他遭受过酷刑和战争创伤的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难民，不仅提高了酷刑受害者中心的服务能力，也为以前没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社区培养了合格的社会心理工作者（PSA）。这些社会心理工作者可以在督导师的帮助下从事许多专业工作。

西非的战争冲突已经影响到大量人口，成千上万的人进入难民营，像酷刑受害者中心这样的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满足难民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因此，酷刑受害者中心决定利用难民营的资源，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难民营中征募了超过一百二十名难民担任社会心理工作者。

难民营提供了地方，可以集中为幸存者提供帮助，还可以为幸存者提供长期密集的督导和培训。在为难民提供服务之前，许多社会心理工作者已经接受了长达四年的持续培训和日常督导。

酷刑受害者中心的密集实践培训模式，把西方的心理治疗与当地对创伤和恢复的理解结合到一起。项目始于为期两周的培训课程，然后是每月一次，每次一天的培训课程，以及每季度一次，每次七天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的重点是创伤理论、普通心理学、咨询和沟通技术。酷刑受害者中心

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每天在难民营中工作，给受训者进行行为示范，帮助他们进行实践。在工作时，社会心理工作者要花十周时间观察心理健康专家如何辅导治疗小组，花十周时间协助辅导治疗小组，再花十周时间在有定期督导的情况下独自辅导治疗小组。培训结束之后，社会心理工作者就能精通创伤的影响，精通促进创伤恢复的工作和项目评估。他们也能成为有技术的小组辅导员和有效的沟通者。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酷刑受害者中心使用这一战术，是为了帮助社区自我恢复。被培训为社会心理工作者的难民得到了赋权，因为他们学到了新的技能，能够为自己的社区做些有益的工作。他们的服务对象也能接受到所需要的心理保健服务，而且他们会看到，帮助自己的是自己社区的人，而不是外来的人。

虽然此处描述的战术是用于帮助酷刑和战争创伤的受害者，但它也可以用于为其他深受暴力影响的群体提供服务。

发展医疗、心理健康或公共卫生辅助人员的骨干队伍，能够在你们的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吗？你们可以怎样发展这一能力？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国际	酷刑

欢迎儿童士兵回家： *结合传统和西方的康复技术，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区。*

儿童士兵是受害者，但常常也是侵犯人权者。他们中有些人被迫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有时这些罪行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这不仅给家庭和社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使家庭和社区难以接受他们回家。在莫桑比克，一个团体采用了一种需要儿童士兵、社区、传统的社区领袖和治疗师之间合作和信任的战术，该战术帮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区生活，并为整体性的康复过程提供支持。

莫桑比克的“重建希望”组织把传统中的康复技术和西方心理学结合起来，帮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会。莫桑比克内战的破坏性惊人，双方都使用了成千上万名儿童士兵。与“重建希望”合作的心理学家卢西亚·万巴说：“儿童士兵经历过无法想象的恐怖，他们是通过自己社区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来处理这些经验的，他们的康复也必须通过同样的体系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康

复和社区的团结。”“重建希望”组织认识到，单靠传统的治疗方法和个体化的心理学治疗，都不足以满足儿童和社区的需要。

“重建希望”先进行了一项调查，找到那些不愿意接受儿童士兵回家的社区，然后在社区中找到资源。“重建希望”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当社区成员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去找的往往是传统治疗师，因此，“重建希望”的工作人员会征得社区领袖的支持，与传统治疗师建立联系。

心理学家到社区去调查了传统治疗过程在促进和解和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接触了儿童士兵的家庭，了解他们的需要。起初这些家庭不愿信任外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再次被带走。心理学家还拜访了当地的社区领袖，跟他们解释创伤造成的影响，询问他们是否看到回家的儿童士兵有某些特有的问题，他们是否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当地的社区领袖承认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心理学家就会提出与传统治疗师合作。

当地的社区领袖会陪心理学家一起拜访传统治疗师，鼓励他们合作。心理学家和传统治疗师都认识到，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为了与社区建立信任，“重建希望”还要与社区合作，了解社区最需要哪些物资——比如住房、教育和农具等，然后给予社区这些物质援助。

这样做的结果，是找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康复途径，传统治疗师和心理学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儿童士兵可以在传统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之间相互转诊，以便实现康复的最佳结果。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不幸的是，从前的儿童士兵会给社区带来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并不是莫桑比克特有的。这一战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正在努力使战争幸存者重新融入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社区领袖和传统治疗者要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虐待者和遭受虐待者必须和平共处。一个社区要想恢复正常，就必须克服那种认为侵犯人权的犯罪者都是邪恶的，无法以任何积极和有意义的方式重新融入社会的观念。资源稀缺可能会使这一战术难以实施，尤其是当社区成员认为，资源最好用来帮助受害者，而不是侵犯人权的犯罪者的时候。

“我们在社区领袖夫人的陪伴下拜访每位传统治疗师，她是我们进入传统治疗师家的通行证。她说：‘他们是医生，他们到这里来是想提供帮助。我带他们来找你，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传统治疗师会告诉我们，他们为那些孩子都做了什么，我们会说明我们项目的教育过程是把重点放在孩子和整个社区上。我们提出我们应该合作。如果传统治疗师能够先驱走那些孩子身上的邪魔，就可以让孩子们来找我们，我们能把他们培养为正常的男人和女人。”

——莫桑比克“重建希望”组织卢西亚·万巴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儿童士兵

和平圈：让社区参与决定对犯罪者的判决，并且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受害者和犯罪者很少有机会能够坐到一起，以既能让社区恢复正常，又能预防今后犯罪的方式讨论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社区中，人们正在使用一种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传统，来解决当代的正义问题。

“和平圈”使用了传统的圆圈仪式和结构，创造了一个相互尊重的空间，让所有感兴趣的社区成员——受害者、受害者的支持者、犯罪者、犯罪者的支持者、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都能抱着分享的态度公开发言，以便讨论犯罪问题，确定怎样才能让受影响的各方恢复正常，防止此类事件今后再次发生。“和平圈”建立在“谈话圈”的传统上，这一传统在北美原住民中十分常见。在谈话圈中，一个被称为“谈话标记”的物体从圈内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以此来组织对话。

“和平圈”的程序由社区主导，与刑事司法系统合作。这一程序通常有几个阶段：犯罪者申请举行和平圈程序，受害者康复圈、犯罪者康复圈、就判决内容达成共识的判决圈、监督犯罪者进步的跟踪圈。这一程序可能还包含司法系统、社区、家庭成员和犯罪者本人的承诺。

“和平圈”开会时，参加者坐成一圈，没有桌子和其他家具。“和平圈”由一名负责人主持，负责人通常是受过培训的社区成员，负责给“和平圈”定下尊重和希望的基调，支持和尊重每位参加者。参加者只有拿着“谈话标记”时才能发言。“谈话标记”在圈中顺时针传递，让每位参加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谁说谁听是由“谈话标记”决定的，所以主持人的作用减弱了，还消除了中间有人插话的问题，也给那些通常很难加入对话过程的参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和平圈”鼓励每位参加者都为理解问题和产生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和平圈”程序首先是分别为受害者和犯罪者举行的谈话圈，参加者针对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行动计划。‘和平圈’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决定对犯罪者的判决，还可以规定社区成员和司法官员的的责任。举行“和平圈”程序之后还要进行定期的沟通和报到，以便评估取得的进展，或者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调整解决方案。

‘和平圈’是这样一种方法：它让许许多多有着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坐到一起，就冲突、痛苦和愤怒进行艰难的对话，同时创造一个尊重每位参加者的存在和尊严的空间。除了支持受害者和帮助犯罪者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外，‘和平圈’还能用于帮助陷入危机的家庭制定计划，解决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冲突，弥合代沟和文化鸿沟。”

‘和平圈’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者。哪些案例适用‘和平圈’程序，主要是由犯罪者与社区的联系，犯罪者努力改过的诚心和本性，受害者的意见，帮助犯罪者回归正常社会的团体的努力程度来决定的。由于社区的健康程度与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和冲突的能力有所不同，因此，社区判决圈中也有正式的司法人员参加，以便保护受害者和犯罪者，防止他们遭遇不适当的社会反应，避免权力失衡。”

——美国“和平圈”培训师凯·普拉尼斯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美洲	政府	社会	地方	和平

在线讲故事：在互联网上建立论坛，供从前的儿童士兵分享自己的故事，并且学习新的技能。

新技术提供了机会，能够提高我们对侵犯人权事件的认识。

2000年，塞拉利昂国际教育资源的儿童士兵项目启动，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供从前的儿童士兵分享自己的故事。该网站（www.childsoldiers.org）上有从前的儿童士兵发表的观点和他们创作的散文、诗歌、艺术作品，网站还提供了一个在线论坛用于讨论有关的问题。

塞拉利昂国际教育资源网的工作人员去学校、医院和难民营进行访问，利用广播电台和报纸向从前的儿童士兵宣传这个项目。该项目教参加者阅读、写作，基本的文字处理和计算机技能。他们还招募护士和精神病医生为参加者进行创伤咨询。

参加者学会使用计算机之后，就会用该网站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从前的儿童士兵的故事、图画和想法，受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线论坛让参加者能够与从前的儿童士兵同伴和其他人一起讨论和辩论。参加者们学会了技能，树立了信心，就能更容易在社会上自立。迄今为止，已有超过二百名从前的儿童士兵参加了该项目。

本战术使用互联网帮助分散的受害者群体分享他们的故事并相互联系。这一战术也可以适用于像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比较分散，或者少数族群（如残疾人或男女同性恋者）无法与认识的人谈论自己经历的情况。互联网可以给这些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与能够理解自己的人联系。不过，互联网有时无法保证个人的信息安全。

这一战术显然需要有适当的技术基础设施。不过，既然国际教育资源网在饱受战争蹂躏、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已经取得了成功，就说明这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怎样才能让人们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这些儿童中，有些人对艺术很有天赋，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天赋，会让他们相信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他们的歌曲、音乐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以及从同伴那里得到的大量反馈，已经成为社会正义和积极变革的催化剂。”

——塞拉利昂儿童士兵网站安德鲁·本森·格林尼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儿童士兵

给儿童带来希望：组织夏令营，让儿童暂时远离暴力。

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团体给被占领土上的儿童提供一个在和平的环境中与其他儿童联系的机会，以治疗他们的精神创伤。

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市的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TRC）组织了免费的夏令营，帮助遭受精神创伤的儿童恢复健康。夏令营提供娱乐、艺术和康复活动，帮助孩子们相互支持，并处理他们的创伤与恐惧。

1967年，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该地区持续的暴力冲突创造了一种受暴力支配的文化，全体巴勒斯坦人都造成了心理上的影响。约旦河西岸儿童出生在沉重而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中，多数儿童都目睹过暴行。

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建立了夏令营，帮助减轻这些儿童面对的艰难困苦，提供了康复治疗的环境。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在附近的村庄、难民营和自己的客户中间宣传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儿童大多数（约占60%-70%）由于创伤经历而出现了焦虑、抑郁和孤独的症状，许多儿童目睹过家庭成员的死亡或者遭受酷刑。

夏令营为期三到四周，每天聚会四到五个小时。多数夏令营位于儿童的居住地附近，还提供儿童们来往夏令营的交通工具。参加夏令营的儿童根据创伤的程度和种类分组。每名儿童都有一个辅导员和他们聊天，给他们提供咨询，让他们融入小组。每名儿童都有机会见到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夏令营的最初三天和最后三天通常用于绘画、艺术和体育项目。其余时间的重点是团体治疗，例如团体动力学治疗、咨询、游戏和艺术治疗。每期夏令营结束时都会做医疗和行为报告，以评估夏令营对每名儿童造成的影响。

父母和咨询者填写的评估表格显示，许多儿童离开夏令营时，焦虑症状更少，暴力行为更少，更加开放，更加融入社区。绘画项目要求儿童用图画来反映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或者对未来的希

望。多数情况下，儿童们在夏令营开始时的图画描绘的形象和色彩都比较灰暗。而夏令营结束时的图画则显示，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对未来充满希望。

夏令营给儿童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走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探索不同的处理创伤的方法。夏令营还给儿童提供了一个放松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这里通过游戏和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接受康复服务。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儿童权利

夺回历史记录权：记录受害者的证词，创造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帮助与世隔绝的社区了解他们的国家发生的战争罪行的来龙去脉。

传统上，历史是由当权者书写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无论是贫困的社区，还是内战中被抓的平民——很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使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也是这样。危地马拉的一个团体让遭受战争蹂躏的与世隔绝的社区参与到书写战争史的过程中。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是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开启了地方层面上的和解过程，使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说出他们的想法。

作为正在进行的“恢复历史记忆”（REMHI）项目的一部分，危地马拉天主教会的几个教区动员成员去收集国家暴力受害者的证词。然后把这些证词编纂为一份报告，把历史记录的权利还给受其影响的社区和个人。

在三十六年的内战中，危地马拉有将近二十万人被杀害、失踪，或者遭遇其他侵犯人权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由国家安全部队所为。“恢复历史记忆”开始于1994年——就在危地马拉签署和平协议之前的一年——该项目是危地马拉大主教人权办公室倡议的，由大主教胡安·杰拉尔迪领导。虽然早先的和平协议中列入了有关真相委员会的内容，但是该项目开始时真相委员会尚未成立。教会认为，由于社会严重分裂，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暴力，真相委员会可能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

因此，“恢复历史记忆”决定，使用教会的体制结构和人脉，开启就暴力问题举行对话的空间，以促进将来的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教会通过海报、传单和电台广告宣传这一项目。每个参加项目的教区提名两名教众担任“和解促进员”。“恢复历史记忆”项目不同于其他和解工作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个人——往往是担任“和解促进员”的暴力受害者——的草根动员能力。该项目在全国有将近八百名“和解促进员”，负责收集和分析五千到七千名曾经遭受过暴力、酷刑，或者失去过家庭成员者的证词。由于暴力仍在持续，收集证词的工作给教会及其成员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对证词的分析证明，国家安全部队对战争中多数侵犯人权事件负责。共有四卷的项目报告《危地马拉：不蹈覆辙》于1998年4月24日公之于众。不幸的是，报告发表两天之后，胡安·杰拉尔迪大主教遇刺身亡。后来，有军方人员因为大主教之死被判有罪。

尽管大主教遇刺身亡，但许多“和解促进员”仍在继续该项目。他们向参加项目的社区报告项目的结果，帮助把个人和社区的经历放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去。如果有当地语言的翻译，参加者就会提供《危地马拉：不蹈覆辙》的通俗版本，以便在集体讨论时朗读。人们从报告中得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事也发生在全国各地许多人身上。“和解促进员”还在和解工作中给社区提供帮助，提倡用非暴力的方法解决冲突，为建设和平文化做出贡献。这些工作与发掘和重新掩埋受害者遗体（在玛雅文化中，这是康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作同时进行。“恢复历史记忆”也为危地马拉查明历史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他们不仅为目击证人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提供支持，还提供了大量的证词。

“恢复历史记忆”项目的战术，可以用于促进或者帮助其他国家的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用于没有真相委员会，或者受侵犯人权事件影响最大者无法参与真相委员会或诉讼程序的情境中。

这一战术在危地马拉十分有效，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会的体制结构和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如果没有可信任的网络，如此大规模地收集个人证词就会十分困难。这一战术还需要有资金支持，危地马拉因为财政资源有限，所以教会把工作分给各教区去做。

这一战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许多侵犯人权者仍然在军队和政府中身居高位，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已经发出了威胁，甚至刺杀了领导该项目的大主教。

当地社区的人参加你们组织的和解过程的积极性有多高？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巩固个人和社区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严重侵犯人权

寻求救济

在巨大的罪行犯下之后，是否能够对受害者做出充分而公平的赔偿？惩罚侵犯人权者能够治愈受害者的创伤，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吗？法庭是否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国际社会也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节中的战术，都试图在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后以某种形

式伸张正义。无论其方法是惩罚侵犯人权者，赔偿受害者，还是消灭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文化和体制结构。

对那些犯下战争罪行或者反人类罪行的侵犯人权者提出法律诉讼，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一系列完美的计划：有适当的国内法律或者国际条约；有充分的证据；拘押被指控者，并将其本人送上法庭；有引渡条约和引渡机制。如果真正进入这样的诉讼程序，会非常引人注目。我们也能从中了解许多有关国际公约、条约和法律框架的意义和知识，还能学习许多有关国际社会在预防和纠正错误方面的作用和知识。

这些案件主要不是为了惩罚某一位特定的侵犯人权者，而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我们的社会是依靠法律和正义运行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也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人们已经找到了许多创造性的方法来曝光侵犯人权行为，让犯罪者承担责任。

国际司法第一案：利用国际法起诉在国外旅行的独裁者。

逮捕和引渡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是最特别的法律案件之一。它开创了一个先例，未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先例来将现任或者前任国家元首送上国际法庭。

西班牙和英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律裁决，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要为其统治期间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接受审判。

早在1973-1990年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人权活动家就开始记录皮诺切特的军队实施的非法拘禁、强迫迁移、谋杀、酷刑和失踪的案例。智利恢复民主之后，官方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整理了大约三千起侵犯人权案件的详细信息。然而，皮诺切特不能在智利受审，因为在离职前，他和他的多数同谋都得到了免遭起诉的宪法保护。

于是，代表人权遭到皮诺切特政权侵犯的受害者的律师们在西班牙提起了刑事诉讼，他们利用了一个被称为“人民行动”的程序设计，该程序允许西班牙公民在一定条件下提起刑事控告。西班牙法院可以根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受理涉及酷刑、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的案件，无论罪行发生在哪里，也无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国籍在哪里。

然后，西班牙法院发出了逮捕证，皮诺切特在访问伦敦时被英国当局逮捕。皮诺切特及其辩护者质疑这项逮捕令，理由是前国家元首有不受逮捕和引渡的豁免权。但英国上议院两次裁决拒绝了这一理由。裁决说：第一，虽然前任国家元首对其履行国家元首职务时的行为享有豁免权，但是酷刑和反人类罪行不是国家元首的职务；第二，英国和智利都批准了1984年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根据此公约，皮诺切特不能为酷刑指控要求豁免权。

皮诺切特最终以患病为由被送回智利，没有在西班牙受审。智利最高法院剥夺了他自己给予自己的豁免权，并且裁决他应该接受审判。但是，后来该法院裁决，皮诺切特因病不能受审。

英国上议院的裁决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元首对酷刑指控不享有豁免权；根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这种罪行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起诉；可以用国内法庭迫使国家履行国际法义务。

国际关注也改变了智利的政治平衡，使智利不再保护包括皮诺切特在内的人权侵害者不受法律的处罚。最重要的是，皮诺切特在伦敦遭到长期羁押，减少了他在智利民众中引起的恐惧，使智利得以朝着民主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欧洲	政府 社会	政府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问责跨国公司： 利用国内法律，将在其他国家犯有反人类罪行者绳之以法。

美国的一个团体利用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联邦法律，允许其他国家的侵犯人权受害者在美国起诉起同谋作用的跨国公司。

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利用《外国人侵权索赔法》（ATCA）起诉那些在侵犯人权行为中起同谋作用的跨国公司。1789年，美国开始实施《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制定这项法律是为了打击和预防海盗行为。该法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它允许外国侨民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对美国公民和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长期以来，虽然人们一直在利用法律战术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但是，利用国内立法对付发生在国外的侵犯人权行为，给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手段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把重点放在跨国公司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上。

许多外国侨民无法在他们自己国家提起诉讼。例如，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的第一个《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件，是代表缅甸难民，就缅甸输油管使用强迫劳工一事起诉优尼科石油公司。因为缅甸法院不可能接受这些难民提出的控告，而《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则允许外国侨民在美国提起诉讼。但是，案件要想被法院受理，必须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是故意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正在努力证明这一点。

除了起诉优尼科公司之外，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还起诉了可口可乐、埃克森美孚、德拉蒙德和德尔蒙食品公司，这些案件都尚未结案。美国司法部长应行政部门的要求，目前正在审查《外国人侵权索赔法》，试图就限制该法律的范围提出法律意见。

目前的国际人权法律机制对付跨国公司不是特别有效。这一战术利用国内法律，扩大了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机会。它还给跨国公司传递了一个信息：要为通过商业投机来助长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一战术也提高了公众对人权问题的认识。

其他国家——仍在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或者没有诉诸法律机会的国家——的受害者也可以利用《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或者其他类似的法律。不过，根据狭义的解释，《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只适用于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奴役、法外处决、酷刑和非法拘禁。

你们国家有哪些普遍管辖权法律能够让各种实体为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美洲	公民社会	企业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侵犯人权测试：测试歧视行为。

当侵犯人权事件隐藏得很深，或者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时，受害者就很难证明发生过侵犯人权事件。匈牙利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测试方法提供歧视的证据，并代表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

一旦有人提起歧视指控，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NEKI）就会使用一种测试方法来收集证据，这种方法是借鉴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测试住房歧视的方法。在2000年的一个案件中，匈牙利法院首次承认，测试是证明歧视的有效技术。

罗姆人在欧洲若干国家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常常成为歧视犯罪的目标，也常常被指责为增加了匈牙利的犯罪率和失业率。罗姆人受到歧视的方式包括无法获得工作、住房和公共设施服务。由于歧视往往进行得很隐晦，因此，要找到直接证据十分困难。

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使用测试战术证明存在歧视现象，并获得有关的直接证据。该团体招募了合适的人选，然后把这些人培训成测试员。在挑选测试员时，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会评估他们是否能在法律诉讼中成为客观、可靠的证人。由于诉讼可能会长达数年之久，测试员必须愿意长期与项目保持联系。

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接到遭遇歧视的投诉之后，工作人员会评估案件，如果决定受理，就会派测试员前往投诉者声称遭遇歧视的地方，测试歧视是否真的存在。例如，歧视投诉是关于找工作的，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就会派两名特征和资历都类似的人，这两人唯一的差异就是种族——一个是罗姆人，一个是非罗姆人。他们会在同一天去申请工作，两名测试员会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于做清晰的对比。

测试之后，测试员会立即按指定的程序记录其经历，详细报告招工单位面试时问到的问题，给申请者的待遇，以及对工作进行说明——如工资和福利——时的态度。然后，测试协调人（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律师）会评估是否存在区别对待。这一信息往往被用于支持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

截至2002年，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已经对十五个案例使用了测试战术。其中有三个案例无法完成测试，在十二个完成测试的案例中，有五个没有找到制度性歧视的证据。但其余七个案例的测试证明了歧视现象的存在，有充足的理由采取法律行动。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源于美国，是一种灵活性很强的战术。欧洲的其他组织也接触了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以便学习如何把这一战术用于残疾人权利等人权问题上。测试也可以用于评判各种机构的用工制度，例如企业和警察部门。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少数民族权利

要求赔偿： 说服政府对警察、军队和武装人员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了有关侵犯人权的投诉，并建议地方政府为受害者提供赔偿。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已经证实的警察侵犯人权行为做出了回应，要求政府为受害者提供经济赔偿，并对犯罪者进行惩罚。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是根据《保护人权法》（1993）的规定而建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权调查公务员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教唆或疏于防范侵犯人权行为——并就应对措施提出建议。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的投诉多数是针对警察的，但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曾建议对军队和武装人员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的侵犯人权投诉大多来自活动家和媒体，也有一些来自受害者或其亲属。常见的投诉包括身体虐待，骚扰个人或家庭，不遵守有关妇女待遇的程序，在拘禁时被忽视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非法拘禁和酷刑。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收到过关于童工、包身工和侵犯社会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残疾人、特定种姓或部族的人、难民、少数民族等）权利的投诉。

收到投诉之后，国家人权委员会会要求投诉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或者指示其调查部门调查该案件。如果事实得到证实，国家人权委员会就会与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邦政府一起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建议对受害者做出经济赔偿，并且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有关的邦可以自由决定从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务员手里拿回多少赔偿金。

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其月度通讯《人权》和年度报告中会发布重要案件的详情。媒体也会对重大案件进行报道。

只有在赔偿足够多的情况下，赔偿方案才能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庭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虽然帮助受害者获得了赔偿，仍然需要督促政府对这类问题进行体制性的改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还是十分有益的，它让官员注意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制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

创建一个这样的人权委员会，需要有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还需要争取更多受到人权侵害行为影响的人的支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确保受害者及其家属知道他们可以使用这一渠道，而不必害怕报复。

怎样向政府机构和政府部门问责，并且说服他们支持你们的事业？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亚洲	政府	政府	全国	军队和警察的人权侵害

动员起来，反对免责：通过公民投票或发动请愿来提高民众对政府免责的认识。

有时候，立法和政府方面的工具是存在的，但是公众不了解，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乌拉圭的一个团体组织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民众行动，以防止乌拉圭军队中的侵犯人权者得到起诉豁免权。

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CNR）启动了宪法中的一个从未被援引过的条款，在乌拉圭发动了一场就国会决定给予被军队雇佣的侵犯人权者豁免权问题的公民投票。为了向政府请愿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需要在豁免权法律通过后的一年之内，收集到25%合格选民的签名。

要收集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签名，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还需要有广大志愿者的参与——志愿者多数来自妇女运动。把参与者组织起来就是一大挑战。例如，全国收集签名运动期间，组织者在一天之中就要协调九千名志愿者的工作。运动大规模开展之时，他们使用了计算机和电子表格程序整理签名。

收集签名并且提交给政府之后，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在选举审查委员会上公开捍卫签名的有效性。在整个收集和提交签名的过程中，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动员了草根组织来与政府和媒体的大量反对意见进行斗争。他们散发传单、悬挂横幅、张贴海报，举办集会、音乐节和自行车马拉松比赛。

虽然公民投票以微弱劣势落败，但是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的工作为乌拉圭的民主发展创造了一种新工具。运动期间，每三个乌拉圭人中就有一个被志愿者直接拜访过。此后，公民投票又进行过八次，而且越来越受欢迎。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的志愿者和领导者继续在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

虽然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没有达到其最终目标——取消给予豁免权国会决定——但它确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了乌拉圭的公民社会，并且使豁免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志愿者的拜访，令非常多的人知道了有关的法律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这一问题的人甚至更多。

像乌拉圭的公民投票权这样很少使用的法律条款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为请愿书收集签名当作动员民众表达对政府现行政策不满的手段。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人权侵害事件

为历史承担责任：调动公共资源帮助社会边缘群体。

找到侵犯人权者，并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寻求救济时，有些团体帮助受害者寻求治疗、经济赔偿或者退还被没收财产，这是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这些团体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迫使政府承认自己在侵犯人权中的作用，然后迫使其承担起赔偿受害者或者帮助他们获得治疗的责任。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ICAR）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为两件事提供支持：第一，为建造酷刑治疗中心提供物质条件；第二，为酷刑幸存者提供免费医疗和覆盖专门的护理和服务的保险。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战术是战略的一部分。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说服政府为国家的历史承担责任，以便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在罗马尼亚，许多在共产主义时代实施过酷刑的人逃脱了惩罚，有些人甚至还在社会中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受害者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宁愿忘记过去及其受害者，而不是从中吸取教训，以促进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投入。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首先与罗马尼亚前政治犯协会合作，赢得受害者的信任，然后确定该群体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获得财政和立法支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市、自治市和国家机关——比如卫生部——中的公务员、医学专业人员和官员的支持。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也与其他小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和丹麦的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理事会（IRCT）建立了联盟。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花了十年时间，说服了罗马尼亚政府承认，对那些在前政权统治下遭受过痛苦的人负有责任。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成功来之不易，这主要因为罗马尼亚当时正在进行政治转型。他们审时度势，利用了这一政治开放进程。新的法律和新的开放社会也允许受害者们组织起来，而不必害怕报复。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这一战术服务于双重目的：赔偿受害者，让政府为历史问题承担责任。

你们怎样说服政府投入资源为受害者提供服务？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酷刑

揭露侵犯人权者：通过有针对性的示威，公开曝光侵犯人权者。

侵犯人权的犯罪者得到豁免权（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之后，可能会过上一种相对匿名的生活——有时甚至会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阿根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决定，即使不能通过法院起诉犯罪者，也可以向民众揭露犯罪者。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H.I.J.O.S）在被确定为侵犯人权犯罪者的住宅门外组织有针对性的示威。这些示威被称为“揭露”，即公开曝光侵犯人权者，让社区成员表达道德谴责。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的成员多数是失踪者的孩子，该组织首先是要找到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1976-1983）执行镇压的人。然后开始揭露准备工作。他们向侵犯人权者居住社区的地方工会、图书馆和其他社会组织通报，在社区和学校散发小册子，组织非正式的演讲。揭露准备工作的目的是吸引社区成员的参与，社区成员的参与是这一战术取得成功的关键。到了正式揭露的那一天，抗议者会聚集在目标住宅附近的广场上，或者聚集在其他公共场所发表

演讲，描述侵犯人权者的罪行，对他进行谴责。抗议者会在墙上张贴传单，内容包括侵犯人权者的照片、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履历。如果合适的话，抗议者还可能采取其他各种行动。针对一个以上的侵犯人权者——通常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会采用移动示威的方式进行揭露。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有法律代表帮助他们解决与警方或者对方的支持者发生的矛盾。但是，要实现其目的又不发生冲突的关键，是要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示威。

揭露结束之后，这一战术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侵犯人权者的邻居们了。有时这些邻居的反应非常强烈。有几个例子是，侵犯人权者一进商店，商店就关门，一进酒吧，酒吧就变得空无一人。有些成为目标的侵犯人权者因为遭到社区排斥，不得不离开居住的地方。

虽然大赦法案让人们很难起诉侵犯人权者，但是，“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绕开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用幽默、戏剧和其他创造性的示威手段，鼓励社会排斥侵犯人权者。

这一战术具有某些严重的风险。使用这一战术必须保证目标正确，还要保证示威不被用于其他政治目的。大型示威组织者的身边往往不乏情绪化的下属，因此，必须要有落实到位的机制来防止活动滑向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类似行动可能会使社区中的人们反对抗议者，因为他们可能不想被类似的活动所打扰。

你们可以怎样利用整个社区的力量来谴责侵犯人权事件或侵犯人权者？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严重侵犯人权

重建社区：为个人历史绘制地图；调动记忆，以恢复某个地方的历史；收回失去的土地。

专制政权常常迫使人们背井离乡，让整个社区陷入混乱，还会没收人们的土地和财产。殖民者和废除了各族隔离后的新社会也侵占过原住民的土地。把这些财产归还给原来的主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有清楚的产权界定。南非的第六区博物馆使用创新的方法迎接了这一挑战。

南非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开创了一种主张土地所有权的方法，让人们最终重新获得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失去的财产。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也是一个让人们能够收集、传播和交换社区记忆的地方，他们还积极参与了倡导有关人性化城市的公民对话工作。

1966年，按照《种族区域法案》，开普敦第六区的种族融合社区被夷为平地，为建设新的“纯白人”社区让路，但是这一建设工程从未开工。那里留下的唯一建筑就是卫理公会教堂。

作为捍卫土地和社区完整运动的一部分，一个从前的社区居民组成的团体布置了一个展览，核心展品是一幅覆盖了整个卫理公会教堂地板的社区被摧毁的详细地图，然后邀请邻居们在上面画上自己原来的房屋、树木、商店和社区公共空间。

这个地图绘制项目成为回收土地所有权的基础。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组织并主持了一个土地法庭，人们可以在法庭上主张自己或自己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法庭开庭的地点就在老社区的地图上。其中一位权利主张者说：“我们的土地回来了，我们的房屋回来了，我们的尊严也回来了。”此后，普敦第六区博物馆还布置了一些根据《种族区域法案》摧毁的较小的社区——包括克斯坦布希和双河——的历史展览，宣传和支持这些社区尚未解决的土地所有权的主张。

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试图提供一种持久的个人康复与和解的过程，它还提倡让民主和人权的文化在社区延续，让强迫迁移的记忆永存，并且传递给新一代。有关过去的公共记忆，加强了将来在民主国家预防种族隔离、强迫迁移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努力。

接下来的几年里，从前的第六区居民将重返社区，收回自己的土地并开始重建。国际良心史迹联盟——第六区博物馆是其成员——创造性的使用历史和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地点，来处理今天的人权问题和挑战。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多个地区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地方	普遍人权 流离失所群体

池塘里的涟漪

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后，救济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到来。美国等国的原住民社区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法庭和立法机构收回对故土的控制权。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白色地球土地回收项目决定，要用购买的方法收回奥吉布瓦族的土地和遗产。

“收回土地的工作刚开始时，我们使用各种法律机制作斗争。我们上法庭，但是法庭裁决对我们不利。我们去国会，但是我们从国会得到的协议很糟糕。我还到联合国作过证……我们试过了所有那些机制，最后我们决定，应该努力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收回我们的土地。

因此，我们创建了一个土地信托基金。我们从想要出售土地的卖家那里购买土地，人们也开始给我们捐赠土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二千七百英亩土地。我们种植了一些传统的玉米品种、木莓和草莓。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枫糖浆生产厂。

我的工作是通过一些具体实例做示范。我从事组织工作已有二十五年了，我学到的东西是，我们不必同错误作斗争，我们要用实例来证明什么是对的。人们会对错误的东西习以为常。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社区中，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拿不回自己的土地，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经济。

因此，我们必须逐渐改变这一态度，拿回我们的土地。例如，你得到了一块美洲原住民墓地，但有人在那上面放牛。你要去找对方谈，让他们用篱笆把墓地围上。这是一种处理小问题的方法。但就像扔进池塘里的小石子会激起大涟漪一样，从解决小问题着手，直到解决大问题。

处理小问题的同时，你还要睁眼看到大问题。你必须非常了解政治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要满足你的社区的需要，你可能还要与你从来没想过会跟他们合作的人建立联盟。

我们这些致力于美国原住民权利问题的组织已经为此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有许多分析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我们不仅与其他原住民建立了战略联盟，也与环保人士和医护人员建立了战略联盟。现在，我们正在试图围绕有机食品问题建立联盟。很幸运，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有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赢。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白色地球土地回收项目温诺娜·拉杜克

人权新战术	恢复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寻求救济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原住民权利

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

不同的社会对人权的定义会有所不同，这是由每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现实决定的。但是每个社会——无论其价值观如何——都需要有一个公共空间，让个人、政府机构、民间机构、各种群体和团体都能齐聚一堂，共同为集体福利承担责任，并且为可接受的行为和状态制定规则。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公民社会，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我们有机会建设各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和制度。在某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很强大，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存在，但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非常弱小，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个人被挤到社会边缘，然后，人们会退回并且隐藏到私人生活里，不再关心社会生活。没有这种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的国家，公民就不会有积极性，侵犯人权者就会任意妄为。

不过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他们致力于在地方、全国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保护人权。他们正在使用新的战术来巩固公共空间，建设强有力的人权文化。他们中有些人起点很小——从自己的学校或村庄开始，或者只关注单一问题。但是，当人们成功地实现了小目标之后，他们就有了勇气，敢于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这也是新战术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给人们提供向前再走一步所需要的工具。

——穆拉特·贝尔吉
赫尔辛基公民大会主席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倡导人权有许多种形式。无论是致力于减轻贫困、清洁环境还是透明政治，无论关注的重点是儿童、妇女还是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建设一个世界——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

过去几十年签署的国际协定、公约和条约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个人和社会还需要了解这些国际法文件规定了哪些权利——例如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迁徙自由的权利、不受酷刑对待的权利——还要知道如何去主张这些权利。

本书中的其他战术的重点，都是针对迫在眉睫的或者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问题。而本章的战术大多是一些长期的巩固人权文化对人权尊重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让新的群体和团体参与到人权工作中来。这不仅增加了我们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运动的合法性。这些方法是让适当的群体和团体走到一起。盟友们在一起能做的工作，要比每个个人所能做的工作多得多。这些方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技能。这些方法还帮助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权的存在和侵犯人权问题的广泛认识，并将侵犯人权问题视为一种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现象。

在这些战术中，有些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只关注某一项特定的权利，但是许多战术都有一个更广泛的目标：为建设机构和联盟做好准备，培养人们的认识 and 态度，使保护所有人权成为可能。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四节：

1. 建设支持者群体的战术：吸引新的个人和团体参加人权倡导工作。
2. 团结合作战术：发展新的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推动变革。
3. 能力建设战术：为促进人权而建立机构和培训系统。
4. 提高认识战术：传授人权知识。

建设支持者群体

人权信息针对的往往是已经对问题有所了解的人、已经表达过关注和支持的人。而接触、吸引新人参加人权工作，能够使行动更加有效。新人能带来新的能量、新的思想、新的资源和新的关系网。在某个人权问题上倡导者的人群越多样，运动适应变化的能力就越强，侵犯人权者就越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积极而多样的支持者群体能够使人权运动的适应性更强。

本节中的战术都是关于为了人权问题而建设新的支持者群体的。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接触人权问题的个人和群体（比如年轻人或地方立法者），或者在社区中有着权威地位的人（比如宗教领袖）——这些人在影响他人，吸引他人参与方面有着巨大的能量。

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利用流行文化吸引年轻人参与人权工作。](#)

讨论组、论坛和研讨会都是提高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吸引新人参与的常用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可能不够活泼，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波兰的一个组织使用了音乐和运动这两种有效的方法影响年轻人。

波兰“不再重来联盟”利用流行文化建设反对种族主义的青年通讯员联络网。该组织通过摇滚音乐会和足球比赛接触了大量的年轻人，使这些年轻人了解到有关的人权问题。然后，其中一些年轻人加入了一个通讯员联络网，这些通讯员要负责监督和报告自己家乡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团体的活动。

作为“音乐反对种族主义”摇滚运动的一部分，“不再重来联盟”举办音乐会，发行CD。这些音乐会和CD都是由波兰和国外的著名摇滚乐队演出的，内容是让听众了解波兰种族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听众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不再重来联盟”发起“把种族主义踢出球场”运动之前，波兰的足球场几乎完全被种族主义者占据。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不再重来联盟”出版了一份反种族主义球迷杂志《球场》，组织了许多场业余足球赛，并且提供比赛时使用的横幅和传单，向当地的反种族主义团体显示自己的存在。

“不再重来联盟”通过这些针对年轻人的活动，招募了一个由一百五十名志愿者组成的通讯员联络网，通讯员要定期报告自己社区中的种族主义仇外活动。“不再重来联盟”收集这些报告，并将它们发表在自己的月刊上，还将这些刊物散发给波兰媒体和国际媒体。通讯员联络网和出版物不但让年轻的球迷和摇滚音乐迷认识到种族主义的问题，也帮助波兰社会各界提高了对种族主义问题的认识。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不再重来联盟”利用流行文化吸引年轻人——一个同情我们的目标，但常常袖手旁观的支持者群体——参加人权工作，但它的工作并未止步于运动和音乐。一旦人们对参加志愿者工作表达了兴趣和承诺，该组织就会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活动的机会。这一战术可以用于在各种情况下克服普遍的冷漠，但是吸引年轻人参与的人权问题本身也很重要，必须让年轻人感到这些问题与自己有关，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像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波兰当局和主流的大众传媒常常否认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之类的社会问题的存在。”

——波兰“不再重来联盟”拉法尔·潘考斯基

人权新战术	建议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立支持者群体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国家	少数族裔

让人权成为本地的议题：**在当地采纳国际条约的原则，提倡人权标准，影响公共政策。**

地方立法者是一个潜力巨大但是很少参加人权斗争的支持者群体。在有些国家，地方官员不习惯从人权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工作，他们日常工作的核心是地方决策、颁发许可证和制定预算。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WILD）的人权项目与地方政府合作，目标是帮助地方官员看到他们自己在保护人权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也吸引当地的社区（议员们要对这些社区的选民负责）参加活动。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使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在地方上倡导人权。

1996年，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开始为使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法律采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原则的城市而进行倡导。他们与政府官员、公民，关注家庭暴力、贫困和健康问题的权利倡导团体合作，讨论与歧视有关的人权标准，并制定以社区为基础的可评估原则。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在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特点是鼓励社区成员记录支持《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誓言，并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誓言约束自己的行为——举行了公开听证会，该组织希望，这一听证会能够让社区成员和地方官员在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原则变成法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公约的原则在整个城市得到贯彻。

1997年秋天，在另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将收集到的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关的证词提交给政府官员。1998年4月，旧金山市通过了相关条例，条件要求该市有关部门从性别与人权的角度审议预算、就业政策和服务供给问题，还提供资金帮助有关部门落实该条例。

2003年，有关条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贯彻这一条例，旧金山市政府考察了公共工程部、少年和成人缓刑部和环境部，还调查了租务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该市各部门做出了大量改革，例如在市政府为妇女创造非传统的工作岗位，还给不安全的地区安装了更多的路灯。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现在正在扩大其影响范围，给全美各个城市的组织提供建议，让他们知道，城市可以如何采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原则。

地方上的人们可能从来没有从人权角度考虑过自己的经验，就像旧金山的地方官员可能也从来没有从履行人权义务的角度审视过自己的工作一样。但是，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帮助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和经验放入人权框架之中，并且促使他们参与到人权运动中来。

这一战术有助于一点一滴地改变民族心态，最终使人权标准得到实现和监督。其他致力于各种人权问题的团体也可以在地方寻找支持者并建立支持者群体，在地方上实现人权问题的重大变革。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妇女权利

与社会污名化做斗争：吸引宗教领袖作为行为榜样，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对待被污名化的群体。

在许多社区中，宗教领袖的地位受人崇敬，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向他们学习应该如何行为举止，应该遵守哪些道德标准。现在，藏传佛教的和尚和尼姑们正在为反对艾滋病感染者被污名化而斗争。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树立行为榜样，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可能会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之外的艾滋病感染者。

佛光之家项目培训和尚、尼姑和沙弥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实际帮助和精神帮助，并且与围绕疾病的误解和污名作斗争。目前，佛光之家项目已经发展到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不丹、越南、中国和蒙古，该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澳大利亚海外发展署、开放社会研究所缅甸项目的支持。

虽然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但人们仍然对这种疾病的传播缺乏了解，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仍然存在。

1997年，佛光之家项目由泰国的和尚创立，目的是动员佛教徒关心艾滋病感染者。该项目以佛教的道德和教义为核心，已经成了为佛教徒提供灵感、培训和技术援助的资源之一。佛光之家为佛教和其他宗教领袖安排研讨会、讨论会和参观艾滋病临终关怀医院的活动。在三到五天的培训中，参加者能够学到与预防教育、提高认识和社会管理技能、鼓励宽容与同情的方法有关的知识。参加者还一起讨论、评估自己社区存在的问题和与这些问题做斗争的方法。

然后，佛教领袖们会为应该如何对待受到感染的社区成员树立行为榜样，例如他们会食用由艾滋病感染者准备和提供的食物。这种简单的象征性行为对社区成员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挑战了人们对艾滋病传染的恐惧。和尚们还会上门拜访艾滋病感染者，引导他们进行冥想，教育年轻人有关疾病的知识，还会照顾艾滋孤儿。

和尚、尼姑们与佛光之家合作，通过树立行为榜样——接纳和尊重被排斥的人群——说服自己社区的成员促进和尊重人权。在亚洲，寺庙是村庄的精神中心，村民们把和尚、尼姑视为值得尊敬的老师、知己和践行纯洁的佛教生活方式的榜样。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这一点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许多人都会向宗教领袖寻求应该如何行为的指导。宗教领袖有能力吸引新人参加促进人权的事业。

现在，佛光之家跨越了宗教的界线，正在为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领袖举办研讨会和培训班。

怎样才能动员你们社区中德高望重的领袖们？

“我跟和尚们讲他们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作用。我倾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研究佛经。他们得出结论，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区的传统宗教领袖，和尚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巩固自己的社区，在抗击艾滋病中发挥积极作用。”

——泰国佛光之家劳里·蒙特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亚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国际	艾滋病

挨家挨户寻找盟友：利用提名运动，找到潜在的人权盟友。

家庭暴力问题影响了许多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活，但它通常被认为只是一个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南非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战术，让男人也参与制止家庭暴力的行动。

南非的“六分之五项目”中的日常英雄提名运动，让妇女们找到不虐待妇女的男人，然后动员邀这些男人成为妇女权利的倡导者。

南非是全世界所有和平时期的国家中，是暴力对待妇女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研究显示，六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曾经虐待过妇女。“六分之五项目”的对象，是针对其他五个不虐待妇女的男人。该项目为了找到那些不虐待妇女的男人，并吸引他们参加斗争，而发动了一个日常英雄提名运动。志愿者挨家挨户询问妇女，向她们了解那些不虐待妇女的好男人的信息。加上通过邮件发送的好男人提名，他们一共收到超过五万个回复，最后确定了南非“最佳”父亲、叔叔、兄弟、祖父和男性朋友。姓名和推荐表被发送到当地教堂，以扩大人们对运动的了解，提高运动的普及性。

被提名的好男人会被邀请参加讨论“社区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男人的年龄、经历、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会议的重点是发展合作，用非暴力的方法解决暴力对待妇女的问题。“六分之五项目”还召开研讨会，帮助男人了解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提倡两性互相尊重，共同找到积极的方法来解决家庭难题。许多参加者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水平和动员其他男人参与这一问题的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人是第一次就这些问题发言，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分之五项目”承认并且尊重当地正面的男性榜样，因此，他们能够联系上社区中有代表性的好男人，动员他们一起讨论家庭暴力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使男人们看到，家庭暴力是社区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常英雄提名运动帮助“六分之五项目”找到了潜在的盟友——关心某个特定的问题，但是没有积极参与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袖手旁观，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对自己有影响，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做些什么，或者因为社会传统让他们远离这些问题。

“六分之五项目”找到这些潜在的盟友之后，就会帮助其中某些人成为真正的盟友，这样影响就会扩大。这些真正的盟友得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和信息之后，就会和其他男人交谈，给妇女权利带来更多的盟友。

谁是你们的潜在盟友？你们可以使用哪些战术赢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妇女权利

通过短信建立联络网：**利用短信，建设人权行动的支持者群体。**

使用现代技术，让人们产生人权意识，吸收大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人权运动。

大赦国际荷兰分会使用短信技术吸引新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参加该组织，加深对反酷刑运动的认识。鼓励人们对紧急行动呼吁做出迅速反应。使用短信技术的直接结果是超过五百名新成员加入大赦国际荷兰分会，还有超过五千人对短信发送的紧急行动呼吁做出了反应。

这一战术从2001年开始，在大赦国际的反酷刑运动的框架内进行。在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某人免遭酷刑的时候，大赦国际荷兰分会通过短信给成千上万名参与者的手机发送抗议呼吁书。这些参与者——他们都曾自愿加入一个免费注册的短信网络——就会对呼吁书做出回应。几个小时之内，大赦国际就能收集到成千上万个抗议某一案例或酷刑威胁的签名。然后，该组织再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将这些抗议签名转发给有关当局。

有一个突尼斯人是某一次紧急行动的营救对象和受益人。大赦国际荷兰分会曾经在当地最受欢迎的周六晚间电视节目中发布了这次紧急行动的信息，这个节目有二百五十万观众。观众们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会将抗议呼吁书概括为一百六十个字的短信发出。收到短信的人们要对短信做出回应，只需给“4777”这个号码回复一个“是”字即可。一分钟之后，回应了短信的人就会收到另一条短信，对他们的回应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们已经有多少人发送了抗议短信。以后还会有短信告诉他们行动的结果，例如该人从监禁中获释。

虽然大赦国际很少声称自己对紧急行动营救对象处境的改善有直接贡献，但确实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案例取得了成功的结果：死刑被减轻、“失踪”的人重新出现、被拘禁者的下落被公开。酷刑的可能性因此减小，患有严重疾病的犯人得到治疗的可能性提高。

反酷刑运动还动员了许多年轻人——多达数千人——参加了大赦国际的紧急行动网络。

大赦国际的所有运动都具体而集中地指向世界上某个有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使用简单的行动，使大量的人都能参与，而且能够感觉到自己带来了变化。运动也教育了公众，还使全世界建立起对酷刑之类的侵犯人权问题的意识。短信战术用一种快速反应的方式帮助受害者，同时也扩大了大赦国际对新的支持者群体的影响力。

短信战术比其他宣传战术更能吸引大批年轻人加入大赦国际。年轻人使用手机的人数最多，频率最高，他们正是大赦国际想要影响的人。这些年轻成员给大赦国际的运动增添了力量。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改革警察部门：让警察在捍卫人权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巴西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综合培训方法，帮助警察改变自己与管辖社区的关系。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CAPEC）为巴西警察提供培训，帮助他们理解自己作为人权捍卫者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包含了各种课程，强调所有公民——包括警察自己的人权。通过这一培训，改善了警察与社区的关系，增加了公民参与。

巴西警方使用暴力和酷刑十分普遍。警察薪水很低，腐败猖獗，使这一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目标是创造“互动式安全”，即让警察与社区成员一道规划和组织公共安全工作，并且分担责任，让警务工作能够有效地应对公民的需要。

培训课程在六个月内举办了三次，每次两天。为使培训信息能够传播给更多人，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要求警察部门推荐一些接受培训后愿意对其他警察进行再培训的人。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成员会帮助这些警察准备对其他警察进行的再培训课程。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培训重点是告诉执法者，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他们的工作对个人和社区的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参加培训的警察会探讨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感觉，以及他们怎样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他们还会了解“互动式安全”的种种优点，包括使警务工作更加有效，使警察的工作环境更加安全。

培训师使用了许多故事、比喻和从参加培训的警察的经验中挑选出来的案例。培训重点在于教育而不是评判他们的行为。在对话过程中，警察会感到受到了赏识，还会学到如何在社区中改善人权。

到目前为止，巴西已有二十五个州采用了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培训，参加者超过三万人，主要是民事警察、军事警察、联邦警察、交通警察和城市保安。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合作。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战术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吸引了一个要为实施或者纵容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团体参加，还将他们转变成为人权倡导者。这一手段不仅为加强巴西的人权文化做出了贡献，还创造了一个让警察和社区能够共同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良好环境，这一战术直接减少了侵犯人权的现象。

“与社区互动时，警察可以成为教育者，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好榜样的年轻人或者儿童。

马卡帕市的一个街区中发生的一段插曲特别感人。这个街区因为有青少年帮派骚扰当地居民，因此被认为十分危险。该街区建立起‘互动式安全’警务制度之后，一名军警上尉被分派到该地区。他

发现了主要的帮派头目，并且发信息请他来谈话。后来，上尉作为一名关怀青少年的成年人，也作为一位教育者和优秀的角色榜样和他建立了关系。

这个男孩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位熟悉榜样。今天，这个男孩成为了警方的助手，在他的带领下，更多的青少年开始帮助警方，这个街区变得平静和安全了。这名上尉明白自己作为教育者及和平促进者的工作的重要性，他也明白，与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才能对社区产生影响。”

——巴西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罗萨·阿尔梅达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侵犯人权

团结合作

新的联盟——尤其是与意想不到的伙伴建立的联盟——能够加强人权倡导工作。让从前的对手站到你这边来，你不仅得到了一个盟友，而且还少了一个对手。打开从前关闭的沟通渠道，就能减少发生冲突和侵犯人权事件的可能性。与其他团体建立关系，你的事业就能吸引新的受众，获得更多的信任。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让你有更强大、更灵活的盟友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战略合作能够让倡导工作准备更充分，更有力量，更能代表所服务的社区。还能让倡导工作在主流社会、媒体和政府中获得合法性。如果人权倡导工作有着强大而多样的盟友，这一工作就更不容易受到攻击。

建立统一战线：在全国人权组织之间建立联盟，一致反对侵犯人权事件。

各个人权组织如果彼此合作，比每个团体只做自己的事更有助于改进一国的人权状况。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证明，即使非常大规模的合作也是可能的。

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是由六十三个主要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协调会组建于1985年，它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它能够把成员组织团结起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中既有城市组织也有农村组织，这种合作提高了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在全国和国际上的合法性。政府官员建设性的参与，提高了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的政治影响力。

1980年，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建立秘鲁军政权，之后“光辉道路”（秘鲁极左翼毛派反政府游击队——译者注）发动了武装革命，人权组织发出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暴行所淹没。1983-1984年间，有将近六千秘鲁人因政治暴力而失去生命。因此，创造一个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空间，让各个组织联合起来，对秘鲁至关重要。

国家人权协调会的成功和力量来自许多因素，其中包括：

1. 内部工作原则明确：在第一次会议上，协调会就决定，拒绝所有类型的暴力，独立于政党和政府，致力于民主建议，反对死刑。不支持这些原则的组织不能加入协调会。
2. 共识决策：决策程序要求所有组织必须意见一致。虽然国家人权协调会中的组织来自全国各个地区，规模各异，但在做出决策，组建全国理事会和大会选举时，所有团体的发言权一律平等。
3. 代表整个集体：内部的选举程序和各组织的代表达成一致的程序，让有关人员和组织在协调会内外有了合法性。例如，某人被组织成员推选参加国际会议时，参加会议的人不是代表某个特定的组织，而是代表国家人权协调会。
4. 就共同处理的重点问题达成一致：每隔两年，各成员组织就要举行一次全国大会，决定国家人权协调会要处理的重点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工作由执行秘书处在全国范围内集体处理。执行秘书处是一个常设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执行秘书处的秘书长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担任协调会的官方发言人，负责召集、组织和主持会议。国家人权协调会只在各成员组织关注的议题以外，针对人权侵害最严重的领域开展活动。

通过协调，国家人权协调会实际而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民众，比单一组织或临时联盟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例如，在秘鲁前总统藤森威胁要退出美洲人权法庭（该法庭位于哥斯达黎加圣荷西市，是1979年根据美洲三十五个国家签署的《美洲人权公约》而设立的。法庭主要有两个功能：为发生在成员国境内的人权侵害事件作出裁决；为成员国之间的冲突提供咨询。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古和委内瑞拉等十九个美洲国家承认其普遍管辖权。其他美洲国家承认就个别案件接受该法庭管辖。1999年，秘鲁总统藤森曾经宣布退出管辖，但是2001年新的秘鲁总统巴伦廷·帕尼亚瓜推翻了藤森的决定。——译者注）时，国家人权协调会在一周之内就动员了全国民众起来反对。所有成员组织都签署了一份反对总统提议的声明，还动员了另外四百多个组织一起行动。然后，每个组织都在各自的社区中采取了措施，争取民众公开发言反对藤森。正因为国家人权协调会有着明确的立场、信誉和组织结构，才使这一切有可能发生。国家人权协调会是在暴力和极端违反人权的氛围中成立的，它

证明了，在逆境中实施这种建立联盟的战术是可能的。然而，国家人权协调会真正取得成功，不仅因为在艰难时刻人们需要团结起来，而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稳定的架构、合作的原则以及反对暴力的明确立场，使该组织具备了合法性。国家人权协调会的这些原则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协调会的长期成功做出了贡献。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美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与公安部门公开对话：创建一个长期的公共论坛，让警察和普通公民能够一道解决人权方面的问题和其他影响警察与社区关系的问题。

在许多社会中，公安部门与民众之间都会发生摩擦。不良的沟通可能会导致侵犯人权事件，或者损害公共安全。尼日利亚的一个团体找到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架起沟通的桥梁。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创建了一个公共论坛，让民众和警察可以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表达公民对犯罪和警察行为的不满。

社区和警察可能会发现，他们之间陷入了不信任的循环。社区成员对警察的胡作非为、暴行和腐败不满，警察也认为社区成员充满敌意，不配合调查。

在尼日利亚，警察部门的中央集权式结构使问题雪上加霜：警方的议程和政策是应用于整个国家的，这导致警方的执法重点与当地社区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弥合这一差距的方法是给当地政府写信，提议在社区建立一个公共论坛。该团体在得到地方政府的答复及当地警察部门的合作和承诺之后，会举行一个伙伴关系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包括：对警察和社区成员进行解决冲突的培训，讨论警方如何回应当地民众的投诉，讨论如何在该地区实施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项目。这些研讨会让每个社区都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项目的发展。然后，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会雇佣两名社区成员，负责论坛协调工作，为期两年。两年期结束之后，社区就必须自己找到方法来维持项目的运转。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战术，给社区成员和警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分享各自关心的问题，克服官僚体制带来的障碍。使这一本来充满冲突的关系双方得到了互相尊重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冲突。假以时日，这一过程可能打破不信任的循环，奠定一个新基础，让警方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为民众服务，让民众认识到，他们可以帮助警方履行职责。这既能减少警察的暴力行为，也能减少平民的犯罪行为。这一项目已经在尼日利亚的六个地区的十四个行政区实施。

误解和不信任会造成许多群体之间的摩擦，因此，这一战术可以用于在其他经常发生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和改善关系，例如在少数民族之间，或者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要注意的问题是，围绕困难的问题，双方可能会出现情绪和激烈的争吵。主持人必须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还要准备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处理这些问题。一次性的会议可能没有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长期策略有效。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警察

了解你的盟友：发现盟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且保持合作关系。

有时，不信任不仅会出现在人权组织与外部机构之间，也可能出现在各个人权组织之间和某个人权组织内部。非洲大湖区（是东非大裂谷和大裂谷周围一系列湖泊的总称，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龙迪和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译者注）的一个团体正在致力于跨越国界和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来克服这一问题，以便合作监督该地区的人权状况，迅速传播侵犯人权事件的信息。

大湖区人权联盟（LDGL）是一个伞式组织（是由一些成员组织组成的协会。伞式组织与其成员组织的关系类似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他们共用一个名称，协会和成员组织共同协调活动或共享资料，但各成员组织独立核算和运行。——译者注），他们的目标是维护布隆迪、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卢旺达的二十七个成员组织之间的联盟关系。大湖区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导致的暴力，冲突不断。这种冲突也反映在该地区某些组织——甚至包括某些人权组织之中，他们的行动所代表的民众范围非常窄，而且以种族为基础。

大湖区人权联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对话程序，原则是以人道精神为基础，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们互动，争取成功地建立对话和分享信息。

在大湖区人权联盟内部出现分裂时，各组织的领导人会试图了解造成争端的潜在问题。然后他们标出潜在的盟友，找到最有可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对话途径。大湖区人权联盟根据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能力来选择参与对话的人。采取每一个行动时，大湖区人权联盟都会选择能够建立信任的语言和行动，使联盟成员相信，他们会受到尊重，他们关心的问题会得到处理。

成员组织着手解决待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大湖区人权联盟会确定问题所在，真实或可能的争议领域，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联盟关系。大湖区人权联盟还会确定参与对话的消极盟友、潜在盟友和积极盟友。

摩擦常常发生在联盟成员之间，尤其是在经常发生在冲突的地区开展工作的联盟成员之间。这需要有周密而敏感的对话系统来处理摩擦发出的信号，而不是责怪“坏人”的挑拨。联盟的工作比较困难的部分是，让发生摩擦的双方理解对方在该地区的行动。如果在联盟会议上没有达成共识，联盟就会向有关组织派出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成员组织代表，以便更好地理解各方的观点，并且提供支持。

通过这种持续的建立和维持关系的过程，联盟成功地创建了一个由整个地区的各种组织组成的强大的网络，并且赢得了各方的信任，共同监督侵犯人权的事件和迅速传播侵犯人权事件的信息。

建立一种机制，在召集成员或团体就有争议的问题举行对话之前详细标出盟友，是这一战术成功的关键。这一战术也可以用于例如人权组织分裂，相互竞争稀缺资源和注意力等情境中。联盟很脆弱，往往需要持续的对话和精心培育，才能继续团结一致和有效工作。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非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国际	普遍人权

长期密集地监督：与跨国公司签订合同，监督其供货厂家的劳动条件。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要求跨国公司改善人权，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将某一个公司的行为准则与其海外供货厂家的实际情况相对比。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收集、调查并且独立发表有关信息，揭露那些不尊重人权的企業。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对危地马拉的服装厂和农产品出口业的劳动条件进行了长期、密集、独立的监督，检验其遵守国际接受的劳工标准的情况。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总部位于危地马拉市，是一个独立的监督组织，1997年由公民社会团体成员组成，它既不是企业的管理顾问，也不是劳工权利的倡导者。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是，先与一家公司——如丽资克莱本公司——建立联系，然后与之达成协议，协议允许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全面接触和调查丽资克莱本公司承诺支付服务费的产品制造工厂。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会将调查结果独立发表在自己的网站上。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不是对某个产品制造工厂进行短期访问并撰写一次性报告，而是会监督该工厂至少六个月。它试图给产品制造工厂中的劳动关系“拍电影”，而不是“拍快照”。受过培训的监督员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每月访问工厂若干次，检查工厂的记录，要求管理层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解释厂方的政策，对生产设施进行“感官检验”，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以外与工人见面交谈，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还开通了一个热线电话，确保工人可以随时与监督员联

系。和工人的谈话用西班牙语进行，而且严格保密。跨国公司要保证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能够全面接触生产设施、人事档案、管理层和工人。

监督从“社会审计”开始——监督员以此来描述产品制造工厂中的劳动关系。例如检查是否有投诉程序，以及投诉程序是否管用。监督员会详尽记录工人的工作条件，包括是否存在工业化学品，以及如何处理工业化学品；是否有盥洗室，以及盥洗室的使用情况；是否有现场医疗保健设备，以及是否遵守了其他健康和安全标准。

然后，监督员会彻查工资记录，员工福利开支，生产奖金和加班费规定的遵守情况。他们会认真调查工人的投诉，并提交一份报告。如果投诉没有得到证实，报告中会说明投诉没有得到查明的情况。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监督和检验活动，导致各个公司都要求供货商证明它们全面遵守了劳工权利条款。例如，一位为丽资克莱本公司的供货商工作的未成年人投诉说，她的经理不允许她按照当地法律和丽资克莱本公司行为准则的要求早点下班去上课。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记录了这一违规情况之后，丽资克莱本公司对这个经理的做法进行了干预。随后，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审核了所有在该工厂工作的未成年人档案，要求供货商采取行动，确保所有打工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要求的父母同意书，确保工厂遵守未成年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三十五个小时的法律规定。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还报告说，在接触供货商时遇到过一些问题，有些供货商不愿实施他们与跨国公司谈判达成的整治方案。例如，盖普的一个供货商一度拒绝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监督员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步行穿过生产设施，或者在无人旁听的情况下与工人交谈。

虽然记录很难完美无缺，但是未能实施整治方案已经导致某些供货商的经理遭到申斥或者被解雇。被非法解雇的工人已经复职，超时加班已经减少，不当福利开支的问题已经改正。

世界各地所采取的监督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有对抗的方式，也有像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这样与公司合作的方式。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与国际企业建立合作而非敌对关系。它与这些企业谈判，要求企业为外界的独立监督项目提供资金，然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让监督工作比平常更进一步。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让工人可以投诉而不必害怕报复，以此鼓励工人参与改善自己工作条件的行动。它还雇用了当地的监督员，这些监督员比外国人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更能与工人建立联系。要使这一战术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得到工人和管理层的支持。战术成功之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从这种遵纪守法的文化中获益。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美洲	公民社会	企业	国际	劳工权利

跨边界自治：建立跨国机构，倡导和促进原住民的权利。

有时，潜在的盟友显而易见，但让他们团结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萨米族人居住在北极圈内的四个不同国家，他们正在建立管理机构，该机构的工作是进行跨国协调，倡导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跨国政策——尤其是倡导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放牧权。

萨米理事会建立于1956年，它建立的目的是跨越国界——国界把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萨米族人分散在不同国家——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以促进合作和保护原住民的权利。萨米理事会致力于为已经在这—地区——该地区目前横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生活了超过一万年的萨米族人倡导权利。

萨米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各个国家的全国性萨米族组织。理事会有十五个席位，根据四个国家的萨米族人口比例分配——萨米族人口总数超过十万人。萨米理事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创建萨米议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芬兰于1973年创建了萨米议会，挪威和瑞典分别于1987年和1993年创建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政治机构，负责就涉及萨米族人利益的事务与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磋商。萨米议会虽然不能通过自己的立法，但是可以在国民议会推动倡议。

萨米理事会的成功，有助于同时在地方、全国和国际层面上将萨米族人组织起来。萨米理事会成员利用这一跨国组织，建设起自己的支持者群体，影响当地的政策变革。与此同时，萨米理事会还能利用小型的地方组织为萨米族问题的跨国协调工作提供支持。萨米理事会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是起草《北欧萨米公约》。2002年，挪威、瑞典、芬兰各国政府和萨米议会同意建立一个由萨米族和非萨米族成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在2005年拿出《北欧萨米公约》草案。该公约将处理与民族自决和土地权利有关的基本问题，以及国家间合作、萨米议会、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驯鹿牧人在跨国境土地上放牧的权利——放牧驯鹿是萨米族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此外，萨米理事会对于在联合国建立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对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原住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做为各自国家的少数民族，各个萨米政治机构在决定对他们有影响的政策方面的权力较小。不同国家的萨米组织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倡导自己的权利时有了大得多的力量——这清楚地证明了团结合作的价值。这一战术也能在促进地方层面人权问题的同时，影响全国、区域和国际机构

的决定。类似的团结合作，也能在其他利益团体或人权问题跨越国界的合作中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出现。

“我们试图与本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不能牺牲我们的权利。我们与政府保持了不间断的对话。我们总是试图了解更多的情况，试图比与我们谈判的政府的代表更了解这些问题。”

——萨米理事会人权小组负责人马蒂亚斯·阿伦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国际	原主民权利

教育下一代：与政府合作，将人权教育纳入公立学校的课程。

公立学校是建设人权文化的重要机构。阿尔巴尼亚一个团体与政府合作，让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为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ACHR）与阿尔巴尼亚教育部合作，让人权教育进入该国所有公立学校的课程。该团体利用国家转型时期，与新的民主政府的官员协商，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项目，让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公民为充分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

1991年，经历了四十五年压抑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之后，阿尔巴尼亚面临着一个充满了民主的可能性的新世界。但是，遗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而且该国的制度基础并没有准备好来面对这些问题。要想充分利用新的民主制度，阿尔巴尼亚人需要有一个能够让公民学会批判性思维，并且鼓励政治参与的教育体系。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发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人权教育纳入该国所有公立学校的正式课程。该团体利用国家转型时期的政治开放，获得了阿尔巴尼亚教育与科学部的书面承诺，在公立学校实施人权教育。

然后，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开始项目试点：为一群教师骨干举办了大型培训课程；根据阿尔巴尼亚课堂的需要改写了国际人权教材；开发了各个年级的活动手册；创办了试点学校。试点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帮助培训所有其他教师，内容包括人权理论和人权历史，国际机制和人权方法，以及课堂内外的活动。

第一个十年结束时，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已经就许多主题开发了适合所有年龄组的课程教材，并且使用这些教材培训了成千上万名教师。他们在全国建立了四十二所试点学校，还在师范学院开设了人权教育培训课程。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对阿尔巴尼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设想，并且利用政治机会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当时政府正处于转型中，急于向国际社会证明它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1993年，阿尔巴尼亚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给政府提供了证明其承诺的方法，还帮助它履行公约的义务，因此获得了政府的合作。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还通过引入教育专家和国际支持获得了持续的动力。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团结合作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公民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能力建设

对人权实践者来说，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我们总是试图用更少的资源来做更多的事——人力、金钱和时间总是比我们真正需要的少。不过，有一项重要的资源是真正的可再生资源，那就是我们的技能。当我们拓展了我们自己和我们同事们的技能，或者把这些技能带进社区与新人分享之后，我们就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和更少的时间来做更多的事。本节中的能力建设战术有两种基本方法：为人权实践者提供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能；给表面上不从事人权工作的人提供促进人权所需要的技能。

促进专业化，促进人权： 建立专业组织，提供支持和培训，促进执法人员的专业化。

利比里亚的法官认为，需要提高执法队伍对人权的尊重。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LINLEA）的工作，是促进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提倡如下观点：根据执法道德规范和警察道德准则的规定，法官应该成为重要的人权保护者和促进者。这些规范和准则要求法官尊重所有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宪法权利。不幸的是，由于政治操纵，由于缺乏培训、纪律和领导能力，执法人员常常采取侵犯人权的不专业行动。建立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是为了在一个让执法人员愿意参与的环境中，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支持和帮助。

为了创建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一些受人尊敬的执法官员邀请公私执法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参与建立了组委会，组委会制订了组织条例，任命了理事会。司法部长参加了启动仪式，增加了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合法性。此后，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各种服务，包括有关警察与调查程序、人权和领导能力等问题的培训；帮助完善执法专业标准的机制，比如投诉程序。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还超越执法机构的范围，与各个社区和组织合作，改善利比里亚的人权状况。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成员通过支付会费的方式为组织做贡献。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五百多名执法官员参加的网络，他们代表了警察部门及其他执法机构将近20%的成员。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刑事司法研究与教育中心为二百二十三名高级执法官员提供了领导能力与人权方面的培训，它也为执法机构的培训师和课程专家举办了培训师培训研讨会，还为执法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举办了政策制定与发展研讨会。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主办了一个年度社交活动，加强联合会成员与其家人之间的联系；主办了一个公共论坛，加强执法部门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它还长期提供使执法人员受益的服务，包括颁发参加培训研讨会证书——这些证书帮助参加培训的执法人员得到升职；支持执法人员在执法机构内得到进一步深造；就免职和冤假错案等职业问题提供帮助和保护；在成员面临个人问题时——比如家庭成员死亡导致的财政困难——提供帮助。

许多组织都引进了执法官员培训项目。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使用的方法需要执法人员本人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这能为专业行为——表现出对人权尊重的行为——提供激励，而且这一激励来自职业之内，而不是职业之外。这些激励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能建立组织力量，为想要改变自己行为的执法人员提供支持，为改变违反职业规范者的行为提供手段。由于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组织自己就是执法官员，因此他们特别了解执法人员面临哪些难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非洲	政府	政府	全国	警察和军队侵犯人权

让农村地区也能使用法律系统：把地方领袖培训为调解人和人权资源。

在许多农村和省级地方，接触法律系统和争端解决服务的机会非常有限。乌干达的一个团体致力于通过培训当地民众的调解技能来改变这一状况。

提供新的技能、技术或组织系统的制度建设，常常让人权实践者从中获益。

乌干达人权倡议基金会（FHRI）为地方领袖提供培训，用司法系统以外的渠道为投诉的社区成员提供帮助。人权倡议基金会教给这些领袖如何告诉社区成员他们拥有的人权和宪法权利。还向他们传授法律技能，让他们能够提供调解、咨询和建议，使社区成员在遭遇侵犯人权事件时能够寻求救济，并且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乌干达许多农村地区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拥有宪法权利，也不知道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寻求司法救济，因为法律系统都在城市里，使用法律系统的成本很高，而且使用的语言和方法让他们感到很陌生。

人权倡议基金会选择的参与者要能证明自己具有领导能力，是社区中的重要人物，例如教师、商界领袖、社区长者和医务人员。培训课程长达一周，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程序、讨论问题的方法和创建沟通网络的方法。他们还向参与者提供监督、记录和报告侵犯人权事件的技能。有些培训的参与者后来社区中某些专门的群体——比如妇女、儿童、老人——的负责人。

在完成培训之后，这些参与者就成为了法律助理志愿者，他们在社区成立会议中心，用适合自己社区的方法处理问题。这鼓励了替代性的解决办法——比如咨询、调解，利用已存在的农村自治组织，为提出申诉的申请人提供书面建议——使人们避免了使用正式的司法系统带来的困难和成本。

现在，人权倡议基金会已经培训了超过一千名法律助理志愿者，还出版了《法律助理参考手册》（可从人权倡议基金会处获得）。

这一战术增加了实现正义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人权倡导工作都与在地民众无关的情况下，它创造了一种在地方上倡导人权的手段。（泰国同柏同葆基金会也把法律教育带到了农村地区，但它更关注教育那些需要法律服务的社区成员，而不是培训地方领袖提供这些服务。见第123页）人权倡议基金会的战术也可以用于其他人们无法选择诉诸法律，而社区领袖愿意并且能够承担这一职责的情况。

这一战术的成功在于接受培训的社区领袖是社区中真正的道德权威，而且能够在使用新的调解技能的同时利用自己的道德权威。同时，短期培训也需要有长期的跟踪和支持作为补充。

你们的社区需要这种类型的战术吗？可以接受培训实施这种战术的地方领袖是谁？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让人权倡导者更有效率：**利用信息专家和信息系统，帮助人权倡导者更有效地工作。**

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关注改进获得人权倡导信息的途径。该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信息系统，让一位信息专家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利用这一系统和专家的技能，其他的工作人员就能够更好、更有效地集中精力处理组织的核心任务。

在人权组织中建立图书馆或者档案部门，能够帮助工作人员促进信息的流动，管理保密档案，记录组织的历史，改进日常的运营。这一战术的关键因素包括一位有技术的图书管理员或者信息专家的参与，一个有组织的实体空间，一堆重要的资料，必要的软件和其他信息技术。

人权图书管理员能够给人权组织提供特殊的技能，包括技术知识、人权信息和档案方面的知识。图书管理员的职责是获得并评估与组织的核心任务有关的资料，安排如何在组织内部有效地使用和传播这些资料。后一项职责包括与工作人员密切合作，给信息分类和排序。

关键还要有足够的空间来管理这些资料，要给工作人员提供互动的场所。至少要有一个档案中心，其中包括给图书管理员办公用的空间、联网的计算机、书架和文件柜。核心藏书和其他资料取决于组织的任务和规模。总之，一个组织应该尽量拥有现在和将来的项目所需要的资料信息。

最后，一个有效的档案中心要有必要的软件（供编目、分类、索引等），还要有互联网连接，使图书管理员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重点是满足人权倡导者自身的信息需要，让他们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工作更有效率。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是一个相当大而且资金雄厚的组织。其他人权组织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也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的信息中心，用于收集、保存相关资料——即使信息中心只有一名兼职员工或者全心奉献的志愿者——为人权工作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图书管理员和信息专家要利用说服战术来说服有关组织及其成员：那些乍看起来对核心任务无关紧要的工作其实也很重要。

“我带回了人权中心的战术，我已经知道它很有用。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图书馆。我和行政人员一起，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申请文件。图书馆刚建起来的时候一片混乱，行政人员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让事情走上正轨。这是一项大工程，她整个夏天都在工作。这些工作帮了我很大的忙。”

——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种族法律援助组织贝亚·波德吉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多个地区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国际	普遍人权

播出侵犯人权事件：**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使用录像技术，曝光侵犯人权事件。**

人权实践者常常需要向广大民众传播自己的信息。在一个有着先进技术的时代，人权实践者越来越需要掌握录像和广播技术。

黑箱基金会活动范围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它的目标是通过培训少数民族罗姆人为当地电视频道制作节目，来改善民众对罗姆人的态度。黑箱基金会的工作方法是建立若干个制片小组，培训他们制作电视节目，让节目在电视台播出，还要让不同的小组之间交换节目。

从1997年开始，黑箱基金会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十二个地点培训了大约一百五十名罗姆人，以便向当地的电视观众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哪些问题对他们的社区有影响。黑箱基金会还征集了不同民族的人参与这一项目，把罗姆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编成五人一组的种族混合小组。黑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首先努力与小组成员建立信任关系，也让小组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他们在一起讨论每个人的观点，处理项目中出现的敏感问题。然后各个小组学习电视制作技术，还要就少数民族问题咨询专家的意见。

在培训的最后三天，黑箱基金提供摄影机、灯光、麦克风和其他必要的设备，让各小组制作他们的第一部电视节目。然后，各小组每月要为当地的电视台制作节目，他们使用自己的资源独立工作，基金会负责协调，让他们的节目能获得固定的播出时间。在培训之后的六个月里，黑箱基金会会对各小组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小组也要互相交换他们制作的节目。

制片小组的成果各不相同。许多小组仍然定期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节目，另一些小组现在则利用他们的技术和设备记录自己组织的活动。

由于这一方法取得了成功，黑箱基金会为有兴趣成为电视专业人士的罗姆族学生开办了一所一年制的制片学校。

黑箱基金会的培训项目帮助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们看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减少了歧视和偏见。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罗姆人常常与多数族群隔离，他们的问题被隐藏了起来，他们得不到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黑箱基金会的培训项目不仅给参与者提供了讲述罗姆人的故事所需要的技，还帮助他们把这些故事在多数族群的成员可以收看的媒体上播出。这帮助创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可以合作，共同促进所有人的权利。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少数族裔权利

把酷刑记录下来：[创建专家联络网，把酷刑记录下来，并且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肯尼亚的一个团体与医生和律师合作，曝光由执法机构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高人们对酷刑问题的认识。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IMLU）是一个为受害者及其亲属提供服务的医生和律师组成的联络网。他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对执法机构控制下的非自然死亡案件进行独立尸检，记录疑似酷刑的案件，向囚犯和酷刑幸存者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组织联络网的初步工作，是游说组建一个名为肯尼亚医学会人权常务委员会的专业委员会，和一个支持结束酷刑的律师团体。医学会人权常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持续举办了很多场研讨会，以提高医务人员和律师处理酷刑问题的能力。这些研讨会在全国各处举办，主题包括人权的定义，与监狱部门建立关系，对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人权法与侵犯人权问题的教育。

为了接触酷刑受害者及其亲属，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与全肯尼亚的各种宗教机构、律师、医生和NGO建立了工作关系。经介绍前来的客户可以要求对其死亡的家庭成员进行尸检，尸检结果会按照医学和法律指南仔细记录下来。

发现酷刑的证据之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鼓励客户寻求法律救济。对于那些支付不起法律费用的客户，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推荐他们去一个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律师和NGO联络网，该联络网的目标是追踪公益案件，会帮助酷刑受审者提起诉讼，要求法律处罚酷刑实施者。

由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持续努力曝光肯尼亚的酷刑案件，有若干案件被起诉到法庭，导致社会对囚犯的福利和待遇的关注有所增加。监狱当局也表示，他们有意愿改善监狱的条件，减少使用体罚或酷刑。2002年底，肯尼亚新政府上台之后，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开始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合作，以改进人权工作。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通过整合一个专业人士组成的联络网，培训其成员把酷刑案件记录下来，提高了肯尼亚人对酷刑的认识，加大了当局防止酷刑的压力。联络网利用一些医生和律师希望使用自己的知识促进人权的想法，增强了全国对结束酷刑问题的支持。

然而，这一工作也遇到一些困难：对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的服务需求常常超过他们向受害者提供支持的财政能力；联络网的律师多数居住在首都内罗毕，使农村地区的受害者得到回应的速度往

往比较慢；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记录尸检结果时，遇到过警察的干扰和恐吓。出现这种情况时，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与其他NGO一起发表谴责干扰的公开声明，让公众了解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对警察提起法律诉讼。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非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全国	酷刑

让人权事件广为人知：[让NGO在人权倡导工作中使用录像技术。](#)

“目击者”组织（WITNESS）帮助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将录像技术作为一种人权工作的倡导工具。“目击者”及其合作伙伴制作的录像，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人权侵害事件，这些录像可以用于：

作为法律诉讼的证据；

证实侵犯人权的指控；

作为提交给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书面报告的补充，以平衡关于该国人权状况的官方报告；

鼓励草根组织的教育和动员工作；

为新闻广播提供信息；

通过互联网促进人权；

制作纪录片，在全世界的电视台播放。

“目击者”成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该组织就各种问题与五十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个团体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问题从中美洲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清洗”，塞拉利昂内战期间对妇女和女童的性虐待，一直到美国的血汗工厂和缅甸的无家可归者的困境。

“目击者”选择那些想要进行长期的能力建设，以便有效使用录像技术的合作伙伴，还选择那些录像能够打破平衡、决定成败的特殊运动。与某一个团体建立合作伙伴之后，“目击者”就会给该团体提供录像设备和培训，举行关于录像技术的研讨会，对在人权工作中使用录像技术的人进行强化教学，对制作的影片进行系统性评估，提供后期制作辅助，对制作的影片提供建设性意见，使影片制作得更有力量。

然后，“目击者”及其合作伙伴会围绕所收集到的录像发起宣传运动。运动有许多组成部分，包括广播和发行平台，与其他组织和网络合作，有针对性地向关键受众放映，为观众提供采取行动的机会。运动可能很有针对性，例如利用录像来影响关键决策者。运动也可能很广泛，例如围绕特定的问题动员年轻人。录像会保存在“目击者”的档案库中，该档案库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权信息资料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

“目击者”承认，使用摄影机既有可能保护人权倡导者，也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之中，这要取决于当地的环境。“目击者”利用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经验，帮助其他人制定安全而切合实际的策略。“目击者”强调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性，还会明确地解释在摄影机前说话的风险和收益。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多地区	公民社会	政府 企业 公民社会 社会	国际	普遍人权

影像证据能够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目击者”的合作伙伴收集的证词和制作的强有力的录像被用于许多方面。机智而战略性地使用录像宣传的一个例子，是“目击者”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MDRI）合作，记录了巴拉圭精神病院中的恶劣条件。

“胡里奥和豪尔赫是两名青春期的男孩，他们和其他四百五十八个人一起被关在精神病院医院——赤身裸体地被关在空荡荡、没有浴室的单间里。房间散发出屎尿的恶臭，墙上涂抹着粪便。这些男孩每隔一天有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在丢满垃圾和碎玻璃的户外围栏中活动。

2003年12月，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向美洲国家组织（OAS）下属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ACHR）提交了申请，要求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为这些男孩和医院中其他人的权利进行干涉。

除了案情摘要之外，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还提交了与‘目击者’一起拍摄和编辑的录像，其结构按照几份对巴拉圭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所阐述的条款来编排。这些人权文件指出，病人有法定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得到人道待遇。录像使用的影像能够清楚地证明，巴拉圭未能履行其人权义务，影片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了巴拉圭的人权问题。

这导致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首次批准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精神病院中的病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一先例现在也被用于美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然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和‘目击者’在自己的网站上连续播放录像，以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还和CNN的西班牙语部合作进行了后续报道。巴拉圭总统和卫生部长视察了医院，随后医院院长被解雇。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问题。

向公众曝光这一问题之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和‘目击者’呼吁关注公立心理健康机构的恶劣条件，为改革征得了进一步的支持。媒体在事件展开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帮助促进了重大的变革。

虽然在本书出版时，胡里奥和豪尔赫的病房还在翻修，但是他们已经不再被关在很小的单间里了，现在他们可以得到衣服，也可以洗淋浴，还有二十四小时的护理。巴拉圭卫生部正在与泛美卫生组织（PAHO）合作，促进精神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目击者’和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的合作，带来了制度变革的结果。但是，要确保人权倡导者能够利用录像带来的势头跟踪案件的进展，以保证精神残障人士能够得到成功融入社会所需要的支持和服务，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目击者’的合作伙伴成功地利用了录像。例如，许多人通过收集证词，讲述直接受到人权侵害事件影响者的故事，来制作强有力的影片，这种做法在人权运动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多个地区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精神残障人士权利

政府履行承诺了吗？创建志愿监督员联络网，说服地方和全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

斯洛伐克的一个团体正在监督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的情况，并且用他们发现的问题说服政府履行这些承诺。

斯洛伐克的人权倡导者联盟（LHRA）在少数民族罗姆人中组建了一个人权监督员网络，以确保国际人权条约在地方一级得到执行。为了成为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批准了许多与人权有关的条约。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宪法也规定，议会已经批准并通过成为法律的国际人权条约的地位高于国内法。尽管如此，斯洛伐克的人权纪录仍然常常遭到批评。

人权倡导者联盟的监督手段，弥合了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地与制定预防或制止侵犯人权事件的政策、法律、条约之间的差异。有关侵犯人权事件和预防或制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法律和政策的讨论，通常只发生在高层的政治和外交论坛上。人权倡导者联盟招募了来自权利被剥夺的罗姆人

中的四十八名志愿者担任人权监督员。监督员要学习国际法和国内法律规定了他们有哪些权利——他们通常是第一次学习这些内容——然后与人权倡导者联盟合作，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市政厅、警察局、学校和社区落实这些权利。地方监督员提供的信息，被用于报告国际法和国内法律在斯洛伐克造成的真实、实际的影响。

招募罗姆人监督员的工作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的。人权倡导者联盟先培训他们有哪些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和国内的法律文件，有哪些负责实施这些法律的政府机构，然后安排有警察、市长、社区领袖等人参加的情况介绍会，增加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人权监督员网络分布在斯洛伐克的八个地区，这些地区协调人要与人权倡导者联盟总部合作招募和培训人权监督员。

人权监督员准备好从事自己的工作之后，人权倡导者联盟就会发给他们一张身份证明卡，还会给他们提供向地方当局出示的介绍信。当怀疑某个社区有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人权监督员就会前往该社区，向受害者和有关当局收集信息。需要监督的问题包括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教育、医疗保健、政治参与、种族暴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机会。

人权倡导者联盟的全国办公室会把所有人权监督员的工作综合成一份定期报告，还出版了自己的期刊。这种监督战术的结果是，许多发生在地方一级的侵犯人权事件被曝光，更多的侵犯人权受害者开始上门投诉。随着时间的推移，斯洛伐克政府也颁布并实施政策，改善教育、住房和工作方面的歧视问题。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人权倡导者联盟使用的战术，其独特之处在于把压力和促进结合在一起。帮助罗姆人的人权监督员了解自己的权利，并有能力采取行动。斯洛伐克政府正在争取加入欧盟，这也为提高人权监督员工作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这一战术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把国际法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战术在那些已经签署了人权条约，而且关心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纪录的国家，有对侵犯人权事件施加影响的力量。

“我们的战术让斯洛伐克政府很不舒服，有时我们还会遭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迫害。不过我们的目标——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已经逐步得到实现。政府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时还是我们事业的合作伙伴。”

——斯洛伐克人权倡导者联盟哥伦布·伊哥堡纽西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普遍人权

让儿童倡导自己的权利：**让儿童获得信息、技能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倡导自己的权利。**

有了技能，得到了适当的信息之后，儿童也能捍卫和倡导自己的权利。

印度的“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CWC）让儿童能够组建工会和自治委员会之类的正式组织来倡导自己的权利。通过这一工作，“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加强了儿童——尤其是工作中的儿童和本来可能会被边缘化的儿童——对与自己有关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参与。从1980年起，“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就积极开展这一事业。目前，该组织在卡纳塔克邦的五个地区开展工作。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向工作中的儿童赋权的初步成果，是创立了“比马僧伽”——一个属于工作中的儿童，由工作中的儿童管理，为工作中的儿童服务的工会。“比马僧伽”在卡纳塔克邦有一万三千名儿童会员，是“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重要的合作伙伴——“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的工作，是让儿童能够在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比马僧伽”自1990年成立以来，就是工作中的儿童权利的有力倡导者，该组织也同样关心提高工作中的儿童的父母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比马僧伽”也帮助全国和地方其他工作中的儿童组建自己的工会，还在全国和国际的“工作中的儿童运动”中发挥作用。

既然儿童们能够对与自己有关的项目和政策产生影响，他们也希望在社会管理工作中有正式的地位。因此，儿童们建立了后来被称为马卡拉或者“儿童政府”的组织，该组织由社区中的儿童选举产生，组织结构由儿童设计，作用和领导风格由儿童决定。“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设计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通过一个由成人和儿童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该小组的负责人就是该地区的行政长官——把“儿童政府”正式纳入村政府。“儿童政府”的选举由正式的政府行政机关举行，它的秘书由专项工作小组中的成人担任。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教给儿童们研究、记录、沟通、协商和倡导的技能。儿童们使用戏剧、木偶戏、歌曲、出版物、墙报、录音和录像工具来宣传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他们会说明自己的当务之急，用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还会倡导改革。为了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儿童们不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但他们会积极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

通过有组织地参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儿童们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他们向国家问责，参与公共事务，也帮助其他边缘群体——比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处境。

现在，成千上万名儿童正在参与管理自己的村庄，有着传统封建和家长制观念的成年人也变成了儿童权利倡导者。成年人认为，让孩子们积极、平等的参与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看到，这种参与已经给整个社区带来了好处。（选自南达拿·雷迪、卡维塔·拉特纳《儿童参与之旅》一书，2002年出版）

在处理地方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包括水资源和燃料问题、住房问题、老人和残疾人津贴问题、剥削童工问题、药物滥用问题、童婚问题——儿童组织都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他们也对邦、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儿童政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的工作基础，是向工作中的儿童赋权，让他们筑起自己的第一道权利防线，并且以知情的方式参与所有与自己有关的决策。“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已经证明，这些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糟糕的生活条件，可以通过教育、赋权和与成人建立伙伴关系做出改善。“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与地方政府、社区和工作中的儿童通力合作，实施各种全面而可持续的、切实可行而适当的解决方案。其结果是，所有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这只有在儿童们的参与下才有可能实现。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能力建设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儿童权利

提高认识

让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认识到人权问题，是建设一个热爱人权的社区的第一步。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就会接受、纵容或者忽视政府、统治阶级和其他当权者侵犯人权的行为。本节中的战术，既能够提高对于人权概念的认识，也能够提高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例如如何将人权应用于个人或者社区。

在我们所描述的多数情境中，人权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让人们看到人权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世隔绝的社区中的人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有权利，他们可能不知道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律，也可能不认为这些法律也适用于自己。而发达国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人权问题”表达的概念，只属于遥远、贫穷的国家。

农村法律教育：告诉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有哪些权利，让他们在律师的帮助下捍卫这些权利。

地理、文化或风俗方面与世隔绝的社区缺乏知识，可能是那里的人们不能充分行使权利的最大障碍。泰国的一个团体把社区教育——通过小品和研讨会进行——和接触法律系统结合起来，让人们不仅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能够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

泰国的同柏同葆基金会（TTF）除了给农村居民带去关于基本人权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法律的培训之外，还带去了免费的法律援助。1990年代，泰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口不仅经济贫穷，而且对泰国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毫无认识。这使那里的人们很容易遭到腐败官员和高利贷者的剥削。

同柏同葆基金会的法律下乡培训，针对的是教师、学生、社区领袖、贫困农民和妇女。同柏同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志愿者通常是应那些与政府官员发生矛盾的村民的请求，去农村举办周末培训班。在两天的培训中，主要进行宪法、人权法、婚姻法、贷款与抵押法、劳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和讨论，用根据法庭案例改编的戏剧作为讲座和讨论的补充。

培训完成之后，参与者会收到律师附有照片、姓名和签字的名片。每张卡片背面都列举了嫌疑犯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知道对自己指控内容的权利，获得保释的权利。村里还会成立一个由五到七人组成的地方法律助理委员会，以确保人权标准得到遵守，并筹备组织下一次培训课程。

同柏同葆基金会讲授的不是遥远、抽象的概念，而是村民们能够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实用信息和技能。不要低估送给每个参与者的律师名片的力量，它让村民们知道，在人权遭到侵犯时有人可以求助，这不仅在心理上有支持的作用，还能让别人不敢随便侵犯他们的权利。

这一战术在全世界的农村地区和与世隔绝的地区都很有价值，那些地方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司法系统。这一战术让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能够把法律诉讼作为寻求正义的手段。乌干达的一个类似的战术，也告诉偏远地区的人们自己拥有的权利，而且还提供了调解的途径（第112页）。

还有哪些“权力的象征”（如本例中的名片）能够帮助人们行使本来无法行使的权利？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用戏剧打破沉默：利用戏剧打破对敏感的人权问题的沉默，并提供人权教育。

塞内加尔的一个团体向因为文化规范而遭到孤立的社会阶层提供权利保护的信息。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RADI）向妇女提供有关家庭暴力的教育，使用的方法是戏剧小品和非正式讨论——这些讨论由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法律助理进行引导，讨论的内容是有哪些法律资源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使用戏剧的形式，是为了在塞内加尔打破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沉默。

在塞内加尔，家庭暴力——尤其是带有性因素的家庭暴力——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很少会向当局报告此类案件。塞内加尔人口中有95%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认为宗教教义允许某些形式的家庭暴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因为文盲很普遍，也因为戏剧表现形式正在塞内加尔复兴，所以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选择以戏剧的手段影响受众，提高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并且让人们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带去了著名的演员，从观众中挑选妇女和演员一起表演十分钟有关家庭暴力的即兴小品。参加表演的妇女和观众们的反应显示，她们很熟悉小品中出现的情景。这些小品的结局都是悬而未决的，然后让法律助理主持讨论，面对家庭暴力可以做出哪些选择，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法律助理也要提供可用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资源。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这一战术，利用了两种重要的文化资源：第一，在塞内加尔，戏剧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第二，这些节目是围绕恩伯泰斯——即妇女们传统的非正式聚会——来设计的。通常情况下，这各方式可以确保她们充分进行团体讨论。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报告说，参加戏剧和讨论会的妇女不仅学到了有关权利的知识，她们大多数还会把这些知识传播给朋友和家庭成员。

许多团体都曾利用戏剧和表演来促进人权，不过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使用的形式是把法律和戏剧结合起来。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成功地影响了受众的部分原因，是它利用了恩伯泰斯这一现有的社会结构。戏剧也激发了妇女的参与，还给参与者提供了一层保护：即促进了交流，又不必讨论她们的隐私。

你们社会中有哪些文化传统给某一特定的人权问题的讨论制造了障碍？可以利用哪些文化传统克服障碍、打破沉默？

“谴责家庭暴力的妇女人数正在上升。在某些案例中，妇女已经开始逃离家庭，并且试图解除婚姻关系。”

——塞内加尔共和国副检察官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妇女权利

利用传统：利用艺术，把人权与当地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人权可能会被视为某种来自外界或者上层强加的东西。在阿拉伯世界开展工作的一个地区人权组织促进人权的方法是，证明人权也是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CIHRS）运用文学艺术的方法证明，人权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文化所颂扬的。虽然许多阿拉伯国家支持《世界人权宣言》（UDHR），但也有一些阿拉伯国家把《世界人权宣言》和更加普遍的人权保护视为西方概念。

开罗人权研究所运用各种方法证明，人权一直植根于伊斯兰的民间传说、文学和电影中。例如，他们邀请艺术家参加每月一次的电影放映会，在这些放映会上，特邀发言人会以人权为背景讨论这些电影。电影导演和评论家也常常会出席这些放映会。这种人权电影活动还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出现。

开罗人权研究所还出版了一系列题为《艺术与文学中的人权》手册，这些手册强调文学艺术在传播人权概念中的作用。到本书截稿为止，他们已经出版了十本手册。他们也鼓励艺术家用有吸引力的形式来表现他们与人权价值观有关的经验。

开罗人权研究所通过举办电影活动和出版系列手册，建立了一个对促进人权感兴趣的艺术家联络网，他们鼓励艺术家创作在当代社会中促进人权的项目。有时，开罗人权研究所也会选择一些特定的题目或者议题，确定艺术方法可以如何发挥作用，然后去找那些曾经通过各种艺术媒介成功地创作过类似主题的联络网成员进行创作。

开罗人权研究所通过这些途径，使人们认识到埃及和阿拉伯文化与人权的相关性。

为了奠定一个普遍支持人权运动的社会基础，开罗人权研究所采用电影、艺术、文学等手段，帮助阿拉伯人理解人权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联系，驳斥人权是西方舶来品的观念。

这一方法是长期的，不可能马上给社会带来变革，而且，它最有可能吸引的是那些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如果这一方法能够从传统文化——那些多数人都觉得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形式，比如民族史诗和童话——中找到渊源，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群。

当地的文化传统、神话和文学也能作为让人们理解人权原则的教育工具。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皆姐妹研究所（SIGI）使用非正式的教育模式，用当地的文化符号帮助穆斯林妇女认同普遍人权的概念。全球皆姐妹研究所制作了一系列手册，可以用于各种妇女聚会的场合——无论是公开聚会还是私下聚会。这些手册使用的是与妇女们日常生活有关的表达方式，鼓励她们讨论人权的概念。

“每一种文化都颂扬正义、尊严、自由、平等的价值。文学艺术能够帮助提升这种人权价值。我们让人们认识人权概念的时候，触动的不仅是他们的头脑，还有他们的心灵。”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巴伊·埃尔·迪恩·哈山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国际	普遍人权

理解社会正义的新方法：对组织进行培训，把社会正义问题纳入人权工作的背景之中，给倡导者提供一系列新的工具和获得新盟友的机会。

发达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人权问题只与发展中国家有关，人权的概念和追求被认为是遥远的外国的事情。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骄傲自满。美国的一个团体正在与这种骄傲自满作斗争。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NCHRE）为美国的各个组织提供培训，向它们讲授如何把社会正义问题表达为人权问题。虽然美国有许多组织在从事社会正义方面的工作，但很少有组织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人权工作。

1997年，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人权缺乏了解，超过90%的美国人不知道《世界人权宣言》的存在。为此，全国人权教育中心为草根社会正义组织制作了一个人权教育课程。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还通过举行大会、会议和社区活动，发放了将近五十万份《世界人权宣言》。

在培训课程中，全国人权教育中心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说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侵犯人权者或受害者。全国人权教育中心也培训保护人权的方法，尤其是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技术层面的方法。然后，培训师会和参加者合作，开发用于自己社区的人权行动计划。

培训课程的参加者会把培训时学到的思想和技能带回自己的组织，这使得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的工作影响范围成倍增加。全国人权教育中心自成立之后，已经就人权问题培训了超过一万六千名社会正义倡导者。许多接受过全国人权教育中心培训的团体，已经使用人权框架给自己的社区带来了积极的变革。例如，佐治亚公民反饥饿联合会就使用人权的观点，成功地说服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三十多年来第一个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正在同政府和民众中的一种普遍的观念做斗争，这种观念认为，美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与美国无关。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给正在与饥饿、贫困和无家可归等人权问题作斗争的团体提供了一种新战术。当这些团体开始用这一新战术来考虑自己的工作，他们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盟友，吸引新人参加自己的事业。

“美国有许多难题，例如医疗保健、福利改革、种族歧视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宪法没有给公民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转向全球人权框架，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人权问题，以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对话的性质。”

——美国全国人权教育中心洛雷塔·罗斯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美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绘制地图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使用视觉图像提高公众的认识，为政策变革施加压力。

无论你想要影响的受众是谁，把你正在讲的问题用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极大的价值。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有效地使用了绘制地图的方式，说明黎巴嫩海岸的环境危害。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绘制了该国海岸附近环境违法行为的地图，以便就有毒工业废料的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并且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制定政策解决相关问题。

该团体让公众对黎巴嫩海岸线附近的环境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工作的方法是每周乘充气艇去一个新地点，集中关注海岸线附近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和有毒工业废料使用的地区。该团体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把测试结果制成地图，以此来强调各个地点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公众通过电视、报纸和该团体的网站跟踪绿色和平艇的进展，甚至沿着滩头跟踪测试时制作成地图的那些地方。绿色和平艇每周的进展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提供了极大的悬念，人们想知道，绿色和平艇在下一个地点会发现什么？活动结束后，地图本身就成为了说明海岸附近有毒地点和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证据。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还使用了其他几种战术与绘图项目相结合。他们游说海岸附近地区的政治家、政府机构、居民和企业推动变革；他们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与媒体保持沟通，并且确保媒体报道的时机能够让公众保持兴趣；他们还制作了说明污染物长期效果的广播节目、情况简报、大幅移动海报和电视动画广告，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公众意识的提高，致使444号法律——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其中包括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权利。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把干巴巴的技术信息变成了引人入胜的图像——让公众能够理解，吸引公众产生兴趣，同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环境违法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使得受其影响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侵犯人权事件的存在。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通过揭露这些事件，动员了一个新的支持者群体来反对这些侵犯人权事件。这一战术取得成功——提高了认识，通过了新的法律——的关键，是用强有力的宣传和媒体报道突出绘图的效果，同时，该团体还为具体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游说。

人们也在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图说明其他的人权问题——比如拐卖妇女进行性交易——并且与之做斗争。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于展示曾经发生过酷刑的警察辖区；通过描述一个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说明贫困的普遍性；通过标示水井、医院或学校的位置，描述重要的公共服务的使用情况（或缺乏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它。

一图胜千言。怎样才能用视觉图像来促进你们的事业？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亚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环境

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利用古迹传达的情感力量和个人故事，提高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

讲故事有助于把看起来干巴巴或者十分遥远的人权问题变得生动鲜活。纽约的移民公寓博物馆使用过去的故事，让人们讨论并且认识到现在的劳工权利问题。

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重建了1897年的公寓楼和制衣店，还让原本矛盾重重的制衣业各机构的代表坐到一起，讨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来解决今天的血汗工厂问题，以及由谁来做的问题。

移民公寓博物馆重建了果园街97号公寓——1863-1935年期间，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七千多移民居住在这里——用这一方法讲述移民们在美国奋斗的故事。1897年，来自普伦斯克（今天在波兰境内）

的移民哈里斯·莱文和珍妮·莱文在自己的公寓开了一家制衣店，“血汗工厂”一词最初就是用来描述这家制衣店的。今天，美国有超过四百家制衣店，雇用了将近一万五千名移民工人。美国劳工部把其中将近四分之三归类为“血汗工厂”。不过，人们仍在激烈地讨论什么是“血汗工厂”，应该做些什么来处理侵犯劳工权利的问题，以及谁为侵犯劳工权利负责的问题。

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把莱文的家变成了一个中心，制衣业从业者可以在这里交换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2002年，移民公寓博物馆举办第一次活动，邀请了许多人参加，其中包括人权观察组织的代表，“团结！”（制衣工人工会）的代表，李维斯和艾琳·费雪（服装品牌）的代表，布鲁克林区厂商联合会的代表等等。制衣业中这些通常被认为相互对立的机构的领导者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倾听移民公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讲述当年这个移民家庭是如何在一个三百二十五平方英尺的空间里睡觉、吃饭、干活，制作了成百上千件衣服的故事。

为了配合这个活动，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还举行了一个为期一天的高峰会议，回顾制衣业的过去，从中获得新视角。会议还提出了防止将来出现类似“血汗工厂”的新思路。2002年的会议之后，博物馆还与数十个制衣产业群举行了类似的对话。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 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的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推动者，还要经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人们可以跳出个人的歧见，转向更大的公众问题。人们还会倾听甚至欣赏相反的观点，有机会在团体内部和大型讨论会中交换看法。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不会互相见面，但是他们同意在博物馆中见面交谈。我们会强调，我们解释历史时有许多个角度，这样可以激发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

参加者告诉我们，在移民公寓博物馆见面让他们感到放松，但是如果其他环境中见面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正如一位参加者所说：“这里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检讨所有这些问题。”

——美国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利兹·谢甫琴科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提高认识	美洲	公民社会	企业 社会	地方	劳工权利

工具和资源

本书中提到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选择战术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风险，他们使用这些战术是作为他们更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而这个更大的战略又是为了实现一个明确的总目标。虽然某些战术——或者某些战术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对你们很有用，但关键是，你们首先要评估自己的情况：你们的环境、目标、资源和盟友。

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一部分包含的工具，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一任务。

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

使用本节的内容确定你们的目标和对象，集体讨论你们可能使用的战略和战术。用你们选择的战略和战术开启组织内的对话和交流，或者梳理你们的思想。

分享战术：用案例说明战术

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告诉其他人，如何使用你认为好用的战术。人权新战术项目关键的一点是创建一个让人权实践者能够彼此分享战术的联络网。我们鼓励你们也建立这样的联络网。

使你的战术适合本地实际

使用本节中的问题来确定某一特定的战术，或者某一战术的某一方面是否能够推进你们的目标。要记住，不是每一个战术都适合所有的场合。

自我照顾：照顾你最有价值的资源

检查自己的资产和负债的时候，要记住你们最有价值的资源：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独自或者与你的同事一道思考照顾自己和互相照顾的方法。

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

谋无术则事难成，术无谋则必败。

——孙子（没找到孙子这句话的原文——译者注）

两千多年前，孙子就告诉我们，战略如果没有战术就是纸上谈兵，战术如果没有战略则必改无疑。今天，我们可以从《孙子兵法》中的战略分析的三个方面（了解自己、了解对手、了解形势）学习很多东西。

了解自己

你们必须现实地看待自己的优势、弱点、资源、能力和盟友。同样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了解你们的盟友的能力和局限。

了解对手

也不要相信对手的宣传。只有了解对手的优势、弱点、资源和能力，才能抓住契机和主动权。这些契机和主动权对于推动你们的人权议题可能十分及时，甚至十分关键。《孙子兵法》中特别强调，要注意了解——并且破坏——对手的战略。

了解形势

形势可能是你们与对手相遇的地方，也包括你们工作的环境、时间、空间、法律、社会和文化条件。

当你们收集了所需要的信息来分析这几方面的情况之后，你们就已经准备好制定自己的战略了。战略是针对同一个目标的许多决策的集合，它可能包括：

重要的目标、合适的对象；

支持者群体和资源；

使用哪些战术，何时使用；

战术是用来影响特定局势的具体或实际的行动。重要的是，你们的战术要成为战略的一部分，要为战略服务。

开始

从一开始，就要牢记下面这些重要的问题：

与他人合作。

只要有可能，就要把一些有不同观点、背景和经验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不仅能够丰富你们团体的思想库，还能让更多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彼此学习，分享各自的想法。

开始讨论之前，先要就讨论的某些基本规则达成一致。这些规则可能包括：

尊重每一个人；

每次只有一个人发言；

如果有两个人都想发言，之前没发过言的人优先；

欢迎所有的想法；

所有侮辱性的评论都不可接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讨论应当立即转化为严格的互相尊重的形式。

当你评论其他人的意见时，应当采用积极、有建设性的方式；

如果有某位成员开始支配讨论，团体应该形成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干预方法。

头脑风暴

公开提出尽可能多的想法。鼓励每个人贡献自己的想法，不要因为太难实施、太简单或是太奇怪而放弃某个想法。但是，所有的想法都应该是非暴力的。非暴力是信誉和合法性的基础。

列出所有的想法。有些想法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有些想法则不需要。总之，不要放弃任何想法。一个乍看上去奇怪反常的想法，再看一眼可能就是你们所需要的出其不意的战术。以后可能需要对某些想法做更加深入的分析，不过一开始的目标是产生尽可能多的想法。

记录讨论过程

把想法写在大张的纸或者黑板上，让整个团体都了解讨论过程。记录讨论过程能够创造一种对经验的集体记忆，还能为今后回顾和与其他人分享这些想法提供方便。不过，也要评估保留书面记录的风险。

第一步：确定问题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列出问题的某些基本要素，这样能够帮助你们把问题拆开来看。你们可能会希望分别解决这些小问题，再逐步解决大问题。

这些问题与某个特定的行为、制度、政策、法律或个人有关吗？

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陈述问题。

第二步：确定你们的工作对象

你们的工作对象就是你们想要影响的个人、地方或议题。

是谁或者是什么要为你们发现的问题负责？

谁是造成问题或者使问题长期存在的关键人物？

是某些政策、法律或者惯例导致问题长期存在吗？

有负责处理该问题的机构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不管用？

确定一到两个你们想要影响的关键人物或工作对象。

第三步：确定你们的目标

你们希望能对这些问题造成哪些影响？

简要说明你们的工作想要达到的结果。考虑以下问题：如果你们有力量能够梦想成真，那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不要担心自己太浮夸——这就是团体讨论的好处。团体中通常会有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相互平衡。

关键人物或工作对象可以怎样帮助你们实现既定的目标？

注意：这里所说的目标可能不是指你们组织的总体目标。但要时刻记住你们选择的战略和战术应该与组织的总体目标相一致。

第四步：确定你们的盟友和对手

记住你们的目标和工作对象。

你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盟友和潜在的盟友有哪些？——个人、组织、机构等等。他们为什么有兴趣支持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手和潜在的手是谁？他们为什么反对你们的工作？或者，他们为什么认为你们的工作违背了他们的利益？

目前，谁是你们的消极盟友和消极对手？多数人都属于这两类。

选择战术时，重要的是要找到影响这些人群的方法。

第五步：确定你们的资源

资源是指一切可得的、能够帮助你们实现目标的东西。

你们已经有哪些具体的资源？要考虑到人的资源、其他组织的资源、网络、资金、社会、政治或法律条件。

你们或者你们的盟友与对相关问题负有责任的关键人物有哪些联系？这些也是资源。

考虑一下你们可以怎样照顾好自己（见“自我照顾：照顾你最有价值的资源”，第140页）。

第六步：确定你们的战略

制定战略需要做出许多决定。完成以上步骤，就为你们做出战略决定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考虑之前的步骤，你们团体在哪个领域造成影响的潜能最大？

简要列举一下这些领域。别忘记你们的目标。

需要哪些步骤才能使你们对工作对象的影响最大化？

实施这些步骤有具体的顺序吗？这些步骤需要同时进行，还是需要与其他工作配合进行？你们拥有实施这些步骤所需要的资源吗？

讨论行动过程，以及这一行动怎样帮助你们接近目标。记住，你们的战略最有可能达成的结果，是让你们的行动上一个新台阶，而不是直接达到你们的总目标。要确保行动过程与你们的总目标一致，而不是将你们带往完全不同的方向。

第七步：确定你们的战术

现在到了决定要使用哪些战术的时候了，你们要用这些战术来实施你们的战略。选择战术时既要考虑到你们的能力，也要考虑到你们的工作重点。花点时间回顾一下关键人物、支持者群体、盟友和对手，以及你们和对手的优势、劣势和资源。

总结你们所知道或者能够使用的战术。

哪些战术能够鼓励消极盟友变成积极盟友？

哪些战术有助于确保消极的对手继续消极，或者鼓励他们变成盟友？

哪些战术能够制止或者削弱对手？

你们的团体可以独自行动，还是需要与其他团体合作？每次选择一种适合你们的战略和目标战术，然后进一步讨论。

很可能每一种战术都需要有更加深入的讨论，还需要有许多步骤甚至其他战术配合实施。

第八步：评估一种战术

讨论你们为什么选择这种战术。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什么这种战术最有可能推进你们的目标？

怎样使一种战术适合本地实际，对目前的形势产生最大的影响？

这种战术充分利用了你们的资源吗？

怎样才能开发更多的资源？你们还能与谁合作？你们需要使用哪些战术来说服其他人与你们合作，或是为你们提供资源？

你们需要使用哪些其他的战术来帮助你们实施你们所选择的战术？达到最终目标之前，你们必须先处理某些初级目标吗（例如，机构负责人要进行一项政策改变之前，先要在机构中赢得支持者）？

开始实施战术之前，你们需要先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吗？

尽可能多地列举有效实施战术所需要的步骤。继续评估可用的资源。

第九步：让本书中的战术适合你们的情况

更多提示请参考“使你的战术符合本地实际”一节。

选择一些你们想要探索的战术。

这些战术与你们的情况有哪些相似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你们能从其他组织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你们有哪些额外的资源是本书中提及的组织和团体所没有的？你们可以怎样利用这些资源使战术更加有效？

你们面临哪些额外的困难？

你们需要怎样做才能使这些战术适合你们的情况？

需要哪些额外的信息？由谁来获取这些信息？

以上步骤可以作为工具，以产生有助于达到目标的新想法。这些步骤还可以训练你们的思维，使你们能够发展出更加敏锐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能力会帮助你们现实地规划和评估自己的战略和战术。

使你的战术适合本地实际

本书中所描述的战术，目的是激励你们思考自己从事人权工作的新方法。我们也希望你们找到可借鉴的战术。

当我们说战术可借鉴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经过改编之后，这些战术可以用到产生这些战术的环境和国家以外的地方。这意味着，你们不应该完全照搬本书或者其他地方提到的战术。你们需要评估自己的情况、资源和风险。你们可能需要把某种战术与另一种战术相结合，你们还可能发现，虽然某种战术整体上对你们是不适用的，但是其中的某些部分或是某些方面可能适用于你们的情况。

以下问题可以帮助你们评估自己的形势，并据此将本书中的新战术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它适合你们的实际情况。

对于你们所处的环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战术是最适合的吗？

你可以和谁讨论这个问题？

你应该和哪些团体讨论这个问题？

你曾经见过或者使用过这一战术吗？

这一战术成功了吗？

它为什么能成功，或者为什么没有成功？

它怎样才能帮助你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它会对你们的工作对象产生预期的影响吗？

这一战术已经被用于你们的工作对象了吗？

你们需要哪些资源？

你们有哪些资源？

怎样才能得到你们没有的资源？

你们应该找谁了解有关这一战术的更多信息？

要使用这一战术，你们需要有哪些盟友？

你们怎样才能拥有这些盟友？

那些反对你们的问题的人会对这一战术作何反应？

这一战术会给你或你们的组织带来多大风险？

你准备好承担与这一战术带来的风险了吗？

怎样才能减少使用这一战术带来的风险？

你们可以只用这一战术中的一部分吗？

你们能把这一战术与其他战术相结合吗？

你们的备选计划是什么？

如果这一战术不像你们期望的那样，你们应该怎么办？

分享战术：用案例说明战术

新战术项目既包括学习新战术，也包括传授新战术。希望你们不仅能从战术角度来思考自己的工作，能从本书中学习战术，也能与其他人分享你们的战术。分享战术创新，不仅能给开发战术的人带来好处（提高了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演讲能力），也能给他们所传授的人带来好处。

以下是四十分钟的战术说明大纲。使用这一大纲能帮助你们选择最有助于听众理解和实施你们的战术的信息。

一分钟

说明你的战术。

首先简要说明你的战术。记住，首先要集中说明你的战术，而不是说明问题或背景（后面有时间解释这些内容）。回顾第17页“关键词”对战术的定义，重读第7页“需要新战术”，确保你理解了这一点。

思考怎样使用有趣的方法来告诉听众：为什么这个战术十分独特、重要或者成功。讲一个小故事。提一个能抓住听众注意力的问题。

五分钟

说明背景。

你希望你的听众理解：为什么这种特殊的战术被用于这一行动。以下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理解。

说明当前或者过去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能够帮助别人理解你的战术的问题。

说明这种应对措施的组织过程。

概述使用这种战术想要达到的结果，比如你的目标和工作对象。

简要解释你所采用的战略，以及怎样将战术纳入到战略中去。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来说明每一个问题，但要确保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要简略地涉及到。

二十分钟

解释你的战术如何发挥作用。

这里是你的说明的核心部分。你要向听众提供关键的信息。他们要在自己的行动中实施你的战术，可能会需要这些信息。

逐步说明如何实施你的战术。我们建议你举一个具体的案例。想象另一个国家的同事要试用你的战术。他们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们需要从哪里开始？他们需要有多少人参加？他们需要有哪些支持？他们需要有哪些资源？

记住，要逐步说明！

七分钟

回顾战术开发过程。

讨论工作对象：战术想要影响哪些行为、制度、政策或个人？记住，工作对象可能有短期的，也可能有长期的或最终的。

解释战术产生的实际结果或影响：有关人士如何描述其结果和影响？引用有关人士的谈话或评论

七分钟

讨论你学到了哪些东西，以及如何将这一战术用于其他背景。

解释实施战术的过程中你学到了哪些东西：哪些东西管用？哪些事你会用其他方法来做？你对其他人有哪些建议？

根据你的经验，实施这一战术之前需要考虑哪些因素？这一战术的局限性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这一战术还有其他的使用方法，请简要说明其他的使用方法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

自我照顾：照顾你最有价值的资源

从事像促进和保护人权这样艰巨的工作时，你可能会长期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中。你可能会暴露在难以忍受的环境、声音和事件中。你所做的事可能会给你带来创伤和压力，无论你是亲身经历，还是通过其他人间接经历。

人们处理压力的方法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更加拼命地工作，牺牲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够受了，因此会经常改变工作或者志愿岗位。另一些人可能会抽更多的烟，喝更多更烈的酒。还有一些人可能看不到事情积极的一面，认为只要有人在受苦，世界就一片黑暗。

为了保持你的能力、你的投入和你从事自己工作的乐趣，你需要控制不健康的压力。（不是所有的压力都是不健康的！有些压力能够促使你更好地工作。）

自我照顾ABC

自我照料ABC——摘自塞克维汀、皮尔曼《觉察、平衡和人际关系》一书（1996年出版）

觉察

你必须能够发现不健康压力的迹象和症状，以及创伤的影响（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间接经历）。这就需要觉察。

注意自己的身体：你比平时更经常生病或感到紧张，更容易生气或沮丧吗？

注意你的人际关系：你在你爱的人身上花时间，也让他们在你身上花时间吗？

注意你有哪些变化：你还喜欢原来喜欢的那些爱好或者活动吗？它们曾经是帮助你放松，是你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与他们一起消磨时间的方法。你对自己的信仰和其他人的信念改变了吗？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

平衡

在多种不同类型的事物之间寻求平衡，包括工作、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休闲等等。

休息和放松会使你的工作更有效率。帮助你放松的东西可能与帮助其他人放松的东西非常不同。重要的是，你放松的方法不能损害你的健康和幸福，或者损害你重要的人际关系。如果你在生活失去平衡的时候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你就有了改变的机会。

联系

与同事、朋友、家人和社区建立联系和支持性的关系。

如果在通往更美好社会的道路上，你没有体验到积极和健康的联系，那么你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记住，如果你在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你就有了思考和采取行动，并让你的生活恢复平衡的机会。

讨论自我照顾的问题

如果你们的组织能够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从事人权工作时，个人和集体应对压力的方法，这会非常有帮助。

利用下列问题，开始两人、小组或者整个组织的讨论。

分享你为什么喜欢从事人权工作。为什么你继续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这项工作？

分享与你的工作无关的爱好。你仍然会花时间在这些爱好上吗？

分享是哪些经验让你改变了对自己、对家庭、对社区、对国家等等的看法。

分享是什么让你感到被压垮了，是什么让你疲劳、沮丧或者愤怒？你是怎样处理这些感觉和情绪的？你处理这些感觉和情绪的方法是否与其他人有关？你处理这些感觉和情绪的方法是否让情况变好了？或者让情况变得更糟了？

分享是什么导致团体压力上升。作为团体，你们是怎样处理这些压力的？

分享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你的家庭支持或者不支持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他们做过什么事来帮助你，或者使你的处境更加艰难？

分享你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某位同事支持或者不支持你现在从事的工作。他们做过什么事来帮助你，或者使你的处境更加艰难？

分享作为一个组织的成员，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分担你的同事——那些曾经与遭遇或者目睹过侵犯人权事件的人一同工作——在工作中产生的压力或重负。

最后，分享你们在讨论处理压力的ABC之后，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的某一件事。

现在，你已经准备好采取措施，对自己保持觉察，并且自我照顾。看一看你的同事正在从事哪些自我照顾的活动，花些时间来参加这些积极的活动。和你的同事定期讨论如何维护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你们自己！

更多资源

(略)

分享一种战术

新战术项目收集并传播能够促进人权和结束全世界正在面临挑战的创新途径。许多已被证实在促进人权方面有着巨大价值的创新，却不被该国和该地区以外的人们所知。人权新战术项目正在促进尽可能多的战术得到使用和分享。

如果你知道人们正在使用一种新战术——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无论是在公共部门、私营部门还是志愿者部门——请让我们知道！合适的战术可能会被加入我们在www.newtactics.org上的可检索在线数据库，或者被补充到本书将来的版本中。

请填写下面的表格，并邮寄到：

The New Tactics in Human Rights Project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717 East River Road

Minneapolis, MN 55455 USA

Or fax it to: +1 612 436 2606

ATTN: New Tactics

或发电子邮件到: newtactics@cvt.org

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填写在线表格: www.newtactics.org

你的姓名：

你的联系方式：

使用这一战术的组织或个人的名字：

如果你没有直接参与使用这一战术，请告诉我们可以联系谁来了解这一战术？

你想要分享哪些战术？战术是用来实施战略的具体行动。

这一战术要应对哪种人权状况？

实施这一战术的步骤是什么？

这一战术有哪些独特之处？

这一战术有什么作用？请举例说明。
